



是怎樣的

「基爾高覺序」

重探廣州嶺南大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

What Kind of Christian College:
Reassessing Lingnan University's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ianity in Canton.

劉肇恒 著
Lau, Siu Hang

作者簡介



劉肇恒（人稱：「劉恒」），先後畢業於香港三間基督教大學：嶺南大學（社會科學學士）、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哲學博士生，研究興趣除了是嶺南大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亦有志研究中國基督教大學、中國基督宗教史、香港基督宗教與社會關懷、世俗化社會理論與宗教研究等主題。

學士畢業以後，劉氏仍然心繫嶺南大學及基督教羣體，現為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會長、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理事、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嶺大代表、嶺南大學基督徒學生聯會顧問及基督教善樂堂長老。

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簡介



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成立，旨在團結各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提供互動交流、彼此代禱的平台，促進與母校之聯繫，支持及協助推動母校之基督教事工發展。本屆幹事會成員包括：劉肇恒（會長）、陳嘉麗（副會長）、江丞謙（副會長）、潘穎彤（財政）、馬凱晴（財政）、陳栢暉（秘書）、劉健恒（幹事）、顏偉恩（幹事）、吳勵欣（幹事）及梁皓沂（幹事）。



了解更多：www.lncaa.org

是怎樣的「基爾高覺序」：

重探廣州嶺南大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

劉肇恒
著





上：傍晚的懷士堂 | 劉肇恒 攝

左：當年嶺大青年會的活動中心——懷士堂 | 劉肇恒 攝





上：格蘭堂窗戶，其中寫上「GH」，即 Grant Hall 的縮寫；格蘭堂曾為嶺大行政大樓和圖書館，現為中山大學校史館 | 劉肇恒 攝

左：中山大學的孫中山銅像，置於中山大學校園中央，銅像由孫中山先生的日本好友梅屋莊吉所贈 | 劉肇恒 攝





左、右：嶺大首位華人校長鍾榮光的居所——黑石屋，現為中山大學招待貴賓的地方 | 劉肇恒 攝





由惺社畢業生捐建，以紀念嶺大殉國員生，即史堅如、區勵周與許耀章 | 劉肇恒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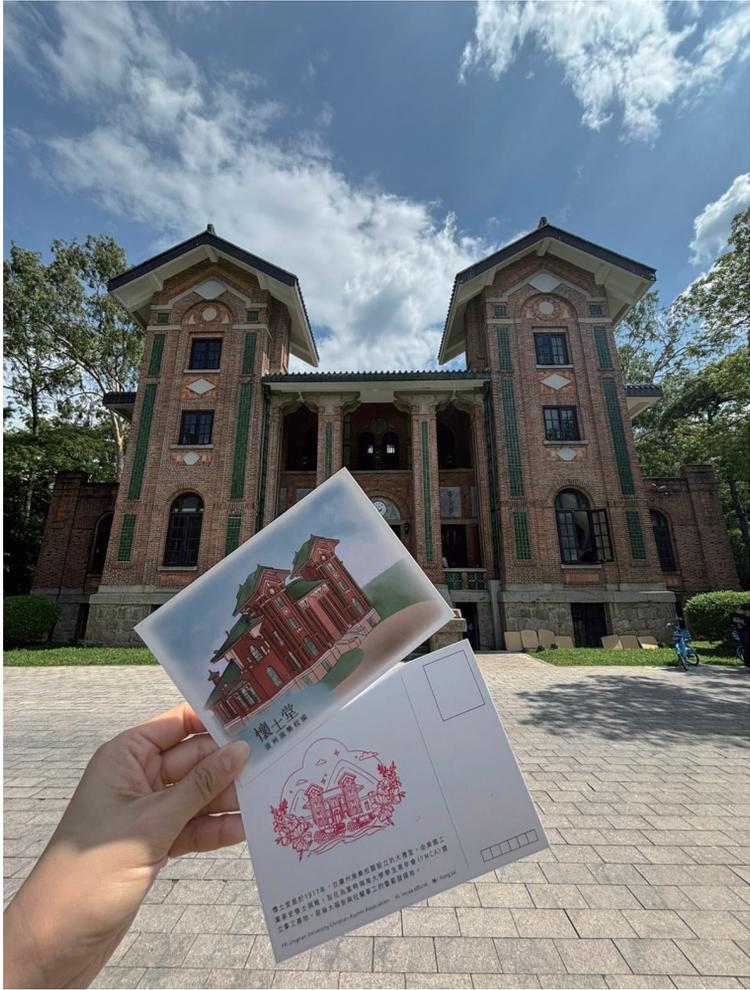
圖片左至右順序：

- 嶺南大學康樂校園的景色 | 劉肇恒 攝
- 以鍾榮光校長命名的學生宿舍，由嶺大校友捐建，現時內部仍保留不少嶺南介紹、客房和咖啡廳 | 劉肇恒 攝
- 當年嶺大女學宿舍——廣寒宮，現為中山大學研究生宿舍 | 劉肇恒 攝
- 二戰後，附屬嶺大的協和神學院建築羣 | 劉肇恒 攝



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幹事尋根之旅，背景為嶺大校徽中的白雲山與珠江 | 劉肇恒 攝





懷士堂與本會明信片 | 陳嘉麗 攝



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幹事尋根之旅，與懷士堂合照 | 劉肇恒 攝



當年嶺大學生上課的模擬情況，
攝於嶺大金墨屋一號，
現為陳寅恪故居紀念室，
供遊人參觀 | 劉肇恒 攝

| 序言 |

推薦序一

嶺南大學歷史重探

吳梓明教授 | 香港宏恩基督教學院教授

喜聞劉肇恒同學決意專心研究嶺南大學的歷史，願與嶺南校友、師生和各界友好分享嶺南的故事，包括百多年來（1888-2025）的歷史發展，與人物事蹟，反思當下、尋索仍為嶺南人和華人信徒的身分和使命。劉同學是「嶺南人」（2014年在嶺南大學畢業），又於202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碩士課程，論文研究是關於廣州嶺南大學由傳教士創辦至華人自辦的早期歷史（1888-1927）。另外，劉同學亦搜集了不少嶺南大學校長和老師們的資料，希望日後能夠進一步拓寬視野、深入探究嶺南大學在廣州和香港的發展歷史，尤其是它如何與中國其他教會大學遷移到香港、一起創辦崇基學院，延續國內基督教辦學的精神，及後在1966年，嶺南校友又萌生復興嶺南大的意念，於1967年在香港島重新創辦一所獨立的「嶺南學院」，傳承「嶺南精神」，至1999年再獲香港政府批准，升格正名為「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的百年歷史，實在是寶貴和值得特別關注及鑽研的。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一）作為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

一個重要個案，嶺南大學是屬於第三類型的基督教大學，即是「由基督教人士創辦而不直屬任何宗派或教會組織的大學」。⁰¹ 這是嶺南大學最恰當的定位。(二)簡又文在撰寫〈嶺南大學的創始時期〉時，亦已明確指出嶺南大學的辦學特色之一是它「(在基督教大學中是)不屬於任何宗派」(non-denominational / non-sectarian)的。⁰² 因此，它所表揚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辦學目的並不是為傳教，而是為「施行人格教育養成科學的人才，適合中國之需要」。⁰³ (三)西方學者談論基督教大學的歷史發展時，多是以「現代化」、「全球化」或「世俗化」為主線；⁰⁴ 中國學者較着重「本色化」、「本土化」和「中國

01 吳梓明，〈從廣州私立嶺南大學看基督教大學應以何種形式為國家教育事業服務〉，載於章開沅、林蔚合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武漢：湖教育出版社，1991)，頁241-259。

02 同上，頁244-245；亦可參閱簡又文，〈嶺南大學的創始時期〉，《嶺南通訊》，第6期(1955年7月20日)頁15；及Lutz, Jessie G.,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5-36。

03 吳梓明，同註1，頁245-246；及《私立嶺南大學一覽》(廣州：嶺南大學，1932)，頁21。

04 參Lutz, Jessie G.,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及Marsden, George M. et al eds.,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Acade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化」。⁰⁵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鍾榮光先生早在 1927 年就職演講中亦強調，嶺南辦學目的是「以世界實用的科學，造就中國領導人才，加以幾分基督犧牲為人的（服務）精神，使學成不致自私自利，出則為社會國家盡力，入則負起嶺南母校的責任」。⁰⁶這也可以說是嶺南大學實踐「基督教高等教育中國化」的開端，嶺南大學教育的中國化亦是符合基督教大學「全球地域化」的歷程。⁰⁷（四）嶺南大學作為一所基督教大學，其歷史發展亦是十分獨特和極具意義的。它不僅是超越了個別宗派的傳統，亦是跨越地域的；它始自中國廣州，為「基督教高等教育中國化」尋覓新的路向，當中開拓了「宗教哲學」、「人生哲學」、「神學教育」和「博雅教育」⁰⁸等課程，1951 年遷移至香港，在崇基學院與其他中國教會大學一起延續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傳統，幫助拓寬「宗教哲學」、「人生哲學」、「神學

05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9 重刊版；原刊於 1940）；及林治平主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傳播中心，1992）。

06 高冠天編撰，《嶺南大學接回國人自辦之經過及發展之計劃》（廣州：嶺南大學出版委員會，1928），頁 23。

07 吳梓明，〈全球地域化：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新視角〉，《歷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 年 1 月），頁 180-188；及《全球地域化視角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台灣：宇宙光出版社，2006）。

08 Ng, Tze Ming Peter et al., eds. *Liberal Arts and the Legacy of 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Pte Ltd., 2023).

教育」和「博雅教育」等課程。1967年恢復嶺南學院後，又獨自傳承嶺南大學的傳統，發揮其獨特的「嶺南傳統」和「紅灰精神」，1983年，陳佐舜博士出任校長，致力將「人生哲學」和「通識教育」帶回嶺南、確立為必修科，目的以拓展學生的視野，提高他們的道德、社會、政治及文化的認識、慎思明辨。⁰⁹1995年，陳坤耀教授出任校長時，他更進一步把嶺南的發展定位為「博雅大學」，全力推動嶺南大學成為一所模範的博雅大學，承先啟後地實踐嶺南的辦學傳統。終於也成功地幫助嶺南學院在1999年正式升格為「嶺南大學」。¹⁰事實上，這段「中國——香港」、「嶺南——崇基」跨境兩地的歷史發展確是十分寶貴和值得深入鑽研的。

嶺南大學的百多年歷史發展固然是重要和值得探究，從人物故事的角度入手研究也是寶貴和具時代意義的，劉同學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將會集中介紹七位「嶺南人」的生平故事。當然，「嶺南人」成千上萬數之不盡，我也希望在此分享一些、作為拋磚引玉吧！

09 胡志偉編撰，《開創以傳承——嶺南大學香港復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頁44。

10 同上，頁76。

30 多年前我曾在南京師範大學發表過一篇論文，題目是〈嶺南大學的第一位學生——陳少白〉。¹¹ 陳少白（1869-1934）是「四大寇」之一，一生參與革命事業、輔佐孫中山推翻滿清政府。不過，很少人知道陳少白原來是入讀廣州私立嶺南大學（前身是「格致書院」、英文名稱是「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或「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其實也是明確地承認了它創校時已是一所基督教大學¹²）的第一個學生。¹³ 他的父親陳子橋，曾率領 400 名鄉紳聯名要求哈巴博士（Dr. Andrew Happer）在廣州建校，亦是促成格致書院在廣州創立的重要人物之一。¹⁴ 他更保送陳少白入學，成為格致書院的第一位學生。¹⁵

11 吳梓明，〈嶺南大學第一位學生——陳少白〉，《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3 期（1991 年 7 月），頁 139-148；亦見吳梓明，《中國化基督教：以中國教會大學史作個案研究》（紐約：國際和諧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出版，2021），頁 181-191。

12 李志剛，〈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影響〉，載於林治平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台灣：宇宙光出版社，1992），頁 179；亦可參閱吳梓明，同註 1，頁 244。

13 吳梓明，《中國化基督教：以中國教會大學史作個案研究》（紐約：國際和諧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出版，2021），頁 181-191。

14 「陳子橋是新會海外鄉陳氏的望族，書香世代，亦為廣東著名理學家陳白沙的後人……陳子橋思想先進，了解到大學教育關乎社會的未來。事實上，陳子橋對於嶺南大學寄予有極高的期望和信心。」浩然（李志剛），〈恩公兒子報考嶺大第一人〉，《基督教週報》，第 1991 期（2002 年 10 月 20 日）。

15 吳梓明，〈傑出信徒：陳少白〉，載於李金強主編，《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二冊（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合會，2024 年 8 月），頁 294-296。

2021 至 2022 年，我曾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通識教育與校牧室合辦的校史考察團率領一眾校友師生們追尋崇基的歷史、飲水思源，也找到不少與廣州嶺南大學有關的歷史人物。原來早期崇基學院不少老師和職工，他們是「崇基人」、也是「嶺南人」。據一位師兄（當年的學生）報告，早期的崇基只有十個學系，其中五個學系的系主任均是「嶺南人」，分別是經管系的麥健增博士、史地系的黃道彰博士、生物系的陳長敬博士、化學系的周耀岐博士和社會系的黃壽林教授。除了麥健增博士外，其餘四位均是在廣州嶺南大學畢業的「嫡系嶺南人」。¹⁶ 此外，崇基的文學院院長曾昭森博士和註冊主任謝昭杰先生更是由小學、中學、以至大學均就讀於嶺南，來崇基前曾博士是嶺南大學的教授、謝先生則是擔任嶺南大學的總務長，他們真是「超級嶺南人」。崇基的創辦人之一和第一任校長李應林博士又是嶺南大學的前校長，後來的容啟東校長亦是出身自嶺南大學，來崇基前也曾出任嶺南大學的教授，更是說明了嶺南與崇基在歷史上確是有一脈相承的關係。¹⁷

早期崇基的教授中，我們也不會忘記謝扶雅教授。謝教

16 呂羅中，〈嶺南與崇基的淵源與情緣：他們是「崇基人」、「嶺南人」〉，載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通識教育學生小組編，《「香江薪傳」校史考察計劃：基督教大學在香港的延續與承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21 年 12 月），頁 222-235。

17 同上，頁 222-223。

授不單是廣州嶺南大學哲學系教授，來崇基出任教授後亦為崇基學院的校歌作詞（歌譜是與嶺南校歌雷同），又致力推動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和之路，延續崇基與嶺南一脈相承的關係。當為嶺大哲學系系主任之時，謝教授已着力創新嶺大的「宗教哲學」和「人生哲學」課程，確立了基督教在高等學府的教育使命。及後轉入崇基時，他亦獲何明華會督的邀請，協助編寫「人生哲學」課程，成為崇基日後發展「人生哲學」和「通識教育」課程的基石。這也是嶺南與崇基在「基督教高等教育中國化」上一脈相承之標誌。

談到何明華會督，他在發展嶺南與崇基一脈相承的關係上也是功不可沒的。何會督原來也是「嶺南人」，他曾是廣州嶺南大學協和神學院的校董和教授，他不單是與李應林校長等一起成為崇基學院的創辦人之一，他還邀請謝扶雅教授，仿效嶺南大學的宗教哲學思維，加入「對話」與「會談」的模式，為崇基設計「人生哲學」，對崇基學院日後的通識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¹⁸

除了「人生哲學」、「通識教育」和「博雅教育」是嶺南

18 吳梓明，〈何明華贈予崇基的三份禮物〉，載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通識教育學生小組編，《明華予崇基 會督與香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22年12月），頁268-280。

大學辦學的重要傳統外，「神學教育」也是不容忽略的。劉同學這本書，開宗明義地說明他是特別關注嶺南大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這是極為睿智的。事實上，在神學教育方面，嶺南大學後來併入廣州協和神學院、進一步發揮了它的獨特貢獻。嶺南大學確是為中國華南教會（和香港教會）培訓不少不同宗派的名牧，突顯出嶺南的神學教育及辦學精神並不局限於任何單一宗派的特色。除了近年仍擔任校董的香港聖公會前任大主教鄭保羅是「嶺南人」外，我也可點算出早期廣州嶺南神學院培訓的一些香港名牧，譬如中華聖公會的曹思晃法政牧師、李兆強教憲牧師、鍾仁立會吏長、張榮岳副主教；中華基督教會的汪彼得牧師、馬敬全牧師、黃耘蔚牧師；中華循道會的關廣佑牧師、黃仲凱牧師、黃作牧師；浸信會的歐陽廣翔牧師、吳祺牧師；和四方福音會的袁英俠牧師等。¹⁹ 他們均是在各自的宗派教會中擔任重要角色的。在嶺南大學百多年的發展歷史中，也實在是埋藏着許多傳奇人物的故事，仍有待劉同學繼續發掘探究的，努力吧！

19 李志剛，〈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影響〉，載於林治平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台灣：宇宙光出版社，1992年），頁193-194；亦可參吳梓明，《百年樹人——中國基督教教育意義重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3年12月），頁206-207。

推薦序二

是怎樣的「基爾高覺序」？

黃慧賢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

多謝劉肇恒的邀請，讓我有機會為他在嶺南大學的著作寫下這篇序言。

答應撰序後，某天再次收到他的短訊：「老師加油！」以溫柔的方式提示我要交序了。我心想：「是的，放在一邊未處理的工作，就要快快完成。」肇恒是一個付諸實行的行動者。他準時寫文，提早就找我看看有甚麼意見。由他處理幾次有關嶺南大學的歷史研究看見，他沒有如我們一般學者的拖延，已慢慢累積了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假以時日，他不屈不撓的精神將會成為研究嶺南大學的專家。當然，他的付諸行動也獲得嶺南大眾基督徒校友的支持。作為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會長的他，不單關心校內牧養同學的工作，也同樣委身發掘嶺南與基督宗教的歷史，聽聞只需四日呼籲籌募出版經費，便籌足款項讓這本書能付諸出版。可見，有不少同行者支持肇恒重新整理嶺南大學與基督教的淵源。

這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神道學碩士的畢業論文，

探看嶺南大學在 1927 年前（即嶺南大學歸國人自辦前）的歷史研究，特別從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角度，探看早期的嶺南大學（早期稱為格致書院），既是合一運動的成果，也是運動的實踐者和推動者，即包括連繫不同差會合作支持嶺大的成立，與及創校發展中不斷與其他宗派 / 神學院結連，互相承認學分，及至後來連繫同樣是跨宗派合作的協和神學院，成為嶺大屬下的神學院。除強調跨宗派的合一見證，我們也可以從嶺大的基督教青年會組織，類似我們現在的學生會，向外進行社會關懷工作，如辦義校扶貧等工作，關注社會大眾的福祉，讓天國在人間實現。當時有嶺大人如嶺大校長鍾榮光甚至參與革命事業。簡單來說，普世合一運動的關心，可以由跨宗派合作神學對談以外，擴闊推至對世界、寓居大地的人民幸福的關懷，也就是用廿世紀語言說的社會福音。

而第二部分是介紹 1949 年前與嶺大發展關係密切的人物故事。透過七位人物生平的介紹，我們可以看見嶺大人臥虎藏龍的一面。由創辦人美北長老差會的哈巴牧師，到受惠和後來推動男女平等高等教育的廖奉獻，都依稀可見他們對嶺大、對教會、對社會等多方面的貢獻。嶺大創辦人哈巴牧師早於建立嶺大之先，已在廣州教育、醫療、出版事業，和教會工作上貢獻良多。嶺大頭兩位華人校長：鍾榮光和李應林，除主理嶺大教育事業外，他們也曾經參與民國廣東省政府的工作（分別是

1912 至 1913 年廣東省教育司長和二戰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副署長 / 署長），與及參與革命和反殖的社會運動（1925 年的沙基慘案）等。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嶺南畫家司徒衛和主張中西文化哲學對話的謝扶雅的貢獻。另外，我也為到嶺大校牧李聖華牧師和廖奉獻的生平故事有所觸動。在政局轉移的狀況下，李聖華牧師如何闡述嶺大的宗教活動也是充滿政治張力。此外，曾擔任嶺大女學部主任和嶺南女子中學校長的廖奉獻，在婚後雖然辭去工作，作全職太太，但她也義務參與很多社會公職，諸如任女青年會會長和董事、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要職、北平國際婦女會會長和多間學校董事等多個公職。肇恒挑戰王棟對廖奉獻的批評，廖氏並非如王棟所說，受性別定型影響婚後成為家庭主婦。我們要明白在廿世紀廿年代的女性選擇，婚後從事工作是少數。然而，基督教女青年會卻是當時家庭主婦參與社會的渠道。

最後，作為華南基督教史研究學者，我想提出肇恒這本書介紹嶺大人和事，可以讓我們依稀窺見華南基督教史研究中兩個普世合一精神的展現：一是跨宗派 / 差會的合作——無論是嶺大的開創到具體尋找教會機構合作夥伴上，都不遺餘力；二是跨地區、跨國的普世支持網絡：當政局不穩時，嶺大曾於 1900 年暫時遷往澳門，日本侵華時期曾遷往香港，1951 年撤出中國後，南來香港建立今日的嶺大，每每遷移歷史中都有獲

得當地嶺南人的支援和延續。此外在師資、財政方面，嶺大也獲得海外差會與華僑教友支持，使嶺大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沿流中發光發熱。我期待不久將來繼續閱讀肇恒研究一代一代的嶺大基督徒如何發光發熱。

推薦序三

飲水思源：由昨日格致到今日嶺南

黎雲龍教授 |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校監、嶺南大學基督教事工委員會委員

早前受寵若驚地被（年青的）劉肇恒長老邀請為他的大作《是怎樣的「基爾高巒序」》寫序言，本來我既不是他的導師，亦沒有研究過本書課題，更不是有號召力的名人 / 網紅，便應有自知之明，不要拉低其大作的水準及浪費紙張，但為了可早日拜讀劉氏大作，便自私地應承了。

拿到文檔後，用了兩天一口氣讀畢此書，驚嘆神的計劃奇妙莫測！除了驚嘆，尚有以下幾點感想：

- 一、中國人強調「飲水思源」，因此所有嶺南人（不論是否基督徒）都應知道嶺南大學這段歷史及感謝相關的先賢（當然最好都購買及細閱本書）。
- 二、關於嶺南大學（及其前身格致書院）本來是否基督教學府，本人其實並不太在意，因為答案在於不同人對基督教學府的定義。但本人深信哈巴牧師等先

賢必然想為千千萬萬中國人創辦一間屬於基督並榮耀基督的大學！這應是今日嶺南基督徒最需要認定及堅持的部分。

三、當年哈巴牧師等先賢籌辦格致書院，是個跨宗派、跨教會、跨文化的無私合作計劃；眾人合力促成創校，並非為了自己的益處，而是回應呼召去開展神的國度。恰巧在執筆之際（2025年9月），嶺南大學剛開始每月三次以普通話及一次以英語在週四下午六時舉行崇拜。我認為這和先賢創辦格致書院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嶺大校牧處一向資源緊絀，每年廿五萬的撥款連維持一貫的基本操作也捉襟見肘，但嶺大基督教事工委員會和校牧處各人領受了神的異象，要把握機會讓每年數千位港漂同學和數百位外國同學有機會在嶺大認識及敬拜神，便嘗試邀請不同教會和機構義務合作，結果成就了週四崇拜這個跨宗派、跨教會、跨文化的無私合作計劃。

四、有一位港漂基督徒同學和我們分享，她在國內不方便參加教會崇拜，而申請來港留學時，除了嶺大，也得到一間香港前三的大學取錄，但因為嶺大的基督教背景，她欣然選擇了嶺大，而她入學後感受到

嶺大的基督教氣氛，也很高興每週可參加校內的崇拜及之後的愛筵和小組。我告訴她其實嶺大本學年才開始有普通話及英語崇拜，如果她早一年入嶺大，便不會有機會參加上述為港漂舉辦的活動了。她的分享讓我想道，雖然嶺大現已從內地遷至香港並成為公立大學，而近年大學管理層均定性嶺大為一所「有基督教傳統的大學」而非「基督教大學」，但只要今日嶺南基督徒肯努力回應神的呼召及按哈巴牧師等先賢的心意，仍可延續嶺大作為一間祝福千萬中國人、屬於基督並榮耀基督的大學！

五、早前一位不認識基督教的港漂同學參加了校內的普通話崇拜，雖然尚未決志，但覺得詩歌、信息等均十分有意義，上週便邀請了另外兩位同學一同出席崇拜和小組，我們為此非常感恩！但正如《以斯帖記 4 章 14 節》中，末底改提醒皇后以斯帖：「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今日我們若得此位分成為嶺南基督徒，若閉口袖手，不跟神的帶領在嶺大榮耀主名，神也必從別處（如慕道同學）得榮耀，但恐怕我們自己反受虧損！

願行奇事的神繼續使用嶺大成為祂的器皿，榮神益人！
共勉之！

推薦序四

嶺南基督徒——從基督教大學到身分使命的追尋

鄧巨堅牧師 | 嶺南大學校牧處校牧

我與劉恒相識於嶺南大學，在團契、基督徒詩班一同事奉，後來又在基督教善樂堂重遇，一同配搭牧養；屈指一算，我倆相識已近十五載。嶺南大學不僅是我們相識的地方，也是我們在其中共同經歷上主恩典、學習信仰反省、承擔福音使命、實踐彼此相愛羣體的地方。

入學前，我並不知道嶺南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畢業後，我能夠見證嶺南大學的確是一所基督教大學，不單單是因為我認識了嶺南大學的發展歷史，更是因為我在其中三年生活期間所遇上每一個帶着嶺南基督徒身分意識和使命的人，包括在校內積極推動校園牧靈事工的鄭耀成牧師、伍家豪牧師、朱子溢傳道、林思漢牧師（當時為傳道）、吳桂華弟兄、梁錦仲弟兄，以及忠心愛主的李鳳儀姊妹、林澤雄弟兄等教職員，還有團契、詩班、學員傳道會每一位努力參與在學生福音運動中的同學，他們彷彿都繼承着昔日越洋來華的嶺南宣教士精神。

自 1888 年創校以來，嶺南大學已經是一所非宗派（non-

denominational) 基督教大學。換言之，這所基督教大學不是由組織化的「教會」(宗派 / 差會 / 堂會) 作為辦學團體來負責營運，而是靠賴本着基督教精神成立的獨立校董會，以及校園中每一位帶着宣教理念的教職員和學生共同努力，方能傳承其基督教精神。回溯十九世紀後期，當時各宗派和各宣教士的在華宣教策略並非一致，有比較主張直接傳教領人歸主的傳統，也有比較強調透過教育改造文化以收間接傳教之效的傳統。對嶺南而言，由於校董會不會跟隨固定宗派所制定的宣教策略，故其基督教精神的面貌會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流動性，也較有空間容納校內不同持份者由下而上地發起不同的事工和聚會。

時至今日香港，除了公教聖方濟各大學仍然以私立基督教大學的模式運作，其餘基督教大學——包括嶺南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都已經在公立大學的體制之下。即使個別基督教大學有支持宗派代表在校董會中發揮關鍵作用，世俗化的現象看來仍然是無法逆轉的：基督教聲音未必在校董會中佔大多數，學校管理層不一定由基督徒擔任，教職員的基督徒比例也很有可能偏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問：我們可以如何保存、傳承基督教大學的基督教精神？這可能關乎開拓資源支持大學的基督教事工，也關乎如何在大學體制中確保基督教仍然保留一些席位。然而，如果在大學中缺少了基督教精神的繼承者，空有資源或議席都是沒有意義的。

1967年，嶺南大學正式在香港復校（當時為嶺南學院），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復校之路並不是由教會驅動的，而是一羣嶺南學長——透過嶺南大學同學會、嶺南會所及嶺南中學聯合籌組了「嶺南教育擴展會」——共同努力促成的。雖然不是以基督教辦學機構的名義來復校，但一眾嶺南人並沒有忘記嶺南大學的基督教傳統，從他們向公眾宣傳嶺南校徽的基督教傳統意義可見。

校徽中之山、水、樹、及小徑，各有深遠意義：

「嶺南」校徽的意義

嶺南書院校徽，原為嶺南大學校徽，乃曰故司徒循校長所設計，圖案簡單，象徵嶺南大學從懷土望北望之風景。上為白雲山，中為珠江，江邊有荔枝樹一列，下有小徑，顯出母校之雄偉氣象。

校徽中之山、水、樹、及小徑，各有深遠之意義，茲畧述如下：

(一) 白雲山為嶺表名山，雄據粵南，象徵人生最高之理想。嶺南大學及其附校，均以基督教之教義及精神，為創立之基礎，以基督徒之人生觀為教育之最高理想。太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基督實理為嶺南人所仰望，此即白雲山所代表之意義也。

(二) 珠江為東西南北三江之總匯，源遠流長，象徵嶺南教澤。故嶺南歌中，有嶺南教澤珠江水，源流長流無盡之句。嶺南大學有八十餘年之歷史，學生遍布各洲，今母校雖不存在，然懷念母校之情，久而不渝也。

(三) 樹乃象徵寄業，每年夏季，荔枝樹結實纍纍，基督教化之人生，正是如此。詩篇謂喜愛上帝律法之人為有福，如林木植於溪旁，及時結果，其葉青蒼。嶺南人之願望，乃以終身事業，實為神為國為嶺南之理想。

(四) 小徑代步前途，基督教教育，開發人生光明之前途。學生不論貧富智愚，無可限量。或登白雲之巔，北望五嶺，或溯珠江之水，遠渡重洋，每一嶺南學子，均循此途徑，努力前程也。



其未來之造就，無可限量。或登白雲之巔，北望五嶺，或溯珠江之水，遠渡重洋，每一嶺南學子，均循此途徑，努力前程也。

一、白雲山為嶺表明山，雄踞粵南；象徵人生最高之理想。嶺南大學及其附校，均以基督教之教義及精神，為創立之基礎，以基督的人生觀為教育之最高理想。太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基督真理為嶺南人所仰望，所實行，此即白雲山所代表之意義也。

二、珠江為東西北三江之總匯，源遠流長，象徵嶺南教澤。故嶺南歌中，有「嶺南教澤珠江水，源源長流無盡」之句。嶺南大學創校至今，學生遍佈各洲，校友懷念母校之情，久而不渝也。

三、樹乃象徵事業，每年夏季，荔枝樹結實纍纍，基督化之人生，正是如此。《詩篇》謂喜愛上帝律法之人為有福（參詩一一九1），如林木植於溪旁，及時結果，其葉青蒼。嶺南人之願望，乃以終身事業，實現為神為國為嶺南之理想。

四、小徑代表前途，基督教教育，開發人生光明之前途。學生不論貧富智愚，無可限量。或登白雲之巔，北望五嶺，或溯珠江之水，遠渡重洋，每一嶺南學子，均循此途徑，努力前程也。

1993年，嶺南學院計劃設立校牧機構，旨在傳承嶺南大

學基督教傳統，加強價值教育。當時學院邀請了教職員、學生團契幹事及天主教同學會幹事成為諮詢委員會當然委員，協助校牧機構的設立及營運，校牧處自此應運而生，後由嶺南大學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合作營運。當時正是一羣忠信的嶺南基督徒，眼看學校即將進入公立大學體制，所以及早部署透過在體制內及牧靈工作的發展保存基督教傳統，才促成了校牧處的發展，及後更於 2006 年完成了禮拜堂的興建，成為嶺南大學的基督教標記。

2020 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突然終止與嶺南大學超過二十年的合作關係，不再派遣教牧同工及行政人員到校牧處。在資源極其短缺的情況下，靠賴一羣有「嶺南基督徒」身分意識的教牧、教職員和校友一同努力撐起所有事工，才讓校牧事工得以延續下去。同年，一羣嶺南基督徒校友看見嶺南大學校牧處及學生事工的需要，毅然決定成立嶺南基督徒校友會，重新凝聚校友的力量，希望能夠成為學生的後盾，支援各種嶺南大學基督徒事工。

嶺南大學作為一間基督教大學，到底會隨着世俗化的浪潮趨向名存實亡，抑或能夠在時代迭替之中透過不同方式不斷重新演繹？還看每位嶺南基督徒如何承傳這個身分意識，並勇於肩負起校園福音使命。「同心同德同志力，為神為國為嶺南」，合一總是在共同使命中得以彰顯，而使命又永遠指向那位愛我們的上帝。

自序

2020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下稱青年會）結束與嶺南大學校牧處約二十年的合作關係，令嶺南大學（嶺大）的基督教事工頓時失去重要的人力資源和財政支持。畢竟，自筆者在2011至2014年就讀嶺大期間，已受惠於青年會鄭耀成牧師和行政同工梁錦仲先生等的服侍，得以在大學期間得到靈性的牧養。正因青年會的退出，加上在校時已經是大學團契和基督徒詩班的積極分子，包括筆者在內的一羣嶺南大學基督徒舊生，在鄧巨堅牧師的呼召下，就在同年11月26日開始籌組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以支援嶺南校園的福音事工。

同期，嶺南大學校牧處亦開始着力整理嶺大與基督教的關係，從歷史中尋找初心，重整旗鼓，探問嶺大的基督教傳統與當下的關係。筆者亦在這個背景下，拾起對嶺大基督教校史的興趣。結果，這就開啟了無窮的研究空間，發現了過去校史著作的限制，亦吸引筆者全情投入地翻查散落各處的歷史檔案，時刻偵探式查考當年今日。如此投入，不只責任，更是因為感情、回饋、好奇。

全書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三個章節，以「是怎樣的『基爾高巒序』？以普世合一視角，重看嶺南大學歸國人自辦前，與基督宗教的關係（1888-1927）」為題，參考散落於美國、廣州、香港和網絡上的歷史原檔，探看創校初期與宗派聯合的張力與緣由、嶺大與各宗派差會、神學院和團體的合作和大學與嶺大青年會的同行關係。「基爾高巒序」乃嶺大校歌其中一句歌詞，意即基督祢的高等學府。文章原為筆者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碩士畢業論文，故此寫作結構跟隨學術規格，較少個人色彩，以盡量客觀和一手的內容和文字，論證嶺南大學是一所具普世合一精神的基督教大學。

第二部分則分為七個章節，為嶺大基督徒校友會在網上平台 [Patreon](#) 的「在歷史中的 LNC 嶺南基督徒」寫作系列，旨在尋問在歷史中的嶺南基督徒是如何發揮嶺南大學的基督精神，在不同時代巨變之下實踐本地化的基督教信仰。這七篇文章內容雖然嚴謹，但本意並非撰寫學術論文，反而旨在透過前人的故事，讓當代信徒作出反思。如此，兩大部分，洋洋六萬多字，各有意思，各具特色，誠邀各取所需。當然，如有錯漏，歡迎賜教。

最後，容我在此補充致謝予文稿出版期間提供幫助的眾人——感謝每一個捐款支持的朋友，當中包括：田慶先、羅康

怡、陸家樂、梁偉光、歐陽達初、「嶺南人」、蘇鎮豪、譚柏翹、陳擎蔚、溫采儀、洪璇璇、梁勇等，讓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在四日內完成出版費用的籌募；感謝四位樂意撰寫序言的同道，當中有三十年前已經開始研究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前輩吳梓明教授、筆者的神道學碩士畢業論文督導黃慧賢教授、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校監黎雲龍教授和嶺南大學校牧處校牧鄧巨堅牧師。另，感謝崇基學院神學院舊同學兼專業編輯葉綺暉及設計師郭禹光拔刀相助，讓我這出版初哥得到專業的引導；亦感謝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眾幹事，默默支援這次出版計劃。

目 錄

序言

推薦序

- | | |
|---|-------|
| 一 · 吳梓明教授——香港宏恩基督教學院客座教授 | II |
| 二 · 黃慧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助理教授 | X |
| 三 · 黎雲龍教授——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校
監、嶺南大學基督教事工委員會委員 | XIV |
| 四 · 鄧巨堅牧師——嶺南大學校牧處校牧 | XVIII |

自序	XXIII
----	-------

第一部分

以普世合一視角，重看嶺南大學歸國人自辦前，
與基督宗教的關係（1888–1927）

致謝	002
研究摘要	005
引言	008
一·研究問題	008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缺口	009
三·章節概論	014
第一章：從普世合一視角看創校初心	
引言	015
一·定義普世合一	015
二·羅伯特學院與敘利亞新教學院的非宗派理念	018
三·十九世紀末廣州教會的合一情況	021
四·嶺南大學的非宗派理念及架構	023
五·嶺南大學非宗派理念的緣由及張力	025
六·財政與人際支持上的多元合一	030
結語	033

第二章：從普世合一視角看宗派合作

引言	034
一·嶺南大學與廣州神學教育的合一關係	034
二·嶺南大學早期與差會的合作協議：與倫敦傳道會的合一嘗試	039
三·嶺南大學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合作	045
結語	048

第三章：從普世合一視角看青年會運動

引言	050
一·青年會運動跟合一運動的關係	052
二·嶺大青年會的源起及跨宗派的宗教活動	055
三·嶺大青年會的社會服務、教育及改革工作	059
四·嶺大青年會跟其他基督教組織的合一關係	064
五·限制及展望	066
結語	067

全文總結、研究限制與展望	070
---------------------	------------

參考文獻	074
-------------	------------

第二部分

在歷史中的嶺南基督徒

導讀	084
一· 宣教士哈巴牧師—被遺忘的創校者	088
二· 弘基格致，盡瘁嶺南—記鍾榮光博士與基督宗教	095
三· 李應林校長—入世、疊莊、流亡的嶺南基督徒	102
四· 嶺南教育的開荒牛—司徒衛校長	113
五· 在政治角力下的嶺南牧師—李聖華校牧	122
六· 本土化神哲學的倡議者—嶺大哲學系主任謝扶雅教授	131
七· 南中國男女平等教育的先驅—以嶺南女學與廖奉獻學長為例	141
跋	152

| 第一部分 |

是怎樣的「基爾高巒序」？

以普世合一視角，重看嶺南大學歸國人自辦前，
與基督宗教的關係（1888-1927）

致謝

整個研究計劃，源於對母校嶺南大學（嶺大）的感情、對嶺南基督徒這個身分的認同，以及對與自身相關的基督教史之好奇。事實上，除了文中提及的學術研究，嶺大校牧處亦在這次研究之前，早已開始了對嶺大基督教發展的歷史考證。所以，筆者投身在嶺大基督教史的研究，除了愛，絕對是受嶺大校牧處的啟發。結果，在 2024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崇基）德詩婷教授任教的「中國基督教」暑期課程中，筆者首次展開了嶺大基督教史的研究，探問在 1927 年後的校內基督教發展，是否因非基督教運動和辦學權力的轉移而式微。該論文除了有幸得到教授的好評，亦打開了正面的「潘朵拉的盒子」，讓筆者發現有關研究空間之長闊高深。同一個盛夏，有幸參加了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的「第十三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認識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發展和學者，亦遇上了是次研究計劃的督導——崇基助理教授黃慧賢。

黃教授是研究婦女運動的學者，其博士論文及後來出版的著作，正是探討廣州本地婦女的婦女事工。正因如此，黃教授對於清末民初廣州一帶的基督教歷史，例如長老會傳教士的

參與、本地合一運動的推動與男女青年會運動的發展等，都早有研究，亦肯定跟嶺大的研究息息相關。因此，我必須感謝黃教授在這一年的幫助，讓筆者發現自己書寫歷史的盲點，並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方向、聯繫和資源，讓筆者可以在不同的檔案館中，尋得珍貴的一手資料，填補前人尚未發掘的嶺大基督教歷史缺口。

關於在檔案館的探索，筆者亦要感謝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吳義雄及其委派的博士生陳健鴻同學的幫助，讓本人可以在嶺大位於廣州康樂的舊址（現中山大學校園）作實地考察，及在校內圖書館的珍藏館中閱覽珍貴史料。另外，筆者亦希望鳴謝嶺大鄭森活圖書館（尤其是高級助理圖書館員張思蕾小姐的幫助）、中大牟路思怡圖書館、廣東省檔案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和美國長老會歷史協會（*Presbyterian Historical Society*）同事的幫助，協助我尋找眾多塵封已久的史料。同時，亦感謝幾位曾書寫嶺大校史的歷史學者胡志偉博士、梁勇博士和鍾卓芝學長特地抽空與筆者交流，讓是次研究變得更為順暢。感謝嶺大校牧處鄧巨堅牧師的協作和邀請，讓筆者可以透過大學講座和崇拜講道，分享研究嶺大基督教史的種種，並一直支持此研究計劃。感謝嶺大基督徒校友會願意探討將此研究成果進一步印刷出版的可能，讓更多「嶺南人」有機會認識過去，反思當下。以上現有嶺南社羣的支持是重要的，因為此

研究一方面是重寫過去故事，另一方面亦期望過去故事能啟發當下，猶如以色列人在被擄時期重寫過去的民族故事般。

感謝同為嶺大畢業生的妻子。雖然她並非教會歷史研究的專家或愛好者，但她仍然努力嘗試了解相關研究，更重要的，是在我途中遇上眾多不同的挫折時，亦繼續陪伴和作心靈支持。感謝嶺大和嶺南精神背後自然指向的上主，讓筆者因着對嶺南精神的深切認同，完成洋洋三萬字的研究小作，將基督教信仰所帶予我的，與眾人分享交流。

最後，願此研究成果，能夠宏基格致，服務社會，為神為國為嶺南。

研究摘要

是怎樣的「基爾高覺序」？

以普世合一視角，重看嶺南大學歸國人自辦前，與基督宗教的關係（1888-1927）

本研究從普世合一視角，重探嶺南大學（嶺大）由1888年創立至1927年歸國人自辦之前，與基督宗教的關係。本文不認同嶺大並非基督教大學的觀點，指出自創立以來，嶺大即實踐跨宗派的基督教合一精神，其宗旨、架構與發展等，均深受普世合一的影響。本文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一、從創校宗旨和組織架構剖析嶺大與普世合一的張力與根基；二、透過與廣東的神學院及多個西差會的合作關係，展示其如何持續實踐宗派合一的精神；三、以嶺大學生青年會為研究對象，分析青年會運動在嶺大宗教活動和社會參與上與合一的關係。研究藉大量原始史料，補足現有嶺大校史研究的缺口，論證嶺大在歸國人自辦前，實為具普世合一精神的中國基督教大學。

Abstract of the Thesis

What Kind of Christian College? Reassessing Lingnan University's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ianity from an Ecumenical Perspective Before Its Transfer to Chinese Leadership (1888–1927)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nan University and Christianity from 1888, when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to 1927, when it transitioned to Chinese leadership. Challenging the claim that Lingnan was not a Christian institution,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university embodied a strong ecumenical spirit from its foundation, as reflected in its non-denominational missio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arts: first, an analysis of Lingnan's founding visio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exploring both the foundations and tensions of its ecumenical character; second, an examination of its sustained collaboration with Canton theological schools and multiple Western missionary societies as evidence of its

commitment to interdenominational unity; and third, a study of the Lingnan University Student YMCA, focusing on its role in advancing religious engag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ecumenical spirits. Drawing on extensive archival sources,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critical gaps in the university's historiography and demonstrates that pre-1927 Lingnan University functioned as a genuinely ecumenical Christian institution in China.⁰¹

Submitted by Lau Siu Hang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Divinit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May 2025.

01 Acknowledgement: The author gratefully acknowledges the use of OpenAI's ChatGPT-4o for support in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the English abstract. Final interpretations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 remain solely with the author.

引言

一、研究問題

今時今日，嶺南大學（嶺大）被視為非基督教大學，其官方網站上的「嶺大簡介」欄目，未有提及嶺大的基督教傳統，反而強調其為「一所在數字時代出類拔萃的研究型博雅大學」；其「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欄目，同樣不提其基督教傳統及歷史。⁰²事實上，多次整理嶺大校史的李瑞明特意在《嶺南大學》一書中，撰文爭議嶺南大學並非基督教大學，其中推論如下：「（1）它沒有以一個或幾個教會為後台；（2）學校沒有將宗教列入課程，校內提倡宗教信仰自由；（3）經濟上主要依靠四個方面：一是華僑捐款（嶺南大學的房舍，華僑捐款佔 2 / 3 以上），二靠學生學費，三靠當時政府撥款資助，四靠美國嶺南大學基金會，主要用（作）延聘和培養師資，來源也是美國公民捐贈。」⁰³然而，只要翻查歷史文獻，不難發現

02 嶺南大學，〈認識嶺大〉（2024年），「關於嶺大」，2024年10月27日取自：<https://www.ln.edu.hk/cht/about-lu>；嶺南大學，〈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2024年），2024年10月27日取自：<https://www.ln.edu.hk/cht/about-lu/introducing-lingnan/vision-mission-and-core-values>。

03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頁219-220。

情況和結論甚為不同，一方面李氏的推論原因本已欠說服力，當中例如「沒有以一個或幾個教會為後台」⁰¹一說，如以教會普世合一視角而言，就正好證明嶺大是一所跨宗派的基督教大學。故此，本文將研究範圍集中於探問嶺大在 1927 年歸國人自辦前，由西方人士主理的嶺大，跟普世合一有何關係，並如何實踐普世合一精神；而嶺大又如何能在普世合一精神下，實踐基督信仰和社關精神。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缺口

絕大部分的校史專書，均不是從基督教的視角書寫嶺大校史，更遑論以普世合一視角撰文，對校內的基督宗教實踐往往甚少提及，可見研究之不足。以 Corbett 在 1963 年完成的校史為例，雖其為西方學者，又受嶺大美國基金會委託出版校史，惟着眼點則集中於 1888 年至 1952 年之間，嶺大發展期間的重大事件，例如初期成立過程、早期暫遷澳門、大學部的發展、歸國人自辦的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中的遷校情況和戰後嶺大歸中山大學接管等歷史事件。⁰² 從歷史研究的

01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頁 219-220。

02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 Based Primarily on the Records of the University's American Trustees*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角度，Corbett 的史書是其中一本最早整理嶺大在廣州時期歷史的重要著作，加上其研究建基於珍貴的嶺大基金會原始檔案，對讀者深入了解嶺大的整體發展史，有重大的意義。可是，Corbett 未有處理嶺大作為一所基督教大學，是如何在學生和官方各層面，跨宗派地推動基督宗教信仰。

李瑞明主編的《嶺南大學》，大部分內容是翻譯自 Corbett 的專書，故此兩者的書寫方向極為相近，甚至誠如前文提及，李瑞明在書中更另文力證嶺大並非基督教大學。⁰³ 隨後數本校史書目，基本上都跟隨相似的角度，不論是同由李瑞明編撰、中山大學出版的《南國鳳凰：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陳國欽與袁徵在 2008 年出版的《瞬逝的輝煌：嶺南大學六十四年》，還是近年由胡志偉書寫的官方校史刊物，雖然略有提及基督教在校的關係，但明顯不是主要書寫角度，亦沒有專屬章節仔細探討相關之宗教情況，更顯然沒有普世合一角度之討論。⁰⁴ 王棟的嶺大歷史專書，研究角度則跟前人有所不同，其刻意整理了廣州嶺大的管理方式、與當地社會的關

03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頁 218-221。

04 李瑞明編，《南國鳳凰：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第 1 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陳國欽、袁徵，《瞬逝的輝煌：嶺南大學六十四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胡志偉，《開創以傳承——嶺南大學香港復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係、財務管理以及嶺大作為女性教育的先河等多個較新部分；⁰⁵不過，雖然王棟一書在原有校史上作出不少補充，惟同樣地，其書寫角度，亦非為嶺大的基督教情況，亦沒有普世合一之視角，研究缺口亦因而呼之欲出。

其中一份最接近本文研究方向的文獻，是李志剛於1990年整理的《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其影響》。李氏的論文主要討論嶺大精神是建基於基督教精神，並以格致書院的成立（即嶺大前身）、校內多位重要基督徒人物的行動、宗教教育的推行、嶺大學生青年會的設立和嶺南與協和神學院的密切關係，來論證嶺南大學與基督教是密不可分的。⁰⁶筆者認為，李氏從基督宗教視角出發的歷史整理，對於證明嶺大是一所基督教大學而言，是罕有而珍貴的研究，能夠補足其他校史忽略的研究角度，是筆者在本文務必參考的重要文獻；然而，李氏的文章作為僅有以基督宗教角度書寫的嶺大史論文，則仍有不足之處。例如，雖然文章未有明言，但李氏將嶺大預設界定為1888至1952年間主要在廣州的嶺大，並書寫其與基督宗教之

05 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7).

06 李志剛，《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其影響》（桃園：中原大學，1990）。

關係；⁰⁷ 然而，筆者認為此等略為粗疏的時期界定，可能會忽視不同時代背景下，在嶺大的基督宗教活動之間的差異。以本文的題目提到的 1927 年為例，當時在非基督教運動的風潮下，整個嶺大及其他中國基督教大學，都面對着自 1922 年開始的非基督教運動的批判，指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物，理應進行徹底改革。在此背景下，加上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影響，嶺大的架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除任命了嶺大史上首位華人校長外，亦將整個辦學權由美國人歸中國人董事擁有。如此看來，雖然筆者曾撰文論證在 1927 年後，基督宗教的活動並沒有日漸式微，⁰⁸ 但明顯地，在以上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和架構，嶺大與基督宗教的關係，是需要更仔細的研究分析，亦是本文期望能貢獻之處。

更核心的是，嶺大創校開初的成立簡章，就清楚在創校目的中，指出「它致力於與所有宣教機構的代表以及所有教育機構真誠合作，共同實現使中國啟蒙和基督教化的共同目標。」⁰⁹

07 同上。

08 劉肇恒，〈「為神？為國？」：重新探討嶺南大學由國人自辦後，校內的基督宗教情況（1927-193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4）。

09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Including a Review,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1898), p.29.

法律架構上，獨立於美國長老教會和任何宗派的「中國基督教大學托管會」在 1886 年 4 月 30 日於美國紐約成立，負責「籌集並投資捐款基金，將資金用於學院的利益，並挑選學院的教職員，管理中國的董事會，以及處理所有與該職位相關的其他事項。」¹⁰ 由以上可見，嶺大在始創階段，早已脫離創辦人安德·哈巴牧師（Rev. Andrew Happer, 1818-1894）本身的宗派——美國長老會，¹¹ 並建立全新管治架構，歡迎不同宗派背景的人士加入管理團隊，此實乃普世合一的實踐，亦初見合一精神在嶺大的重要性。前文提及李志剛的文章，雖然罕有地論述了嶺大與基督宗教之關係，惟嶺大作為一所跨宗派大學，則未有前人從普世合一的視角，思考整理嶺大與基督宗教的關係。故此，本文將針對現有的研究缺口，豐富現存嶺大校史之整理，透過更多的原始資料，以普世合一的視角，重寫由 1888 年至 1927 年的嶺大基督宗教史，並論證在 1927 年國人自辦前，是一所具濃厚普世合一精神的「基爾高巒序」（基督教大學）。¹²

10 同上，頁 11 及 29。

11 哈巴牧師屬於美北長老會，美南長老會跟美北長老會曾因奴隸制度問題而分裂，詳見："History of the Church," accessed 30 Apr, 2025, <https://pcusa.org/historical-society/history-online/history/history-church>.

12 「基爾高巒序」為嶺南大學校歌的其中一句，雖暫無法找到歌詞譯者陳輯五的解釋，但以文言文的理解應可翻譯為「基督祿的高等學府」，在此可理解為基督教大學。

三、章節概論

本研究共分為三大章節。第一章，筆者將從嶺大草創時期，探看嶺大是如何由一個本來由長老會傳教士推動的辦學計劃，變成一個跨宗派合作的合一事工。筆者會從哈巴牧師當時所參考的兩所基督教大學、十九世紀末廣州教會的合一情況和長老會的內部通訊文件，推論嶺大最終成為跨宗派基督教大學的因由和其中的張力。第二章，本文將會先從廣州協和神學院的成立與嶺大的關係，了解嶺大對跨宗派神學教育的參與和支持，又會詳述在 1915 年開始與倫敦傳道會的合作，透過傳教士的書信，了解嶺大在發展階段如何延續合一精神；同時，亦會概論嶺大與其他不同宗派的宣教組織之合作，證實嶺大不止在開創初期才實踐合一精神。最後，第三章會探究學生團體——嶺大學生青年會跟普世合一的關係，並從宗教活動和社會參與兩大方面，了解其工作是如何實踐合一使命。透過以上三大方向的論證和大量從各大小檔案館取得的一、二手歷史資料，本研究將會指出 1927 年前的嶺大，在初創時期、發展階段和校內青年會運動上，都有具普世合一精神的立體展現，是名副其實的跨宗派中國基督教大學。

第一章：從普世合一視角看創校初心

引言

研究嶺南大學（嶺大）校史的學者，當然早已將大學成立時情況，作非常豐富的記載。不過，嶺大作為一所自居為跨宗派的學府，如果以普世合一的視角進行對話，則仍有空間研究更深。譬如，嶺大的創辦，跟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與敘利亞新教學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甚有關係，惟不多校史研究的學者會進一步分析嶺大的開創者參考了兩校的甚麼？另，嶺大自居為跨宗派，但究竟背後緣由與張力是甚麼？本章將會先處理「普世合一」一詞以幫助聚焦討論，然後就會探討以上兩所大學在合一上的特色及十九世紀末廣州教會的合一情況，並以此背景進入嶺大成立簡章中的合一條文及架構。之後，本文更會嘗試透過當時部分通訊原檔，探索此嶺大合一條文及精神的背後內部原因和張力，以及此等原因與張力是如何最終帶來非常多宗派的支持。在以上討論後，本章期望指出，普世合一精神早於嶺大開創時期，已明確扎根。

一、定義「普世合一」

研究教會普世合一運動的學者，多數以 1910 年在愛丁堡

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為界，定義當時為普世合一運動的肇始。⁰¹ 如果以此為界，無可否認，嶺大成立的年分——1888年，是早於官方正式的普世合一運動；不過，誠如 FitzGerald 的研究指出，早在十九世紀的歐美，基督宗教信徒就透過建立基督教青年會（YMCA）、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新教宗派間的各種聯盟和無宗派的宣教組織，為教會分裂的局面帶來宗派合一的嘗試，為後來的合一運動建立了重要根基。⁰² 因此，嶺大的成立，跟普世合一運動在時間和理念上，已開始具有密切的關係。又，雖然翻查嶺大各種文獻，「普世合一」（ecumenism）一詞，並不常在文件上出現，但本文將會指出，其合一精神在不同的地方上均能展現。

進入嶺大的討論以先，筆者必須探問：究竟何為「普世合一」（ecumenism）？根據 Weber 在 1966 年的整理，「普世

01 陸芝蘭、傅俊濠、湯泳詩、蔡慧敏、鄺志榮，《香港基督徒合一運動：研究集錄》，初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頁 20；鄭仰恩，〈當代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所面對的挑戰：後殖民批判、意識形態的對立、公民社會的崛起〉，《輔仁宗教研究》第 38 期（2019/03），頁 20-21。

02 Thomas E. FitzGeral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Conn, 2004), p.63-77.

合一」一詞的定義早在當時已不斷演化，並提出普世合一不應只被理解為不同宗派教會和信徒間的合作與聯合，而是應該要包括「整個教會將福音傳遍整個受造世界的整全使命」。⁰³顯然，教會對普世合一的理解，已經開始更見廣闊，而非只是宗派間的合作。近代研究合一運動的台灣學者鄭仰恩，在參加了三次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大會後，對普世合一有更立體的定義：

「普世」（ecumenical）一詞是從希臘文的「oikoumene」而來，原意是「整個生存或居住的世界」（the entire inhabited world）。它的字根和「家」（oikos）相關，後者更延伸出今日慣用的「經濟」（economy）或「生態」（ecology）等詞，「經濟」一詞指「管理家園或居所的法則」，在神學上也有「上主管治世界的計劃」的意涵，「生態」一詞則泛指所有生物的共同居所（habitat）。因此，「普世合一運動」一般雖指「普世眾教會間的合一」，但它的意涵其實更廣，直指「世界上所有子民和生物的共存與合一」。⁰⁴

因此，既然普世合一的意涵是指「世界上所有子民和生

03 Hans Ruedi Weber, *Asia an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895-1961* (London: S.C.M. Press, 1966), p.37-39.

04 鄭仰恩，〈當代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所面對的挑戰〉，頁 20。

物的共存與合一」，⁰⁵而非局限在基督宗教間的合作與聯合，鄭仰恩就更進一步指出多個在普世合一視角中，正被具體關注的不同議題，以幫助讀者更立體理解普世合一的廣闊意義，其中包括：在信仰與教制上的合一、在宣教工作中本土化信仰的推動、世界公義與和平的實踐、社區「服務」(diakonia)的開展等。⁰⁶本文將利用以上對普世合一的理解，跟嶺大早期的歷史對讀，探問這樣的對話會為讀者帶來怎樣的更新理解。

二、羅伯特學院與敘利亞新教學院的非宗派理念

嶺大並不是首間由美國人辦的海外基督教大學。根據嶺大開校時的《成立簡章》(Prospect)，嶺大的開辦，是參照兩間位處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前君士坦丁堡)和黎巴嫩貝魯特之高等學府，亦即羅伯特學院與敘利亞新教學院。研究嶺大校史的學者，多未有探究這兩所同由美國長老會成員開辦的基督教大學跟嶺大開辦的關係；事實上，在《成立簡章》之中，當時的成立團隊，也只是簡單表示期望在中國複製該兩所大學在「翻新和基督教化」(renovating and

05 鄭仰恩，〈當代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所面對的挑戰〉，頁20。

06 同上，頁23-26。

christianizing) 上的影響。⁰⁷

筆者遂翻查兩所學院的歷史，發現如果以普世合一的視角，兩所基督教學院都明確選用了「非宗派」(unsectarian / non-sectarian) 作為辦學宗旨，即不隸屬於包括美國長老會在內的任何教會宗派或宣教組織，並成立獨立的校董會，廣邀不同派別的社會賢達和宣教士，負責全權管理學院。⁰⁸ 翻查劍橋詞典，英文「非宗派」一詞，易有歧義，其被詞典翻譯為「不與任何特定宗教有關聯的」不過，無論是羅伯特學院，還是敘利亞新教學院，都在現實上，明顯並非要建立非基督教或非宗教的高等學府。以羅伯特學院為例，就清楚在成立時的憲章

07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Including a Review,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1898), p.29; 依據現時香港嶺南大學的紀錄，此文獻的年份被理解為 1885 年，惟根據 1900-01 年的學校概覽，此書的出版年份應為 1898 年。事實上，此書論到「當前的」學校情況，故基本上不可能於 1885 年創校前成書；故此，此註腳並沒有跟隨香港嶺南大學的紀錄，並將出版年由 1885 年更改為 1898 年；詳情可以參考：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899-1908,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G 11), Box 181, Folder 3246,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p.0012.

08 Fruma Zachs, "From the Mission to the Missionary: The Bliss Family and the 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 (1866-1920)," *Welt Des Islams* 45, no.2 (2005), 255-291. doi:10.1163/1570060054307552, p.264, 266-267; George Washburn, *Fif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and Recollections of Robert College*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2), p.16.

中，指出該校的成立與運作，是建基於聖經的教導，並明文要求學生每日讀經和祈禱至少一次，又必須出席安息日的基督教崇拜。⁰⁹敘利亞新教學院則相對較傾向自由主義的神學，對口傳福音和決志信主有較少的規範，其校長丹尼爾·布利斯（Daniel Bliss，1823-1916）在學校奠基時，就表示該校歡迎任何宗教、種族、膚色和國家的學生入讀，惟最終學生都會認識校方的信仰及背後原因；¹⁰其又在落任時，表示對於當地學生是否決志歸信基督教，其首要關注的，反而是能否塑造學生有耶穌基督的道德模樣。¹¹當然，學生必須祈禱和閱讀聖經亦長期是敘利亞新教學院的校規。¹²

因此，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其對「非宗派」的理解，亦難以是與去基督教化或去宗教化有關；相反，兩校的「非宗派」，更多是接受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及組織，參與學校的事工

09 George Washburn, *Fif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p.16.

10 Howard S. Bliss, *The Modern Missionary* (Beirut: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920), p.7.

11 Stephen B. L. Penros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866-1941* (New York: Trustee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41), p.84.

12 Lorella Ventura, *Hegel in the Arab World: Modernity, Colonialism, and Freedom*, 1st ed.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p.67-68.

之內，並對其他信仰的學生，保持尊重開放的態度。嶺大的創辦，參考了以上兩校，其中一個參考內容，顯然就是這種非宗派式的辦學宗旨，而此宗旨亦跟合一精神不謀而合。

三、十九世紀末廣州教會的合一情況

事實上，廣東一帶的基督教圈子亦早已有宗派合一的基礎和習慣。香便文牧師（Rev. Benjamin C. Henry，1850-1901），是早過安德·哈巴牧向美國長老會差會提出在中國建立基督教大學的美國傳教士，¹³亦是創校早期的校長，他在1885年完成的十年廣州宣教回憶錄中，形容廣州基督徒的宗派差異是「相對地輕微」（*comparatively slight*），當中之差異只是名義上，而非實質上的。¹⁴香便文繼續解釋，指由於廣州宣教士需要關注更重大的議題，並且要將福音簡明地向中國人闡釋，故大部分人都沒有將心力放在宗派教條的辯論上。如此，浸信會、長老會、循道會和公理會的神學差異討論，就在廣州處境下被暫時放下。他舉例說，廣州不同宗派的信徒和傳教士都使用相同的神學書籍、在循道公會傳教士口中會聽到充

13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p.8-11.

14 B. C.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And Company, 1885), p.349.

滿加爾文神學的講道，又或是會有長老宗人士以循道宗的邏輯去進行神學辯論；又，不同宗派的傳道牧師亦會定期會面，交流宣教情況和討論重大議題的教會立場，例如華人女士纏足等。¹⁵ 從香便文的一手文字和觀察，不難發現在前線工作的傳教士，在面對當時廣州的獨特處境下，對宗派神學上的差異持更開放的態度。

華人歷史學者亦有相似的結論。研究華南地區女性基督教史的黃慧賢，亦從宣教組織的報告中，觀察到早在 1870 年間，亦即嶺大成立以前，包括長老會在內的不同宗派傳教士，已經跨宗派地合作翻譯了首本廣東話聖經。¹⁶ 歷史學者吳義雄，亦指出長老會跟中國的合一運動有莫大關係。他表示，早在 1861 年，美國歸正宗與英國長老會已跨宗派在中國成立「中華自立長老會」；在 1870 年，長老會在華亦成立了「長老會中國大會」，旨在聯合中國不同地區，以及日本和暹羅的長老會，合一地推動傳教工作，參加者包括 27 名傳教士和 13 名中國牧師。1890 年，來自五個不同國家的長老會代表，共 120

15 Ibid, p.349-52.

16 Christina Wai-Yin Wong, "Contingent Companion with the Cantonese: Uncovering a Hidden History of Written Canto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Religions (Basel, Switzerland)* 15, no.7 (2024), 758. doi:10.3390/rel15070758.

人，亦在上海共商在華長老會合一的計劃。¹⁷ 由是觀之，除了香便文的主觀觀察，研究中國傳教歷史的學者，都對中國，特別是華南地區一帶的觀察，有相似的結論，可見當時在華的合一運動，是有一定程度的活躍。

在如此宗派合一的土壤下，可進一步讓讀者理解，為何嶺大在開辦之時，會留下歡迎不同組織合作的辦學宗旨，又建立了在長老會官方架構外的跨宗派管理團隊。筆者推斷，嶺大早期已能實踐宗派合一，這跟中國廣州教會的合一情況定必有正面的關係。

四、嶺南大學的非宗派理念及架構

正如前述，嶺大學長李端明認為嶺大並不是基督教大學，其推論很有可能就是受到「非宗派」(unsectarian / non-sectarian) 一詞的翻譯歧義影響，認為因為嶺大成立時已沒有一個或多個教會宗派作為後台，就不是基督教大學。¹⁸ 不過，透過嶺大的歷史原檔，已經可以證明此推論不成立；反之，

17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111-113。

18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頁 219-220。

嶺大更是一所充滿合一精神的基督教大學。在嶺大的《成立簡章》中，就指明其宗旨是要透過西方科學、醫學和宗教教育，培育受教育人士成為基督教傳教士、老師、醫生，又或是其他職業的人士。除此之外，簡章更指出嶺大將「致力於與所有宣教機構的代表及教育機構真誠合作，共同實現使中國啟蒙和基督教化的共同目標」。¹⁹ 在這樣擁抱合作的宗旨下，嶺大亦仿效了羅伯特學院與敘利亞新教學院的管治架構，在美國建立獨立於美國長老會和任何宗派的董事會，負責大學的財政、招聘、中國董事會委任等事宜，為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事實上，以 1898 年的中國董事會名單為例，雖然仍以美國長老會宗教人士為主，但從名單可見，來自本身已是跨宗派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國循道公會（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和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傳教士，正共同管理嶺大。²⁰

19 原文為：It seeks to co-operate earnestly with the agents of all missionary societies, and with al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common object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Christianization of China, see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Including a Review,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1898), p.29.

20 Ibid, p.20.

以上的宗旨和架構，與普世合一的精神不謀而合。一方面，嶺大脫離了創辦人哈巴所屬的美國長老會，並歡迎所有具相同辦學理念的宣教組織一同真誠合作；在架構上，亦不止包括同屬長老會的人士，更有來自不同差會的董事。另一方面，普世合一精神亦包含世上子民和生物的共存與合一；如果以此解讀，當時嶺大的宗旨——不止關注要基督教化中國學生，更關注本地社會在科學和醫學上的整體發展——亦是普世合一精神的展現。

五、嶺南大學非宗派理念的緣由及張力

究竟是甚麼內部因素推動嶺大在草創階段，已加入具合一精神的條文？根據現有資料，筆者無法明確知悉當時哈巴對普世合一的看法，甚至有學者曾指出哈巴推動嶺大跨宗派的定位，不過是因為他對美國長老會內部意見分歧的不滿，但該文章未有提供具體證據甚或相關引文註腳，故本文無法以此說法判斷當日哈巴的想法。²¹ 不過，筆者翻查創校早期的信件，就發現哈巴的兒子小哈巴（Andrew Patton Happer Jr.，

21 有指內部意見分歧一說，乃是因為部分美國長老會成員，認為嶺南大學應該只以傳播福音為目的，而不是哈巴提出的將中國啟蒙和培育各行業人才，詳見：Loren W. Crabtree, "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s in China, 1844-1891,"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62, no.1 (1984), p.28.

1849-1897) 曾在一封 1896 年寄給一名學校贊助人的信件中，指美國的長老會海外差會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曾認為該會沒有呼召去承擔在中國辦教育的責任，於是建議其父以個人名義，向個別信徒而非教會進行籌款活動。²² 事實上，早有跡象顯示，長老差會不太願意為建立大學的計劃承擔太多。根據 Corbett 的分析和原始檔案的顯示，香便文最初在 1884 年被長老會拒絕的建校計劃，跟哈巴後來修訂的計劃，其中一個主要分別，就是哈巴的計劃是將學校的管理權由長老差會獨立出來，財政、校政和任命等，不再由差會全權及獨力管理。²³ 從財政責任而言，筆者不難想像長老差會的考慮，畢竟如以哈巴在簡章中的估算，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學需要美元 \$300,000，惟以 1884 至 1885 年度差會在廣州的宣教開支，即美元 \$26,458 作對比，建立大學的開支確

22 Lingnan University, Letter from A.P. Happer Jr. to Sarah Carrington,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G 11), Box 183, Folder 3264,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p.0002-0003.

23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p.8-9;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 Based Primarily on the Records of the University's American Trustees*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10.

是龐大負擔。²⁴ 無論如何，哈巴新的計劃很快得到長老差會的官方許可，這決定某程度反映差會希望承擔的責任是有限的，也正因哈巴的計劃是將責任放於新組成的校董會，差會才有限度地支持哈巴的新異象。

在 1886 年哈巴與長老差會的信件中，亦可看到差會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差會明確指示哈巴，如果他要為將來的嶺大籌集資金，就要完全跟該會劃清界線（free of any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Board），並停止繼續受薪於差會。哈巴回覆指，在長老會數十年服侍，他並不希望與長老會脫離關係，但同意為新校的開設而停薪。²⁵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哈巴當時的妻子邵姑娘（Hannah J. Shaw）都跟哈巴一同在華傳教，惟哈巴在通訊中表達二人一直只收一人的薪金，故當時長老差會停止向哈巴發薪，不難想像對哈巴一家的財政狀況有一定的

24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p.29-30;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Annual Reports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83-1892*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Board, 1916), p.142.

25 Summary of a Letter dated New York March 12, 1886 to Dr. Ellinwood, Lee Sui Ming papers, HK hkla-PC001.LEEsm.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影響。²⁶ 1887年，哈巴再同樣去信時任差會秘書埃林伍德博士（Dr. Ellinwood, F.F, 1826-1908），重申其希望與長老會繼續保持合作的誠懇意願，又進一步指即將建立的新校中，學生多為廣州長老教會的成員，並且會長期與長老會的牧者長老互動，又很大機會會在畢業後加入長老會在當地的神學院，成為基督教的工人。²⁷ 哈巴似乎希望向差會說明，其新校的建立，對長老教會在廣州的宣教工作，是絕對有利而相關的。在1888年一封跟新校董事會主席的信件中，他讚揚董事會在面對財務等困難中，團結一致地守護了長老教會的利益和嶺大的情況。²⁸ 從文字看來，哈巴對長老教會的忠誠度和歸屬感，是甚為明確的；哈巴跟長老教會的關係，亦顯然有其複雜張力之處。

從以上的來回信件可見，似乎哈巴留在長老會的意願和對宗派的忠誠，是大於長老會海外差會想哈巴留在差會繼續辦學的意願的；而且，明顯地，在呼召有異的說法下，差會一方

26 A Letter to Dr. Ellinwood from Happer dated November 3, 1887, Lee Sui Ming papers, HK hkla-PC001.LEEsm.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27 A Letter to David Torrens from Happer dated June 30, 1886, Lee Sui Ming papers, HK hkla-PC001.LEEsm.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28 A Letter to R.R. Booth from Happer dated July 26, 1888, Lee Sui Ming papers, HK hkla-PC001.LEEsm.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面只支持一個脫離其架構的建校計劃，另一方面亦主動停止為哈巴提供個人薪金、官方資源和教會連繫，最終某程度上促使了哈巴和嶺大走向非宗派辦學之路。

HAVING ALREADY PLEDGES AMOUNTING TO \$25,000, FOR COLLEGE DR. HAPPER SEEKS
OPPORTUNITY TO DISCUSS WITH BOARD OF MISSIONS

Summary of a letter dated New York March 12, 1886 to Dr. Ellinwood: -

Stated that he wished to present some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college to the Board of Missions, bearing upon a report which had been adopted by the Board. He thanked the Board for its confidence in him. The Board had declined to endorse the project until more fully informed and until it knew the views of various missions in China. Dr. Happer stated that the plans were to be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Beirut: a preparatory school, a college, and a school of medicine - all to be strictly Christian. "First to seek the conversion of the students who are not converted and to train all of them for active Christian work, whether in the ministry or in secular employments. The Bible will be a class book in all classes, and all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attend Christian worship daily." The Board of Trustees will represent the donors and should have responsibility for location of the college and its methods. He had letters from fourteen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from four other missionaries. He lists the names, many of them very prominent persons. All warmly favored the project except one, who said however that he would support it if the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All these missionaries favored the location of the college in Central China except Dr. Noyes and Dr. Henry, of the Canton mission. They preferred that the college be in Canton and for that province. All of them preferred that it be a national institution.

The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Board which had taken the whole matter under consideration said that the person raising funds for the college should be free of any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Board. Dr. Happer said that he could do without the salary from the Presbyterian Board but did not wish, after so many years, to break his connection with the Board. He stated that the professors would all aid in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 Th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had said there must be no solicitation of churches but only of individuals and that a total of \$50,000 might be obtained in this way. Dr. Happer agreed never to solicit churches. Said he had already obtained \$25,000 toward the endowment of the college - all of this except \$1,500 obtained elsewhere than New York. The next sentence in his letter is not entirely clear. It seems to mean that he had undertaken through a friend to obtain subscriptions of \$125 annually from each of ten persons for a total of six years, equal to \$1,250 per year. He said six had already been secured and that the other four would probably be secured within a week. A good many other persons had promised to pledge in the near future. He had been advised however not to press these persons until the prospectus should have been published. He hoped that things might be so successful that the college could be opened in the relatively near future. He wished the permission of the Board of Missions to issue the prospectus. He raised the question whether missionaries of the Presbyterian Board in China might become professors in the institut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ime would be allowed for replacing them and that they would, so far as practicable, continue to do evangelistic work.

哈巴與美國長老會差會在 1886 年的書信撮要，顯示長老會將在籌創嶺南大學時，停止向哈巴發放薪金²⁹

29 Summary of a Letter dated New York March 12, 1886 to Dr. Ellinwood, Lee Sui Ming papers, HK hka-PC001.LEEsm.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六、財政與人際支持上的多元合一

結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論是名義上，還是財政上支持哈巴建立嶺大的人士，就變得更多元。在名義上，哈巴在 1886 年 3 月已獲得 14 名長老會傳教士的支持，另外亦有 4 名來自不同宣教組織的傳教士支持信件。³⁰ 在《成立簡章》上，亦有 37 位社會賢達在簡章上具名表揚及推薦哈巴的計劃，當中除不少長老會背景的信徒外，亦有來自跨宗派的西部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跨宗派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協同歸正宗教會（Collegiate Reformed Church）、非宗派的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非宗派的美國福音單張協會（American Tract Society）等不同神學背景的宗教領袖。在實際捐款名單方面，在超過 150 個名字上，同樣除長老會會友為首外，亦有來自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加略山教會（Calvary Church）、清教徒（Puritans）、伯特利德國教會（Bethel German Church）等不同教派的支持者，多元而合一地以金錢支持嶺大的建立。

30 Summary of a Letter dated New York March 12, 1886 to Dr. Ellinwood, Lee Sui Ming papers, HK hkla-PC001.LEEsm.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的而且確，以現有資料來看，普世合一的實踐與推動，跟權力、財政、宗派利益、呼召解讀等息息相關；而從結果而論，嶺大明文規定對於不同宗派的開放，顯然仍是不爭的事實；亦正正因為如此，哈巴及董事會才不止接觸自家海外差會尋求資源，反務必要將成立使命跟不同宗派、組織和背景的人士分享，並邀請他們一同參與建校計劃，建立一所宗派合一的中國基督教大學。

SUBSCRIPTIONS AND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April 1, 1887, to March 31, 1896.

[According to various memoranda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Treasurer.]

Agnew, Dr.....	\$39.00	Chinese S. S., University Place	
Allegheny North Church S. S.....	100.00	Church, New York.....	\$18.00
Allegheny Providence Church.....	95.00	D. Miss.....	5.00
Alling, Mrs.....	10.00	Daring, T. G.....	5.00
Alexandria Pres. Church.....	55.00	Davis, Robert, San Diego, Cal.....	25.00
Anderson, Miss.....	5.00	Denver Church, Young People's	
Anderson, Mr.....	25.00	Council, Scholarship.....	50.00
Arnold, B. W., Albany, N. Y.....	50.00	Diderick, A. W., Albany, N. Y.....	10.00
B. Miss.....	25.00	Dodge, Mrs. W. E., New York.....	1,000.00
Baird, Miss.....	1.00	Dodge, Rev. D. Stuart, New York.....	500.00
Baldwin, D. H., Cincinnati, O.....	10.00	Dunn, Miss, Albany, N. Y.....	500.00
Baldwin, Mary.....	5.00	Erdman, Rev. A. D. D., Four	
Baltimore Central Church.....	5.00	Scholarships.....	200.00
Bartlett, W. A., Washington, D.C.....	505.00	Ewing, Miss Amelia, Newton, Pa.....	50.00
Beason, N. S., Allegheny, Pa.....	20.00	Foster, Miss.....	2.50
Beesen, Mrs.....	25.00	Freshmuth, W. D., Philadelphia.....	5.00
Bellefontaine Church, O.....	4.00	Fulton, E. M., Pittsburg, Schol-	
Bethel German Church, Mo.....	50.00	arship.....	500.00
Blair, Andrew, Philadelphia, Pa.....	190.00	Fulton, J. Alex., Dover.....	5.00
Blair, John I., Blairstown, N. J.....	10.00	German Church.....	8.00
Blairstown Church, N. J.....	625.00	Gibson, Miss S.....	5.00
Bradley, Mrs.....	100.00	Gill, John B., Philadelphia.....	25.00
Branson, Ira L.....	15.00	Grand Haven, Mich., S. S.....	10.00
Brown, George, Baltimore, Md.....	1,000.00	Greene, Mrs. W. B., Philadelphia.....	25.00
Brunot, Felix R., Pittsburg, Pa.....	100.00	Haines, Mrs.....	10.00
Brunot, Mrs.....	100.00	Hamilton, Mrs. John, Altoona, Pa.....	10.00
Bryn Mawr Pres. Church S. S.,		Happer, A. G., Washington, Pa.....	100.00
Scholarship.....	150.00	Happer, Mrs. A. G., Washington,	
Butler, Horace and Emma, Blairs-		town, N. J.....	100.00
town, N. J.....	2.00	Happer, A. P.....	10,000.00
Campbell, Mr.....	5.00	Happer, Dr.....	5.00
C. Mrs.....	5.00	Happer, J. A.....	42.00
Butler, Dr.....	5.00	Happer, J. S., from DeWitt Me-	
Carrington, Miss Sarah, Coe-		morial, New York.....	15.00
brook, Conn., Yew Fun Tan Me-		Happer, M. W., Washington, Pa.,	
morial Scholarship.....	1,000.00	for Scholarship.....	50.00
Cary, L., Allegheny, Pa.....	20.00	Happer, W., Washington, Pa.....	50.00
Chamberlain, Rev. Dr. for Friend,		Harbeson, Mrs.....	50.00
Brooklyn, N. Y.....	5.00	Harper, Miss T. E., Minneapolis.....	2.00
Cleveland, Mrs. Fred., Albany,		Hitchcock, Dr. W. E., Philadel-	
N. Y.....	10.00	phia.....	25.00
Converse, John H., Philadelphia,		Jacobs, Mrs.....	5.00
Pa., Four Scholarships.....	5,000.00	Jerman Memorial Church Mis-	
Converse, John H., Philadelphia,	200.00	sion Board.....	50.00
Pa., Professorship.....	200.00	Johnson, Dr.....	20.00
Cooper, Miss.....	2.00	Kerr, Thomas B., Esq., Pittsburg.....	15.00
Cornell, Rev. H., E. Palmyra, N. Y.....	35.00	Killar, Thomas M., Philadelphia.....	600.00
Craighead, J. G.....	900.00	Knight, Mrs.....	5.00
Croft, Miss S. R., Lake City, Wis.....	2.00	Lathrop, Mary.....	5.00
Chinese S. S., Boston, Mass.....	10.00	Lawton, Mrs. J. L., Albany, N. Y.....	10.00
Chinese S. S., Mt. Vernon Ave.		Laughlin, Mrs.....	100.00
Church, Boston.....	108.00	Laughlin, James, Pittsburg.....	250.00
Chinese S. S., Colorado Springs,		Lewis, H. G., Philadelphia.....	20.00
Colo.....	25.00	Lewis, L. H.....	10.00
Chinese S. S., Central Church,		Lightall, Miss B., Montreal, Can.....	15.55
Denver, Colo.....	100.00	Lowrie, Mrs. M. N., Warrior's	
Chinese S. S., Denver, Freeman		Mark, Pa.....	108.00
and Chain.....	100.00	Lowrie, Miss.....	20.00
Chinese S. S., Germantown, Pa.....	5.00	Manning, Henrietta, New York.....	100.00
Chinese S. S., Jersey City, N. J.....	10.00	Marquand Estate, D. W. McWill-	
Chinese S. S., Montreal, Can.....	12.14	iams, Trustee.....	1,000.00
Chinese S. S., Milboro, Mass.....	6.00	Martin Henry, Cincinnati, O.....	25,000.00
Chinese S. S., Broadway Tab.,		McCarroll, L. J. M., Harrisburg.....	603.00
New York, Scholarship.....	50.00	McCarroll, L. J. M., Harrisburg,	
Chinese S. S., Pilgrim Cong.		Professorship.....	850.00
Church, New York.....	100.00	McCook, Rev. Dr. for Anon, Phil-	
Chinese S. S., Second Pres. Church,		adelphia.....	5.00
St. Louis.....	200.00	McCook, Rev. Dr. for A Friend,	
		Philadelphia.....	5.00

31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Subscriptions and Donations Received, 1898, in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Including a Review,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1898), p.24.

結語

本章首先解釋及為「普世合一」提供框架，以幫助其後章節的討論。筆者由嶺大草創初期開始研究，探問《成立簡章》中提到的羅伯特學院和敘利亞新教學院跟嶺大的關係，並指出其中一個重要關聯，是在於兩所學院跟後來建立的嶺大，同樣是以獨立於長老會架構和以「非宗派」理念辦學的。然後，本文又透過香便文在廣州宣教的回憶文本及歷史學者的研究，進一步幫助讀者理順廣州教會合一基礎與嶺大合一精神的正面關係。在這樣的土壤之下，創辦者哈巴就在創校的簡章中，明確加入了與不同機構合作的條文及脫離長老宗的架構，為日後嶺大走上普世合一的道路，建立了重要基石。其後，本文繼續深入發問哈巴在嶺大推動宗派合一的內部因素及其中張力，並翻查了當時幾份通訊信件，發現哈巴留在長老會的意願，是比長老會繼續支持哈巴立校的意願更大，亦因差會試圖斷絕與哈巴的正式關係，驅使與長老會感情深厚的哈巴，必然需要開放尋求不同宗派人士的支持，令支持及捐款名單中，出現為數不少長老會以外的宗派人士。綜上所述，讀者可以發現，普世合一精神跟嶺大之草創使命，因着前述的不同因素和張力，早已經關係密切了。是故，若問 1888 年開創前後的嶺大是一所怎樣的高等學府，筆者認為答案乃：一所普世合一的基督教大學。

第二章：從普世合一視角看宗派合作

引言

上一章提到，嶺南大學（嶺大）作為一所跨宗派的中國基督教大學，在辦校初期，早已因為種種因素，例如宗派內的張力、廣州合一的土壤和長老宗其他基督教大學的經驗等，在《成立簡章》和架構中，早早植下普世合一的根基。不過，徒有初心，卻沒有持續執行跨宗派合一的行動，亦不必然代表嶺大就是一所具普世合一精神的大學。因此，本文將繼續探問：究竟在成立以後，直至歸回國人自辦，嶺大是否仍然保存普世合一精神？如是，是如何付諸實行？本章將分別從嶺大與廣州協和神學院（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的密切關係、與倫敦傳道會的首個合作，和與其他組織如大英循道會差會（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或美國大學差會的協議，透過部分史學家未有重點留意的原始史料和其他學者的整理，具體地以實例論證廣州嶺大如何至少在 1927 年前，是一所具有普世合一精神的中國基督教大學。

一、嶺南大學與廣州神學教育的合一關係

的而且確，同處廣州的嶺大和 1914 年成立的協和神學院

（原稱：廣州基督教高等協和神道學院），⁰¹ 在官方架構上，至少在 1927 年或以前，並沒有任何從屬關係。不過，誠如李志剛指出，嶺大一直十分重視神學教育，並與協和神學院一直保持緊密關係，在管理層、教學團隊和學生修課三方面，人事上都有甚多重疊。⁰² 翻查史料，在 1913 年 1 月 30 日，由知名推動教會合一的基督教領袖約翰·穆德（John R. Mott, 1865-1955）領導之會議中，嶺大的代表就指出，如果要聯同其他一同出席的九個傳教組織，合一地推動廣東的神學教育，嶺大「必定竭盡全力供養這個學院」（will certainly make every effort to feed such an institution）。⁰³ 事實上，在臨時董事會主席麥沾恩（George H. McNeur, 1871-1953）的領導下，曾一度決議要盡快建立一所隸屬嶺大的聯合高等神學院，惟有關隸屬嶺大的建議，遭到部分傳教組織之反對而作罷。最終，在美國長老會、加拿大長老會、紐西蘭大英循道會差會、大英循道會差會、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同寅會（United Brethren Mission）、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 Society）和倫敦傳道會聯合出資、派員教學，甚至合併宗派

01 黃增章，〈廣州協和神學院概述〉，2003.1《廣東史志》（2003年），頁46。

02 李志剛，〈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其影響〉（台灣：中原大學，1990），頁13。

03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1924), p.15.

原有神學學校下，協和神學院正式獨立營運，成為廣州一所重要的跨宗派神學院。⁰⁴

誠如前述，雖然協和神學院最終獨立運作，惟嶺大的管理層和教職員仍為協和神學院的重要成員。例如倫敦傳道會的白士德（Alexander Baxter，1882- 卒年不明）一方面是協和神學院創院董事，亦同時是其差會派駐嶺大的傳教士和宗教科教授；又如包令留（Henry C. Brownell，1887-1970）是協和神學院董事，同時是嶺大的歷史系教授；⁰⁵ 第二任院長龔約翰（John S. Kunkle，1880-1948）亦在嶺大歸國人自辦後成為嶺大校董；⁰⁶ 1924年任嶺大校長的香雅各（James Henry，1880-1956）則在加入嶺大前為協和神學院的全時間教授。⁰⁷ 華人方面，有嶺大畢業並後來回母校任教英文的關恩

04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p.15-18：例如長老會就合併其本身於廣州花地營運中的神學學校，將資源集中投放於協和神學院，參考：A Letter by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CUSA to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dated 13th Jan 1915,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Box 938, Folder 53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05 *Ibid*, p.33.

06 高冠天編，《嶺南大學接回國人自辦之經過及發展之計畫》（廣州：嶺南大學出版委員會，1928），頁174。

07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p.27.

佐，亦是協和神學院董事會成員；⁰⁸ 牧師招觀海、首兩任華人校長鍾榮光和李應林、校徽創作人司徒衛、校歌填詞人陳輯五和後來成為嶺南星加坡分校校長高冠天等重要的嶺大領袖，都分別在不同時期，擔任協和神學院的老師、顧問或議會成員，實可見兩校的關係極為密切。⁰⁹

課程方面，嶺大除了在 1910 年代末與美南浸信會在廣州開辦的紀好弼神道學校（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互認學分，亦在相近時期，同時承認協和神學院的學分，不同校園的廣東學生故此可以遊走不同學校，選修神學和神學以外的學科，並可以使用館藏較豐富的嶺大圖書館。¹⁰ 甚至根據龔約翰的紀錄，在 1920 年 4 月，協和神學院與嶺大在本地已經簽訂聯盟協議，指明只要當時嶺大順利升格為大學時，協和神學院

08 蘇成溢、黃慧賢，〈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會長（1928-1949）關恩佐執事〉，773-774 《滙聲》（2022 年 1/2 月）：頁 6-7

09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p.33-38；〈本坡嶺南分校聘定高冠天為校長 不日可抵步就在〉，《南洋商報》，1935 年 1 月 10 日，頁 8。

10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p.34；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talogue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Academic Year 1920-21* (Canton, China, 1920), p.41.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coo.31924023312915>；黃增章，〈廣州協和神學院概述〉，2003.1《廣東史志》（2003 年），頁 49。

就會成為嶺大內唯一的神學學院（School of Theology），可惜最終因嶺大在美的基金會和本地註冊問題等因素而未有執行，¹¹並要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的加盟聯合才得以正式實現。¹²

以上論證，除了期望指出嶺大在 1927 年以前，與廣東神學教育，特別是協和神學院的緊密關係，更是希望論證嶺大與普世合一的聯結。協和與嶺大的合作，不止是兩校合作般簡單，更是證明嶺大對於由多個宗派聯辦的神學教育，由開辦以來都是持有非常正面的態度和支援。即使協和神學院和紀好弼神道學校的組成，是有長老宗以外的多元宗派，例如聖公宗、同寅會、循道宗、浸信會等，其中的神學立場和信仰實踐亦必然具有差異，惟最終都無阻嶺大派遣其管理層和老師兼任協和神學院的要職，又或與兩所神學院簽署互認學分的官方協議。這種與廣東神學教育的支持和兼容，除了讓當時的嶺大學生，可以修讀不同宗派的神學課程，認識不同宗派之神學與傳統，又讓廣州的神學生，可以涉獵跨學科的知識，更實務地支持着

11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p.34-35；李志剛，《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其影響》，頁 13。

12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Lingnan University-Affiliation Plans*,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File No.538, Record No.2769,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Archives, Hong Kong.

跨宗派合一的神學教育發展。

二、嶺南大學早期與差會的合作協議：與倫敦傳道會的合一嘗試

嶺大除了與當區神學院合作，亦合一非一地與不同背景差會建立協作關係，其中早期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1915 年與倫敦傳道會的正式聯盟。翻查歷史檔案，早於 1909 年 12 月，嶺大已經制定政策，授權美國基金會和校長，可以主動接觸在廣州的不同差會，邀請其出資派駐教員在校，又或者在建築經費上提供支持，以擴大嶺大的工作，並長遠建立一個在南中國聯合的基督教教育事工。如果廣州的差會願意支持，其就有權派遣一名代表加入美國嶺南基金會，參與嶺大的最高決策。¹³以 1915 年倫敦傳道會加入時為例，當時教員人數約為 47 人，¹⁴如果差會只須資助一人成為全職教員，就可以擁有參與最高決策的一票和相關權力，就比例上而言，這是對其他宗派非常開

13 Regulations on Cooperation adopted by the 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Box 940, Folder 56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14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919,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G 11), Box 181, Folder 3247,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p.0185-0187.

放慷慨之舉。如此對其他宗派差會的權力開放，相信源於嶺大是一所跨宗派的大學，亦源於其相信這樣的合一聯合，對自身和南中國基督教教育的發展具正面作用。最終，倫敦傳道會委任了該會秘書霍堅士（F.H. Hawkins, 1836-1936）為基金會成員。¹⁵

事實上，倫敦傳道會本身已經是跨宗派的差會。根據 Roger Martin 的研究，倫敦傳道會在成立時早已跟合一精神種下關係，甚至被形容為英國歷史上首個非宗派的基督徒組織。該研究指出，倫敦傳道會成立時的初衷和相關組織附例已經清楚列明，該會的設立並不是要傳播特定的教會制度，例如長老制、獨立制或主教制，而是單單傳播上主榮耀的福音給異教徒。事實上，雖然倫敦傳道會成員主要是來自改革宗和嬰兒洗禮派，惟其傳教士亦有來自不同宗派的。¹⁶ 因此，同樣是跨宗派的嶺大與倫敦傳道會的合作，亦更顯得順理成章。

15 A Letter on Cooperation with the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dated 23rd March 1922,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Box 940, Folder 56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16 Roger H. Martin, "The Plac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1, no.3 (1980), p.289-291. doi:10.1017/S0022046900033340.

在如此背景下，雙方就在 1915 年簽訂協議，差派白士德成為嶺大宗教科的唯一教授，又主理全校的宗教活動，更曾任署理校長。¹⁷ 白士德對普世合一的態度顯然是非常正面，在其於 1918 年至 1919 年間遞交至差會的報告中，就特別提到長老會、公理會和倫敦傳道會在 1918 年 4 月舉行的聯合大會，以及後來成為「中華基督教會」的跨宗派教會聯合計劃，更形容此年將會被寫進歷史當中。他更表示，中國有極大的需要去聯合所有宗派的信徒，為國家的道德拯救而努力。¹⁸ 除了表達對中華基督教會成立的歡迎，他亦在報告中分享其如何積極在校園中推廣基督宗教活動，例如每週均有教職員祈禱會，由所有華人和西方教職員輪流主領；同時，每週三上午有學生祈禱會，每月有一次大型聯合祈禱會。每逢主日，嶺大均有自己的

17 Norma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98.

18 中華基督教會於 1927 年才正式成立，故白士德在此提及的，實為三宗派在長老會總會上有關成立一個中國聯合教會的決議和草擬相關章程的行動，詳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歷史沿革〉（日期不詳），2025 年 2 月 10 日取自：<https://www.hkcccc.org/aboutus/> 及 Wai-Yin Christina Wong, "Women's Work for Women: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and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anton, South China, 1847-1938" (Ph.D.,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2015), p. 237-238; Report by Alexander Baxter, Canton [Guangzhou], 1918-1919 dated Sep 1919,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 CWM/LMS/16/06/1/054/02. Special Collections, SOAS Library, London, p.1. <https://digital.soas.ac.uk/CW00000499>.

英文崇拜，除嶺大自己的傳道牧者，崇拜亦會開放邀請大部分廣州差會派員前來證道，又舉辦「神學生主日」，邀請協和神學院主領崇拜和講道，以加強兩校學生交流，互惠受益。英文崇拜以外，嶺大亦在鍾榮光家中特設中文崇拜，照顧不擅英文的師生及其親屬。在其中一個主日，嶺大亦曾舉辦兩場工人佈道會（又名「收割會」），主講講員是來自浸信會差會的牧師。而決志信主的參加者，白士德表示他會鼓勵他們參與廣州不同的教會。¹⁹

以上匯報，一方面可以讓讀者看到嶺大宗教活動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亦見證在白士德推動下的嶺大合一精神。例如在校園中不同的宗教聚會，基本上都沒有限制主領者的宗派背景，甚至邀請所有教職員輪流主持。另外，嶺大跟廣州的差會、神學院和牧師，都維持友好合一的關係，更長期開放證道講壇，容讓不同宗派的人士前來分享主道，無懼神學立場和傳統的不同。最後，決志歸主的信徒，亦不會被限制於參與某個宗派的教會。以上種種，都展現着倫敦傳道會和白士德對普世合一的支持；正因如此，根據 1918 年至 1919 年的統計，當時嶺大的學生雖然高達 34% 加入了長老會，22% 加入了倫敦傳道會，但其他基督徒學生亦有不少參與了浸信會（12%）、

19 Ibid, p.2-3.

聖公宗（6%）、循道宗（8%）、公理宗（4%）或其他宗派的教會。²⁰ 如此可見，雖然與嶺大相關的長老會和派員入校的倫敦傳道會，仍自然地吸引大量嶺大基督徒學生加入，但學生的宗派連繫亦因校內普世合一的實踐，維持多元，此乃合一非一的具體展現。

此外，誠如前述，白士德亦為嶺大的宗教科教授，負責整個大學宗教科的教學。翻閱不同年份的學校概覽，筆者發現，課程內容在白士德的主理下亦出現了改革，對於跟非基督宗教的合一對話，始有展現。在 1909 年至 1911 年的宗教課程設計中，嶺大學生的宗教科只單獨圍繞基督宗教，要求學生在四年間修讀福音書、耶穌教導和舊約聖經的課堂。²¹ 然而，翻查 1917 年至 1918 年度的學校概覽，即白士德加盟後的時間，其已經在課程架構中首次加入「宗教比較」（Comparative Religion）的課程，以檢視古代和當代的主要宗教，包括泛靈論、遠古近東、希臘時期和羅馬時期的不同宗教，與及跟日本、印度和中國等的東方宗教系統進行對比。這個宗教比較課程，並不是直接指出基督宗教比以上宗教優越，反而是鼓勵學生發

20 Ibid, p.5.

21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1, Catalogues 1899-1948, Lingnan University Trustees, Lingnan University Archives,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p.32.

問一個世界共通的宗教是否可能和這個宗教是否為基督教。²²無可否認，觀乎整個由白士德設計的宗教課程，仍然以基督宗教作為主導，因在宗教比較以外，均是例如基督教護教學、耶穌生平、教會論、基督教倫理等的基督宗教課程，目的都甚明顯——宣揚單一宗教。²³不過，對比較早期的宗教課程，新的課程開始與不同時期和地域的宗教體系進行對話，確實符合普世合一運動對跨宗教和文化對話的強調。²⁴

總的而論，在嶺大與倫敦傳道會的合作中，可見嶺大對廣州不同差會的歡迎，甚至開放差會代表加入管理核心，亦將校內大部分宗教事務和課程，放心交予來自倫敦傳道會的西教士白士德。結果，校內宗教事務維持合一多元，不同宗派的傳教士和神學生亦可以參與其中，分享講壇，信徒學生亦可自由加入不同傳統的本地教會。另外，宗教課程逐漸加入宗教比較的元素，鼓勵學生認識非基督宗教的文化傳統，進行對話，亦

22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919, p.0229.

23 Ibid.

24 Commission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and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Together Towards Life: Mission and Evangelism in Changing Landscapes* (Switzerland: Commission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2012), p.6. https://www.oikoumen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ogether_towards_Life.pdf.

是進步之處，是普世合一精神的重要展現。

三、嶺南大學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合作

除了與協和神學院與倫敦傳道會等的合作外，嶺大亦持續與不同團體建立正式夥伴關係，實踐其「嚴格非宗派」(strictly non-sectarian) 但「公開地基督教」(avowedly Christian) 之院校特質。²⁵ 繼倫敦傳道會後，另一個差會的重要合作，可以追溯至 1922 年與大英循道會差會的協議。根據當時嶺大與大英循道會的合作邀請信，時任校長晏文士 (Charles K. Edmunds, 1876-1949) 就向差會表達了對兩機構的未來合作，是感到確實非常高興而且是高度歡迎 (most highly welcomed)。在信中，晏文士亦表達了對其他數個廣東差會的歡迎和邀請，惟不少差會因經費問題，未能出資合作。信中亦表達，同樣地，只要循道會願意支持一個教員的薪金，該會就可派一名代表加入美國基金會參與決策。²⁶ 結果，在 1922 年 6 月，雙方順利達成協議，差派牧師李富士 (Ronald D. Rees, 1888-1975) 到嶺大成為歷史系的助理教授，並兼教英文和星

25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1, p.10.

26 A Letter on Cooperation with the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dated 23rd March 1922.

期日的主日學。²⁷ 1918年，嶺大與聖公會海外傳道會亦曾建立短暫的合作關係，差派牧師羅杰斯（W. W. Rogers，生卒年不詳）駐校教學。²⁸ 1923年，嶺大亦重新與美國長老會建立類似的合作，委派陳真福（Selden Spencer Jr.，1889-1930）到校任教英國文學。²⁹

除了傳統差會，嶺大亦與美國大學的差傳事工經常合作，例如在1907年起與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合作，主要以美國教會會眾的奉獻支持高魯甫（George Weidman Groff，1884-1954）在嶺大校園中建立農科教育，改善中國的農植技術，並「透過農業的研究、教育和實踐，協助在中國開展工作的宣教事業，促進中國農產業自給自足，培養中國人的基督教品格、

27 A Letter on the Appointment of Donald Rees dated 17th June 1922,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Box 940, Folder 56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28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919, p.0273；羅杰斯及聖公會海外傳道會的名字在1919-20年的學校概覽已經消失，原因暫時不明，詳見：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19-1924,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G 11), Box 181, Folder 3248,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p.0335。

29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24-1929,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G 11), Box 181, Folder 3249,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p.0704, 0777.

團契和勞動精神」。由此可見，本身來自長老宗的高魯甫來華，並不止希望改善中國的農業技術，更是帶着宣教的理想。³⁰ 同樣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可以因此派員加入美國嶺南基金會。³¹

另外，繼高魯甫來華後，美國多間大學，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瓦薩學院、匹茲堡大學、威廉士文理學院的青年會海外事工（The Foreign Works of 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與及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和堪薩斯州立大學農科學院的差會，都分別各資助一名教員在嶺大教學與傳教，教授不同的學科和課程，如病理學、數學、教育、女校課程、物理學和畜牧學等。³²

30 "Vignette-Penn State in China," , accessed 8 Feb, 2025, <https://libraries.psu.edu/about/collections/penn-state-university-park-campus-history-collection/vignette-penn-state-china>; George Weidman Groff, *Agricultural Reciprocit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 Agricultural Reciprocity Promoted through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New York: 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11), p.38.

31 Fact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Missions in China and the 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Box 940, Folder 56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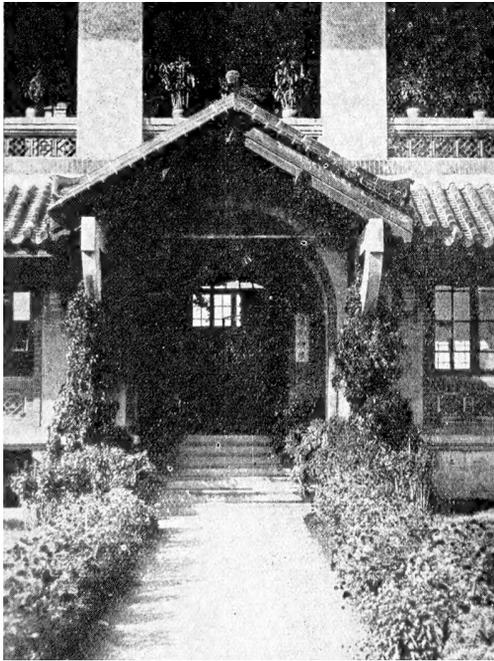
32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919, p.0273；青年會由創立至今均為非宗派組織，在英國的成立團隊來自聖公宗、浸信宗、公理宗、循道宗等宗派，詳見：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7), p.21-22.

由此可見，嶺大與美國不同的海外差會都有非常頻繁的合作，超越宗派背景的差異，接受不同大學差會的幫助和加入，為求令廣東基督教教育得以更有力地發展，着實跟普世合一精神不謀而合。

結語

總的來說，本章透過嶺大多方面的對外合作，證立嶺大不止在開校時期才訂立跨宗派合一的宗旨和架構，亦切實地以行動與多方合作，共同推動廣東的基督教教育和傳教工作。首先，本文整理了嶺大與廣東神學教育，特別是與協和神學院的合一關係，在學者李志剛的研究根基上，更具體地勾畫嶺大重要人物跟協和神學院密不可分的關係，又展示兩校如何在學分上互認，惠及兩校學生。然後，本文再整理嶺大與跨宗派的倫敦傳道會之重要合作，展現嶺大如何開放地邀請該差會加入管理層，又從傳教士白士德的報告中，讓讀者了解當時嶺大的宗教活動是如何廣納在廣東不同宗派的牧者前來，實踐普世合一的精神，讓學生自由加入不同傳統的地區堂會。最後，筆者亦透過歷史資料，補充了大英循道會、聖公宗和美國長老會與嶺大的合作協定，繼續力證嶺大對普世合一運動的正面支持。最後，文章討論了美國大學差傳事工與嶺大的頻繁合作，在農科和其他學科上，都得到至少六間美國大學差傳事工的資金支

持，可見嶺大與美國大學差會的關係甚為良好，亦見普世合一的實際成果。以上的歷史證據和相關的推論，均指向嶺大在開校一段時間後（1888-1927），仍然成功保存合一精神，並透過與神學院、差會和海外大學合作，將合一精神付諸實行，以使南中國的基督教教育和傳教工作，都得以穩定蓬勃發展。



廣州協和神學院的正門，寓意神學院是開放給來自不同教會、不同國家的人³³

33 *The Open Doorway, in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1924), Frontispiece.

第三章：從普世合一視角看青年會運動

引言

關於廣州嶺南大學（嶺大）學生青年會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非常欠奉，研究缺口甚為明顯。最近期的相關學術文獻，只能追溯到1938年及1949年兩篇由當時嶺大學生手寫的畢業論文。⁰¹ 而有關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詳細研究，則務必參考邢軍與趙曉陽的專著，其中邢軍集中整理了民國時期中國青年會與美國社會福音的關係，對於讀者理解中國青年會背後的神學理念和其引申出來的工作，具有正面作用；趙曉陽的著作，則整理了中國各地城市青年會和學校青年會的簡史，又介紹了28位中國青年會的中外重要人物，對於讀者認識整個青年會運動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概括的圖畫。⁰² 雖然以上兩書，遺憾地沒有處理嶺大青年會的歷史，亦沒有提及中國青年會與合一運動的關係，惟本章作為填補相關研究缺口的文

01 陳繼明，「私立嶺南大學基督教青年會之社會事業」（學士畢業論文，廣州嶺南大學，1938）；周玉仙，「廣州基督教學生團體工作概況」（學士畢業論文，廣州嶺南大學，1949）。

02 邢軍，《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章，仍然需要建基於兩位學者的研究，讓本章更整全地理解中國青年會運動在嶺大的發展。此外，部分近代學者對於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尤甚興趣，她們從清末民初時期的歷史入手，探問社會福音、青年會跟中國社會政治的關係和貢獻，在廣州青年會和嶺大青年會關係緊密的背景下，對於本文理解嶺大校內青年會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⁰³

不過，顯然而見，以上研究集中討論省市層面的青年會工作，對於院校如嶺大內的學生青年會，則鮮有討論。不過，嶺大學生青年會作為比廣州青年會更早成立的青年會組織，對於嶺大內外的貢獻都是不容忽視的。⁰⁴ 本章對嶺大學生青年會的研究，亦可以讓讀者更了解在清末民初時期，青年會運動在大學院校的工作和影響，以至合一運動跟青年會的關係。因此，本章將續以普世合一的視角，從不同的文獻史料，首先整理青年會跟合一的關係，然後探問嶺大學生青年會的基督宗教工作，並梳理嶺大青年會如何在合一的精神下，積極參與社會

03 黃春艷，「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4-1922)」(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13)；Cheuk Chi Cecilia Chung, "When Christianity Encountered Chinese Nationalism: Deviation of the Chinese YMCA from its 'Principle of Non-Involvement in Politics,' 1895-1937" (M.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doi:10.14711/thesis-991012769067603412.

04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於1909年成立，嶺大青年會則在1904年已經成立。

關懷、義教，甚至社會改革的工作。最後，本章亦會整理嶺大青年會與其他基督教組織，例如姊妹組織嶺大女青年會和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的關係，期望指出嶺大青年會跟普世合一精神是息息相關的。

一、青年會運動跟合一運動的關係

雖然於 1844 年在倫敦成立的青年會，跟 1920 年代開始的普世合一運動，在時間上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惟如本論文第一章所提，學者早已指出青年會運動跟普世合一的精神非常相關。FitzGerald 的研究指出，青年會一方面並不屬於任何宗派或教會，另一方面，只要青年信徒願意承認基督為救主，成為其門徒，就可以自由參與其中。正因如此，青年會在二十世紀初的合一運動，都扮演積極的角色。⁰⁵ 學者進一步解釋指，自約翰·穆德畢業加入美國青年會工作和推動學生志願宣教運動後，就積極推動信徒將宣教使命放高於各宗派的神學差異之上，並創立合一團體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WSCF），協調學生志願宣教運動和男女青年會的宣教工作，不分宗派地推

05 Thomas E. FitzGeral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Conn, 2004), p.63-64.

動——主要是平信徒青年——參與世界宣教的運動。⁰⁶ 1910年，在穆德的領導下，美國青年會已經成功進入每一個宗派的至少一間大學，並被認定為平信徒合一運動的先驅。⁰⁷

另外，就青年會運動與宗派合一的關係，研究中國青年會的趙曉陽亦補充，指在 1885 年青年會的〈巴黎本旨〉(Paris Basis) 中，早已表達跨宗派的理想，並在 1973 的青年會世界協會中，清楚確立青年會運動是一個「聯合各宗派的世界性團契運動中心」，並廣納不同信仰、年紀、性別和社會背景的人加入成為會員。⁰⁸ 又，仔細參看青年會的正式會徽，就會發現會徽中間引用了聖經《約翰福音》17 章 21 節，當中談到耶穌期望信徒如祂跟天父的關係一樣，能夠合而為一。⁰⁹ 再加上青年會在英國創立時，12 名創辦的青年平均來自聖公會、浸信會、循道會和公理會等不同宗派，我們就可以清楚看見，青年

06 Christopher Hodge Evans,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Religion: A History* (New York: NYU Press, 2017), p.116-117.

07 Ruth Rouse and Stephen Charles Neill,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4th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93), p.600-602.

08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頁 7-8。

09 聖經和合本的翻譯為：「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翰福音 17 章 21 節)；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頁 9。

會運動自百年以來，已經跟合一精神和合一運動，具有莫大的關係。¹⁰



世界青年會自 1881 年確立的官方會徽，中間寫上《約翰福音》17 章 21 節¹¹

回到廣州嶺大，翻查嶺大青年會早期的憲法，只要教職員和學生認同及執行該會宗旨，不論信仰背景，均可以成為會員，擁有投票選舉青年會職員之權；雖然基督徒才可以被選成為職員，惟資格顯然不受所屬教會之限。¹²又參考當時的嶺大青年會會員名單，讀者不難發現會員們宗派背景的極為

10 同上，頁 4；事實上，廣州青年會的創辦董事，同樣是來自不同宗派，詳見黃春艷，「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 (1904-1922)」，頁 34。

11 *YMCA Logo*. Image. World YMCA. June 9, 2025.
<https://www.ymca.int/who-we-are/the-worldwide-ymca-movement/the-ymca-history/ymca-logo-history/>.

12 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年鑑》（廣州：嶺南大學，1925），頁 129-131。

多元，其中不少來自聯合教會中華基督教會，亦包括加入了長老會、循道會、美以美會、浸信會、興華會、聖公會、長老自理會、同寅會、宣道會、公理會、美瑞丹會、倫敦會及不少沒有教會背景的嶺大師生。¹³ 從以上所見，不論是憲法的開放，還是會員組成宗派的多樣，都可以清楚見到嶺大青年會承傳了世界青年會的跨宗派精神，保持跟普世合一的密切關係。嶺大青年會亦在這樣合一的基礎下，大力推動校內及校外的宗教和社會關懷活動。

二、嶺大青年會的源起及跨宗派的宗教活動

1902年9月，當時一方面是嶺大的中文教師，又是嶺大學生的鍾榮光，就在下學期的逢星期三課後，發起基督徒聚會，一同祈禱和談道半小時，以認識基督教真理。¹⁴ 1904年，因會員人數漸多，才由祈禱會正式成為嶺大內的青年會，附屬於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大會。不過，根據早期嶺大青年會會長及秘書黃啟明的回憶，整體而言，當時嶺大校內學生宗教氣氛薄弱，非基督徒亦對基督徒學生時作譏諷，會務運作極

13 嶺南大學青年會，《嶺南大學青年會年報》（廣州：嶺南大學，1919），中山大學圖書館珍藏館，頁119-142。

14 鍾榮光著，〈本學堂談道會述略（一九零四年六月）〉，張金超、余齊昭編，《鍾榮光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頁5。

為困難。因此，大約在 1905 年後，嶺大青年會就進行架構改組，先後設立教育部、查經部、傳道部、建築部、閱報部、招待部等六大部門，分工明確，又召開特別會議，向校內信徒重申青年會的理念，以感動更多嶺大師生加入協助會務。如此，嶺大青年會的會員人數，才由 1908 年的 24 人，增長至 1913 年的 160 人。¹⁵ 1915 年，懷士堂建成，成為嶺大青年會進行各類活動和聚會的主要基地。¹⁶

具體宗教工作方面，在 1922 年以前，嶺大青年會每主日晚辦論道會，由不同講員講論生活與基督教道理，以 1919 年為例，每星期之出席者平均 190 人，最高達 500 人；當中的講題包括〈孔子與耶穌〉、〈基督教救國主義〉、〈教會之宗派〉、〈耶穌的四旨〉等不同宗教議題；¹⁷ 1922 年後，論道會改名為夕陽會，功能相若。¹⁸ 另外，嶺大青年會亦設查經部，

15 嶺南學堂，《嶺南學堂一覽》（廣州：嶺南學堂，1909），頁 61-65；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廣州：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1929），頁 41-43。

16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919,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G 11), Box 181, Folder 3247,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p.0246.

17 嶺南大學青年會，《嶺南大學青年會年報》，頁 47-49。

18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 54。

每主日以小組形式討論當日講道中的聖經經文，¹⁹ 惟在 1919 年期間，職員會有見學生在日常上課已經必須要學習聖經，始將查經組改為人生及宗教問題的師生研討會，以減輕同學的工作量和思考上的疲勞。此外，嶺大青年會亦長年舉辦祈禱會和晨更祈禱會，分別在星期三晚和每日早上，進行祈禱靈修的活動。每年指定日子，亦設收割會，即如今的佈道大會，邀請參加者決志歸主，1913 至 1923 十年間，決志的總人數達 585 人。除青年會自家的宗教活動，嶺大青年會亦設「立志傳道團」和「白十字架團」等對外傳教小隊，志在招募較為委身的信徒，多進行例如鄉村的佈道工作，人數不多，每團約十多二十名團員。²⁰

最後，後來出任嶺大青年會總幹事的簡又文，在 1913 年春季就創立了《嶺南青年報》（又稱《南大青年》），自任為總編輯及發行人，志在將嶺大校聞、青年會會務、宗教及德育文章等刊登發佈，並每週免費向學生派發，是嶺大其中一份最早期的學生刊物。²¹ 此外，嶺大青年會亦曾出版《靈修雜記》、

19 嶺南學堂，《嶺南學堂一覽》（廣州：嶺南學堂，1909），頁 64。

20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 56-58。

21 簡又文，《簡又文回憶錄》（臺北：新銳文創，2020），電子書，頁 58；早期的《嶺南青年報》可能因為檔案館權限問題而無從尋得，如文件能重新開放，則將有助對嶺南文字事工的進一步研究。

《祈禱小冊》、《南大詩歌》等信仰刊物，可惜至今已經無從考究其中的信仰內容，惟透過文字事工宣傳基督教精神和信念，亦顯然是當時嶺大青年會主要的工作。²²

以上種種，能讓讀者看到嶺大青年會在宗教活動上的工作，而值得強調的是，以上的宗教活動，無分宗派背景，講員、職員與參加者，都可以來自不同的教會宗派，甚至非基督教徒亦歡迎參與其中。是故，簡又文如此形容嶺大校內的宗派情況：

校內無教派主義或教條主義的束縛及宣傳。外籍教員，多有各宗教團體或學校青年會派來服務的，各人分屬各宗派，但無規定劃一的信條……儒家的教道精華，中國傳統的倫理文化，課程中也相當注重，並行不悖，有如修養人格之「雙翼」，更得有基督教神力之推動，所以於道德之實踐，益為得力。此外，學校又厲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學生信教與否，信仰如何，校方與教員絕不干涉，也不分軒輊。信教者完全由自己選擇，決定。我就是這種開明的、自由的宗教教育的產兒。²³

由此可見，在無教派主義又或是合一非一的氛圍下，嶺大青年會積極推動校內的宗教活動，對於非基督教的信念和

22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 69-71。

23 簡又文，《簡又文回憶錄》，電子書，頁 57。

同學亦持相對開放的態度，期望基督教教導能成為學生的生活指引。

三、嶺大青年會的社會服務、教育及改革工作

普世合一精神，誠如第一章所言，並不單旨在領人決志歸主，得着死後永生，對於受造世界的福祉亦非常關注。青年會的工作同樣如是，除了以上提及的宗教活動，嶺大青年會亦如世界各地的青年會一樣，深受社會福音的影響，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為宗旨，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甚至參與改革社會政制。²⁴

嶺大青年會其中主要的社會服務工作，則為開辦義教學校，為當時在社會中教育機會甚少的鄉村兒童、勞動工人及女性，提供正規的免費教育。以 1927 年為界，嶺大青年會前後共開辦了 15 所義教學校，例如教授廚藝的小學工人夜校、藝徒學校、慈益學校，為女性提供教育的康樂女學校及桂田女學校，及後來交女青年會接辦的女工學校等；其中嶺南小學是由

24 社會福音的神學認為，福音不止關乎個人得救，亦關乎將天國價值實際臨到地上，透過社經改革和社會服務，將在地的社會基督教化，處理社會中的邪惡，詳見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頁 135-136 及 Christopher Hodge Evans,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Religion: A History*, p.117-119.

嶺大青年會辦的首間義學，1916年更交由嶺大接辦，成為更有規模的小學。這些學校由嶺大青年會出資及招募老師，有時則由嶺大學生自行擔任老師，學生人數為每校數十人，為不同社區缺乏教育機會的平民服務。此外，嶺大青年會亦設教育展覽和教育大會，研討教育理念等，又設教育局，由董事有系統地監察各校的運作。²⁵

1913年，嶺大青年會亦設立了「幼童部」，專責服務社區中的兒童，為其提供宗教、學習、故事聆聽、遊玩、義工服務和比賽的平台，讓其健康成長，全人發展。²⁶ 1917年，嶺大青年會增設工人部門，為勞動階層進行義學、查經、講道的事工，甚至後來自設會所，改名為「勞工青年會」，可惜在1927年間，因工人參與工潮而停辦。²⁷ 最後，嶺大青年會更有「鄉村事業」部，除了上述提到建校義教外，亦在部門內設立了社會服務團，目的是進行社區調查，深入了解嶺大工人和附

25 其他義教學校包括：工人半夜學校、曙光學校、康樂月光學校、鳳凰學校、夏渡學校、羅拔學校、方社學校、大光學校，詳見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58-61；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talogue 1918-19, Lingnan University Trustees, Lingnan University Archives,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p.12.

26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62；嶺南大學青年會，《嶺南大學青年會年報》，頁54。

27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63。

近村民的生活需要，並設法改善其福祉和生活。²⁸

除了以上的社會服務工作，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嶺大青年會領袖在社會政治改革上的參與。從嶺大青年會的文獻當中，筆者的確無法找到嶺大青年會太多與政治參與相關的官方匯報，惟嶺大青年會作為在晚清年間成立的青年會，亦於地理上處身當時革命運動的重要地區，加上嶺大及廣州青年會的創會會長鍾榮光同是革命組織興中會成員，與孫中山關係緊密，的確令人難以將嶺大青年會跟社會政治改革完全分開。²⁹ 鍾卓芝的哲學碩士論文，就把廣州青年會跟晚清的革命運動，作了非常仔細的研究。她的研究提出，雖然廣州青年會一向堅持不參與政治的中立原則，但由於在華傳教策略上，需要首先拉攏及倚賴中國知識分子，以更有效廣傳福音，就某程度容許了以鍾榮光為首的香港及廣州青年會領袖，繼續積極秘密參與反清革命事業，甚至在民國成立後，擔任國家要職。³⁰ 鍾榮光晚清年間的文字，某程度上力證其革命思想，時任青年會創會會長的他寫到：「若中國欲免瓜分之慘，必須放開眼孔，力求本國

28 公佣，〈嶺南學校青年會社會服務團成立記〉，《青年》，第17卷第2期（1915），頁45-46；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64-65。

29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1967），頁245。

30 Cheuk Chi Cecilia Chung, "When Christianity Encountered Chinese Nationalism", p.102.

進步。一切政治、商業、智慧、道德，皆當改革者也。」並認為要學習西方教育，以達國家自強。³¹事實上，鍾榮光在1907年在日本參加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及跟革命分子聯絡後，回國時就被天津警方以參與革命的罪名拘捕，被囚35日，最終幸得釋放，期間題詩：「世間並無不死藥，我生最愛自由花。」此被捕經歷，雖然最後證據不足，其亦在審問期間否認自己參與革命活動以保存性命，惟某程度已可見這位廣州及嶺大青年會會長跟革命工作千絲萬縷的關係。³²

邢軍就中國青年會與社會福音的分析，進一步幫助讀者更理解青年會運動與社會改革的關係。他指，中國自1911年革命後軍閥割據，社會及經濟問題嚴重，工人、農民受到經濟發展、西方殖民和天然災害的影響，生活非常艱苦。以吳耀宗、趙紫宸、江文漢，甚至是來自嶺大的李應林等中國青年會領袖，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推動下，就開始反思到基督教需要改革這些社會問題。這些領袖提倡耶穌其實並不止關心

31 鍾榮光著，〈中國宜實行泰西之教育（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張金超、余齊昭編，《鍾榮光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頁8。

32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頁256-257；Cheuk Chi Cecilia Chung, “When Christianity Encountered Chinese Nationalism”, p.78-79；鍾榮光著，〈入獄三十二日略記（一九零七年十月九日）〉，張金超、余齊昭編，《鍾榮光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頁25-27。

宗教心靈的問題，亦不止鼓勵服務社會，更是一名為社會公義而努力的非暴力社會革命者。³³ 1914年在嶺南中學畢業後任廣州青年會助理幹事、³⁴ 1923年任嶺大青年會會長的李應林，³⁵ 顯然深受這種社會福音神學思潮影響，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積極撰寫〈論膠州問題〉、〈國際調查團報告書公佈後的感想〉、〈中日的前途〉、〈中日的調整〉、〈中英聯盟？〉等多篇時事評論，回應「巴黎和會」將德國在華權益交日方管理等時事。³⁶ 由此看來，受社會福音影響的青年會運動及其領袖，隨時代改變，其思想行動已不止停留於個人心靈滿足，更由服務社會，演化為對社會政制提出徹底改革的一種信仰觀念。嶺大青年會領袖在這種思潮下，亦同樣受到影響，對社會問題，多有改革的看法和實際改變的行動。因此，雖然嶺大青年會跟社會政治改革並不必然有直接而公開的關係，在當時的工作報告中亦鮮有提及，但以青年會領袖鍾榮光、李應林等為例，讀者不難看到嶺大青年會的領袖，對全面改革社會政制亦有一定程度的參與。

33 邢軍，《革命之火的洗禮》，頁94-100、109。

34 黃春艷，〈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應林的生平及思想〉，《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5期（2014年9月），頁40。

35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歷年會長頁。

36 黃春艷，〈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應林的生平及思想〉，頁40。

上述提到的教育及社會服務，跟合一運動中對弱勢社羣的關注不謀而合。顯然，嶺大青年會除了在前段對基督教信仰合一地傳播的重視外，對於以基督精神，關懷校園內外的邊緣者，例如鄉村村民、女人與兒童等社羣的權益，讓其可以得到免費的教育、娛樂和改善生活的機會，亦極為重視。嶺大青年會的事工，不止關注人民死後的問題，對當下的社會公義問題，亦提出改善之法，甚至其中的領袖，積極參與了社會政治改革的運動和思考之中，期望徹底改變國家各方面的腐敗，回應當下的社會問題。這都是對整個受造世界的在地關懷，跟合一精神顯然有着非常相通的關係。

四、嶺大青年會跟其他基督教組織的合一關係

嶺大青年會跟廣東不同宗派的教會亦保持友好關係，並會派員參與崇拜中的事奉，又認為該會的使命，正是鼓勵學生加入教會；另外，該會亦跟其他青年會保持友好關係，例如廣州市青年會、廣東學生基督教青年會協會及嶺大的女青年會。³⁷ 其中值得留意的校內姊妹組織，是同樣具有跨宗派合一精神而創辦的嶺大女青年會。

37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 95-96。

嶺大女青年會於 1916 年由廖奉基女士等嶺大女生成立，其成立宗旨跟嶺大青年會相近，惟主要分別顯然在於嶺大女青年會以服務女性為主，架構上亦由女性主導。根據 1921 年的工作匯報，當中提到由於嶺南大學本身女生人數甚少，故嶺大女青的職員人數十分有限，時有職員要身兼多職，甚至有說研究併入嶺大青年會內。雖然如此，嶺大女青年仍然關注幼童教育和失學女工人的需要，開辦各類義學，由例如校內教員之妻等女性任教，又設女工詩班，在各種慶典中獻唱；另，嶺大女青年會又舉辦類近今天團契的交際會，讓校內女性學生和女工，可以定期一聚，一同遊戲、分享和頌唱詩歌。當然，跟嶺大青年會一樣，嶺大女青亦自設每週三的祈禱會，由女性主領，一同培養基督教靈性。³⁸ 嶺大青年會與女青年會關係密切，不時合辦主日學、夕陽會、鄉村義學、青年報出版等事工，可見女青年何以形容兩會的關係為「互相協助，無分彼此」。³⁹ 這種無分彼此的組織關係，亦是合一精神在校內的展現；嶺大女青年會作為與嶺大青年會具如姊妹關係的合一組織，亦在宗教培育和社會服務的工作，跟青年會一同貢獻。

38 〈嶺南女青年會：本校女青年會之過去〉，《嶺南》第 5 卷第 2 期（1921），頁 116-118。

39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 96-97。

嶺大青年會亦有參與及捐助大型合一聚會，如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的大會和青年會全國大會。⁴⁰ 誠如第一章提到，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是二十世紀初普世合一運動發展的重要組織，作為創辦人之一的穆德，除了在第二章提到是廣東協和神學院的推動者，亦一直是合一運動的積極推手，例如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的成立，就是要聯合包括東正教和天主教的基督宗教派系，不分傳統差異地推動向世界傳教的使命。事實上，跟青年會一樣，聯盟不屬任何宗派，其合一理念亦影響了後來合一運動的領袖。⁴¹ 嶺大青年會在這類合一大會的參與和金錢捐助，均可見其對不同基督教團體的合一，亦甚為重視。

五、限制及展望

誠如本章前言所論，嶺大青年會作為早期校園青年會的研究甚為缺乏，更遑論以合一運動的角度看嶺大青年會的工作。不過，嶺大青年會作為首個廣東地區的青年會，亦是一個人數眾多、積極活躍的青年會，未來實應進行更多深入的研究。可惜的是，1913年至1927年等早期的《嶺南青年報》已經難以尋找，其他青年會得以保存或公開的出版和報告亦不

40 同上，頁96。

41 Thomas E. FitzGeral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Conn, 2004), p.64-65.

多，嶺大女青年會的文字紀錄更是極為罕有。這肯定加大了研究的難度，亦將有賴筆者或其他學者作更全面和深入的搜尋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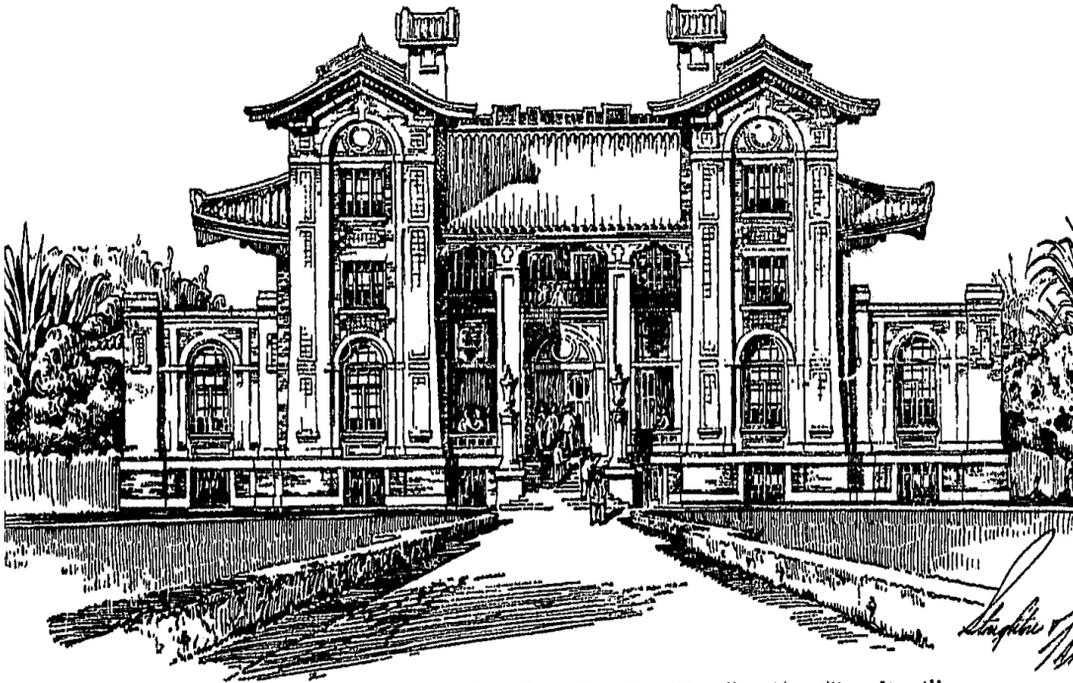
結語

總的而論，本章嘗試填補學術界的空白，以合一視角整理嶺大學生青年會在研究範圍內（1888-1927）的工作，並期望證明嶺大青年會跟合一精神是有着深厚密切的關係。本章首先從探討青年會本身跟合一運動的關係，並在嶺大青年會的章則和多元組成當中，尋找合一元素；然後，本章再探討在合一精神下，嶺大青年會是如何不分宗派，推動不同的宗教活動。其後，因着對受造世界福祉的關注，筆者透過該會大量的義教和社關工作，強調嶺大青年會並非只關心死後的靈性問題，反而亦非常重視在地的社關工作，改善當時校內校外邊緣者的處境，嶺大青年會的會長甚至積極投身革命事業，推翻腐朽的政制，回應改革社會議題。最後，本章探討嶺大青年會跟其他基督教組織的關係，其中特別提到與其他普世合一羣體如女青年會和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的合作情況，並指出嶺大青年會對羣體合一的支持和重視。綜合以上，讀者應不難看到嶺大青年會跟普世合一的密切關係，並如何透過宗教活動、社關參與和組織連繫等三大方面，具體實踐出來。



1925年嶺大青年會合照⁴²

42 Lingnan University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School,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Records (RG14), Box 63, Folder 694, Yale Divinity Library Collections, New Haven.



嶺南學校基督教青年會擬建會所之圖 (1913年)⁴³

嶺南青年會擬建會所 (懷士堂) 的構想圖 (1913年)⁴³

43 嶺南學校基督教青年會擬建會所之圖，1913，載於廣州嶺南學校，《廣州嶺南學校學生基督教青年會一九一三年春夏季報告》（廣州：嶺南學校，1913）。

全文總結、研究限制與展望

總的而言，本文期望論證嶺南大學（嶺大）在 1888 年至 1927 年間，除了一方面是中國基督教大學，亦正因為其跨宗派的特質，更是一所具普世合一精神的大學。誠如時任嶺大校長晏文士在 1911 年至 1912 年度的校長報告中指出，雖然有人對於嶺大作為一所跨宗派的基督教大學，以其如何堅守信仰原則培育具有基督教精神的畢業生提出質疑，但事實證明，當時海外和中國的教會組織，都最後一致表揚嶺大當時在教育 and 宗教培育方面的成果。⁰¹ 如此可見，在西教士主政期間，嶺大雖然已是脫離了長老會的跨宗派大學，但其基督教的色彩和力量仍然無損，甚至在合一精神的推動下，有更多元全面的發展，也並非如部分校史出版所指，嶺大因其非宗派背景故為非基督教大學。

為進一步證實以上的結論，本文簡介普世合一運動後，就先從創校初心入手，深入了解在創校前期的內部討論，並認為羅伯特學院與敘利亞新教學院的非宗派理念、廣州宣教士對宗派神學差異的放下和長老會內部對由宗派單獨創校的反對，促成了嶺大在章則、財政和人事三方面，都具有強烈的跨宗派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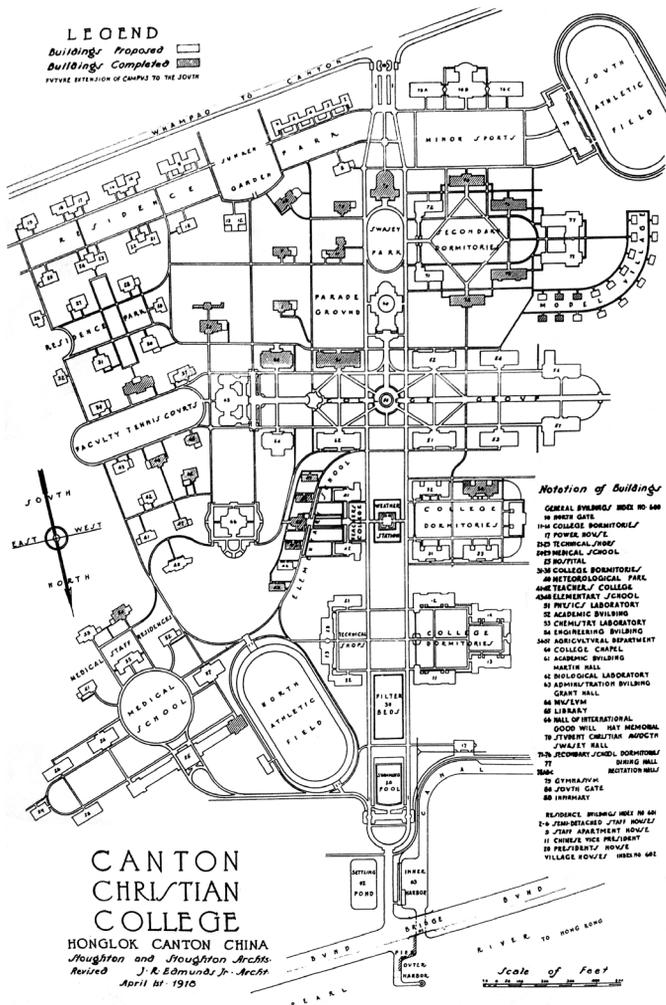
01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President's Report 1911-12*, (New York: Trustees,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12), p.45-46.

彩。如此的結果，並不是單純因為追求普世合一運動的理想而達到，合一的推動當中，難免涉及實際的張力和財政考慮。其後，本文繼續探索嶺大與廣州聯合神學教育的關係，指出嶺大在跨宗派的神學教育發展上，持續扮演正面積極的角色，在學分、人手和資源上，都積極配合；另外，該章節亦以倫敦傳道會跟嶺大正式合作作為主要例子，指出嶺大對於不同差會的歡迎——歡迎不同宗派的差會派員來華教學傳教，並可加入在美基金會，在權力上實際影響着學校的發展。最後，第三章深入討論了普世組織嶺大青年會如何以合一精神，在校園內外推動宗教事工和社關事工。該章先由世界青年會跟合一運動的關係作整理，然後探討嶺大青年會作為學校青年會，在宗教傳播上如何努力，並如何歡迎不同宗派的人士參與。另外，第三章亦提到嶺大青年會受社會福音思潮的影響，其不止關心個人的宗教參與，更積極推動會員在社會中以義教等方式關注弱勢社羣，在現世社會中實踐天國價值，甚至有嶺大青年會領袖投身政治革命事業，期望由制度上作出社會改革，其實踐跟合一運動對關懷整個受造世界的強調，是不謀而合的。

以上三章的論證，基本上都指向嶺大在歸國人自辦前，跟普世合一的關係是密切的。是次研究結果，相信一方面可以擴闊歷史學者對早期嶺大校史的理解，特別是與不同宗派人士和組織之間的連結、合作和張力；另一方面，此研究亦可以豐

富基督宗教研究者對普世合一運動在亞洲、中國和廣州的實踐，擴闊合一精神在非西方文化下的想像。最後，此研究亦期望能貢獻學術界一直對中國基督教大學的研討，從以往較少使用的合一視角，更理解西方傳教士是如何在中國推動基督教教育和基督教化的社會改革。

當然，本文的研究並不應就此完結，畢竟這個花費約一年的研究，仍然有極多探索的空間，例如：究竟嶺大歸國人自辦後，由鍾榮光與李應林等華人領袖主持校政，其由西教士留下的合一精神又是否得以維持？如果答案是正面的，嶺大的合一精神又是以甚麼方法延續？非基督教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期間的多次遷校、二戰後由中國共產黨推動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和1967年在港英殖民地復校等重大社會事件和變遷，又如何影響嶺大作為跨宗派基督教大學之身分？甚至最終要問，時至今日，何以位處香港屯門的嶺大已經不再理解自己為基督教大學？神學教育方面，同為跨宗派聯合辦學的廣州協和神學院，合一精神與神學教育的關係又是如何？這關係又是如何影響今天崇基學院的神學教育？這些有趣的研究問題，仍然有待更多有心有力的中國基督教史學者，繼續抽絲剝繭地尋找答案，並以相關的研究成果，繼續貢獻學界對普世合一運動、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西教士來華宣教史等範疇的研討，為當下帶來更多啟示和意義。



1918 年嶺南大學康樂校園地圖⁰²

02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mpus Map, 1918, Map,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https://onlineexhibits.library.yale.edu/s/lingnan-university/media/12693>.

參考文獻

一、專書

Corbett, Charles Hodge. *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 Based Primarily on the Records of the University's American Trustees*.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Evans, Christopher Hodge.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Religion: A History*. New York: NYU Press, 2017.

FitzGerald, Thomas E.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Conn, 2004.

Goodall, Norman.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7.

Penrose, Stephen B. L.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866-1941*. New York: Trustee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41.

Rouse, Ruth, and Stephen Charles Neill.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4th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93.

Ventura, Lorella. *Hegel in the Arab World: Modernity, Colonialism, and Freedom*. 1st ed.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Wang, Do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7.

Washburn, George. *Fif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and Recollections of Robert College*.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2.

Weber, Hans Ruedi. *Asia an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895-1961*. London: S.C.M. Press, 1966.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

李瑞明編，《南國鳳凰：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第1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

邢軍，《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胡志偉，《開創以傳承——嶺南大學香港復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陳國欽、袁徵，《瞬逝的輝煌：嶺南大學六十四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陸芝蘭、傅俊濠、湯泳詩、蔡慧敏、鄭志榮，《香港基督徒合一運動：研究集錄》，初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1967。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簡又文，《簡又文回憶錄》。電子書，臺北：新銳文創，2020。

二、原始檔案

A Letter by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CUSA to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dated 13th Jan 1915,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A Letter on Cooperation with the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dated 23rd March 1922,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A Letter on the Appointment of Donald Rees dated 17th June 1922,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Bliss, Howard S. *The Modern Missionary*. Beirut: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920.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talogue 1909-11, Catalogues 1899-1948, Lingnan University Trustees, Lingnan University Archives, Lingnan University Fong Sum Wood Library, Hong Kong.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President's Report 1911-12*. New York: Trustees,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12.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talogue 1918-19, Lingnan University Trustees, Lingnan University Archives, Lingnan University Fong Sum Wood Library, Hong Kong.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talogue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Academic Year 1920-21*. Canton: College Press, 1920.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First Ten Years, 1914-1924.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1924.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Lingnan University-Affiliation Plans,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Archives, Hong Kong.

Fact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Missions in China and the 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Groff, George Weidman. *Agricultural Reciprocit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Agricultural Reciprocity Promoted through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New York: 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11.

Henry, B. C.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and Company, 1885.

Lee Sui Ming papers, HK hkla-PC001.LEEsm. Archives. <https://archives.in.edu.hk/repositories/2/resources/1>.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899-1908,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09-1919,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19-1924,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Lingnan University, Catalogue 1924-1929,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Lingnan University. Letter from A.P. Happer Jr. to Sarah Carrington,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Lingnan University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School,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Records, Yale Divinity Library Collections, New Have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Annual Reports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83-1892*.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Board, 1916.

Regulations on Cooperation adopted by the 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Wesley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Report by Alexander Baxter, Canton [Guangzhou], 1918-1919 dated Sep 1919,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 Special Collections, SOAS Library. <https://digital.soas.ac.uk//CW00000499>.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Including a Review,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1898.

〈嶺南女青年會：本校女青年會之過去〉，《嶺南》第5卷第2期（1921），頁116-118。

公侖，〈嶺南學校青年會社會服務團成立記〉，《青年》，第17卷第2期（1915），頁45-47。

高冠天編，《嶺南大學接回國人自辦之經過及發展之計畫》。廣州：嶺南大學出

版委員會，1928。

鍾榮光著，張金超、余齊昭編，《鍾榮光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嶺南大學青年會，《嶺南大學青年會年報》。廣州：嶺南大學，1919，中山大學圖書館珍藏館。

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年鑑》。廣州：嶺南大學，1925。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廣州：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1929。

嶺南學堂，《嶺南學堂一覽》。廣州：嶺南學堂，1909。

廣州嶺南學校，《廣州嶺南學校學生基督教青年會一九一三年春夏季報告》。廣州：嶺南學校，1913。

三、學術論文

Chung, Cheuk Chi Cecilia. "When Christianity Encountered Chinese Nationalism: Deviation of the Chinese YMCA from its 'Principle of Non-Involvement in Politics,' 1895-1937." M.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doi:10.14711/thesis-991012769067603412.

Crabtree, Loren W. "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s in China, 1844-1891."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62, no.1 (1984): 19-34.

Martin, Roger H. "The Plac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1, no.3 (1980): p.283-300. doi:10.1017/S0022046900033340.

Wong, Wai-Yin Christina. "Women's Work for Women: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and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anton, South China, 1847-1938." Ph.D.,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2015.

Wong, Christina Wai-Yin. "Contingent Companion with the Cantonese: Uncovering a Hidden History of Written Canto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Religions (Basel, Switzerland)* 15, no.7 (2024): 758. doi:10.3390/rel15070758.

Zachs, Fruma. "From the Mission to the Missionary: The Bliss Family and the 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 (1866-1920)." *Welt Des Islams* 45, no.2 (2005): 255-291. doi:10.1163/1570060054307552.

李志剛，《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其影響》。台灣：中原大學，1990。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周玉仙，「廣州基督教學生團體工作概況」。學士畢業論文，廣州嶺南大學，1949。

陳繼明，「私立嶺南大學基督教青年會之社會事業」。學士畢業論文，廣州嶺南大學，1938。

黃增章，〈廣州協和神學院概述〉，《廣東史志》2003.1（2003年），頁46-50。

黃春艷，「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4-1922）」。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13。

黃春艷，〈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應林的生平及思想〉，《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5期（2014年9月），頁39-44。

鄭仰恩，〈當代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所面對的挑戰：後殖民批判·意識形態的

對立·公民社會的崛起》，《輔仁宗教研究》38期（2019/03），頁19-40。

劉肇恒，〈「為神？為國？」：重新探討嶺南大學由國人自辦後，校內的基督宗教情況（1927-1930）〉，未出版的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24。

蘇成溢、黃慧賢，〈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會長（1928-1949）關恩佐執事〉，773-774《滙聲》（2022年1/2月），頁6-7。

四、其他文獻

Commission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and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Together Towards Life: Mission and Evangelism in Changing Landscapes*. Switzerland: Commission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2012. https://www.oikoumen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ogether_towards_Life.pdf.

Penn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Vignette-Penn State in China." Accessed 8 Feb, 2025. <https://libraries.psu.edu/about/collections/penn-state-university-park-campus-history-collection/vignette-penn-state-china>.

Presbyterian Historical Society. "History of the Church." Accessed 30 Apr, 2025. <https://pcusa.org/historical-society/history-online/history/history-church>.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歷史沿革〉，日期不詳，2025年2月10日取自：<https://www.hkcccc.org/aboutus/>。

嶺南大學，〈認識嶺大 | 嶺南大學〉，2024年。2024年10月27日取自：<https://www.ln.edu.hk/cht/about-lu>。

嶺南大學，〈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 | 嶺南大學〉2024年。2024年10月27日取自：<https://www.ln.edu.hk/cht/about-lu/introducing-lingnan/vision-mission-and-core-values>。

| 第二部分 |

在歷史中的嶺南基督徒

導讀

還記得在學時期，嶺南基督徒 LNC (Lingnan Christians) 的概念開始成形，並很快建立體制，進行定期會議，連結嶺南大學（嶺大）不同的基督徒羣體，合一地「為神為國為嶺南」，推動校園福音使命。自 2024 年，筆者開展了「在歷史中的嶺南基督徒」寫作系列，尋問在歷史中的嶺南基督徒是如何發揮嶺大的基督精神，在不同的時代巨變之下，實踐本地化的基督教信仰。

筆者在珍貴的歷史文獻中，「尋訪」了主要在廣州時期，即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嶺南基督徒。翻查過去有關嶺南校史的文獻，雖然嶺大最初是以基督教立校，但有關基督教與嶺大關係的文字記載或作品卻極為罕見。因此，筆者選取了七位昔日的嶺大基督徒領袖，探問他們當時如何踐信於行，推動中國福音工作。

第一位，是被遺忘的創辦人安德·哈巴牧師 (Rev. Andrew Happer, 1818-1894)。遊覽現時的屯門嶺大校園，我們已經難以找到與哈巴名字相關的大樓、銅像、紀念碑等，彷彿並非重要人物。不過，這位來自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帶着宗教使命和有限資源來華傳教辦學，沒有功也有勞——畢竟，沒有當日的哈巴和那八頁計劃書，可能就沒有今天的嶺大。

第二位，是相當著名的首位華人基督徒校長鍾榮光博士（1866-1942）。在香港，我們不難找到鍾榮光的名字，因為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就在我們的城市屹立了 45 個年頭。鍾榮光一生奉獻於嶺大教育體系，在反西方思潮最熱烈的年代擔上基督教大學校長一職，並身體力行，維持校園內自由的基督教色彩，甚至以在嶺大成立神學院為願。鍾榮光一生實踐「為神為國為嶺南」，最終葬於首位華人牧師梁發的墓旁。

第三位嶺大基督徒，是鍾榮光的繼承人，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嶺大校長——李應林博士（1892-1954）。作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前總幹事，他又是在如何在戰亂走難中實踐基督信仰？他又如何承繼鍾榮光的遺願，要在嶺大成立神學院？不得不提，當我們以為無神論的新中國成立後，基督教大學要從此在中國大陸消失殆盡時，李應林就領導其嶺大辦學團隊，在 1950 年代創立了聞名至今的崇基學院，延續了嶺大和其他 12 間中國基督教大學的使命。

第四位，是不為人所熟悉的李聖華牧師（1903-1986）。選取他，是因為他是嶺大建立神學院後的校牧；惟他卻在文化大革命之時，留下了打倒過去自己的文章，實是耐人尋味。無論如何，值得探究的是，他疑似自保的舉動，又為今天的我們帶來了甚麼提醒？

第五位，是司徒衛先生（1889-1961）。司徒衛是嶺大校徽的創作者，亦是一位著名畫家，是今日香港嶺南中學和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的首任校長，當然也是忠誠的基督徒。他亦早在一百多年前（1911年），在校徽設計內蘊藏《詩篇》及基督精神；可惜，時間流逝，近代的校徽介紹，其中的宗教色彩及原意早已被取走，或者於信徒而論，是失色了。

第六位，是謝扶雅博士（1892-1991）。謝扶雅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服務嶺大十一年。他是鍾榮光擔任校長時的宗教及哲學系負責人，擔起慢慢建立私立嶺南大學協和神學院神學院的任務。謝扶雅是一代文人，著作極多，對基督教思想的想法甚為深入全面。相信研究他，可幫助我們了解歷史中的嶺大及華人基督徒是如何有系統地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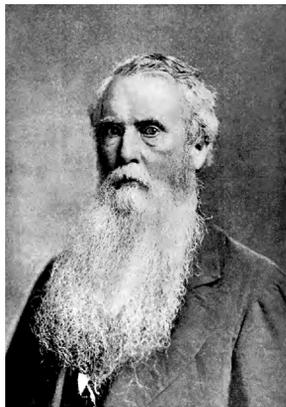
關於最後一位，在書寫期間一直舉棋不定。本來心裏想寫龔約翰牧師，了解這位擔了協和神學院（後來併入嶺南）的院長，是怎樣的一個海外傳教士，又是如何在廣州推動神學教育超過二十載，好讓我們對其的認識不止於香港中文大學的「龔約翰學生中心」；但筆者也想在系列中放入女性信徒領袖，然而在父權時代要找這樣的記載，並不容易。經過一番取捨最終選擇了以廖奉獻女士為例，談嶺南女學的開辦。至於龔約翰

牧師的故事，日後定必研究。

無論如何，七位紅灰嶺南人，七個廣州的歷史故事，希望讀者能從中取經，有所得益。⁰¹ 最後，引用中文大學出版社近期很喜歡的引文：「書寫歷史的行動本身即是一種歷史行動。」（The act of writing history is an historical act itself.）願你在文字中，見證歷史，也被激發，以開始與你相關的歷史行動。

01 紅灰精神乃指「殷紅如血，深灰似鐵」，象徵忠義堅強，且根據筆者在康樂原校址的實地考察，嶺大當年的建築全以紅磚與灰泥建成，選上這兩隻顏色作為代表嶺大的精神，也有其道理；有關紅灰精神的意思，詳見：李瑞明編，《南國鳳凰：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第1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4。

一、宣教士哈巴牧師—— 被遺忘的創校者



圖為哈巴牧師晚年之相片，截取自嶺南大學 1885 年的創校計劃書⁰¹

前言

安德·哈巴牧師（Rev. Andrew Happer，1818-1894），為嶺南大學（嶺大）整個教育體系的創始者。然而，如今遊走於嶺大屯門校園，要找到跟這位創校者有關的物品，如大樓、銅像、紀念碑等，都是異常困難。今時今日，哈巴之所以不被強調，或者都跟嶺大不同時期的「去基督教化」舉動相關；惟願

01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Including a Review,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1898), frontpage.

疑似被遺忘的哈巴，不會隨嶺大的辦學初心一同被遺忘。又，翻查學術文獻，有關哈巴的研究，亦是少之又少。以中文為例，只有〈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一文；⁰² 英文方面，亦主要只有〈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s in China, 1844-1891〉，⁰³ 可見即使在學界，哈巴亦非有名氣的人物。雖然如此，哈巴作為早期來華傳教的西方宣教士，留華 47 年，絕對為中國（特別是廣東地區）的傳教、教育及醫療工作貢獻良多；當中自然包括創立了格致書院（今天的嶺大）。

初期：來華宣教的重重困難

當跟嶺南人談到哈巴，一般有兩個回應：（一）根本素未聽聞；（二）知道他是嶺大的創校者而已。不過，哈巴對在華傳教的貢獻，早在格致書院成立以先的數十年，已經發生。事實上，格致書院的計劃，是他晚年的重大事工。可惜，書院成立不久，他就因身體狀況而無法留華，甚至致使書院一度停辦。他亦在創校六年後的 1894 年返回天家，暫無機會看到嶺

02 湯開建、顏小華，〈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2 (2015)，頁 107-115。

03 Crabtree, Loren W. "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s in China, 1844-1891."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1962-1985)* 62, no.1 (1984): 19-34. <http://www.jstor.org/stable/23328500>.

大後來蓬勃的發展。無論如何，要認識哈巴和其理想，就要由其早期傳教工作說起。

哈巴生於 1818 年的美國，在同為長老教會成員的父母影響下，哈巴早在 14 歲那年，就立志投身宣教事工。大約 22 歲時，他就進入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進行三年的神學訓練；並在完成神學課程後的一年內，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完成醫學學士學位，成為一名既是醫生又是受按牧師的傳教士。再次畢業後，因為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開放國家部分地區，他就隨即乘坐洋船，花了四個月時間來到了中國。⁰⁴

一開始，宣教工作並不順利，一方面南中國的宣教士不多，哈巴欠缺支援；另一方面因西方列強入侵，本地華人排外情緒高漲，包括哈巴在內的西方宣教士連租住房子也未能成功，根本無法安全地長居廣州。⁰⁵ 因此，當時哈巴牧師曾短暫留在香港，並在 1845 年在澳門成立寄宿男校和開始學習中文。當時入讀寄宿男校的學生有 27 人。⁰⁶ 兩年後，哈巴終於成功重返廣州

04 Ibid, p.20.

05 湯開建等，〈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頁 108。

06 Crabtree, "Andrew P. Happer", p.20.

租住，並將其寄宿男校遷入，但排外情緒依然存在，其校數度被迫遷。⁰⁷ 不過，雖然排外情緒高漲，但哈巴觀察到華人極需要西方的醫學幫助；於是他建立診所，行醫宣教。以 1851 年為例，其診所一年就處理了五千宗個案，截至 1854 年，已服務了一萬名病人；並終於在同年，迎來他手中首個決志的華人信徒。來華十年，哈巴才成功令一人歸信基督，過程殊不簡單。⁰⁸

收成期：醫療、牧會、翻譯

第二次鴉片戰爭在 1856 年爆發，哈巴休假後暫無法回華，但在戰爭結束後，戰敗的清政府真正開放廣東，哈巴亦在 1862 年在廣州成立第一長老教會。在 1884 年，即其在第一長老教會最後一年，連同另外成立的兩間教會計算，會友人數已達 601 人；由哈巴親自施洗的中國信徒則達 334 人；醫療宣教方面，外科病人高達 17,591 人，施行手術次數為 1,218 次。⁰⁹ 除此以外，跟不少傳教士一樣，哈巴亦為華人社會翻譯及出版了不少神學書籍，如《耶穌教要理問答》、《神道篇》、《新約史記問答》、《舊約史記條問》、《耶穌正教問答》、《馬太福音書問答》、《真

07 湯開建等，〈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頁 108。

08 Crabtree, "Andrew P. Happer", p.21.

09 Ibid, p.22-24.

神正論》等，幫助華人更易明白西方基督宗教。¹⁰

晚期：一所在中國的基督教大學

不過，哈巴在華的宣教抱負並不止於以上。在其晚年，即 1884 年左右，他着手實現其在中國建立一所基督教高等學府的宏大心願。在其 1885 年的創校計劃書中，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因為華人對於西方教育和宗教，已經愈見開放；遂提出仿效今天位於土耳其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和敘利亞新教學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之成功經驗，在中國建立一所類似的基督教高等學府，培訓本地人成為傳教士、教師、醫生或回應上主其他的呼召。他又揚言要積極與不同宗派的宣教機構合作，合一地將中國基督教化。¹¹ 筆者將副題定為「晚期：一所在中國的基督教大學」，而非「晚期：一所在廣州的基督教大學」，究其原因，是哈巴雖然在廣州傳道多載，其計劃卻是在中國北面，即如上海等政治力量較強的城市

10 湯開建等，〈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頁 113。雖然我們已無法得知哈巴牧師自己對以上事工的評價，但若以宣教成果和受助數字而論，絕對大可功成身退。

11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The Proje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Located at Canton: Including a Review,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1898), frontpage.

建立基督教大學，發揮更大的影響力。¹² 嶺大最初的名字「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亦是有其深因。

不過，在 400 名來自廣州的鄉親、官員、商人、知識分子等聯署下，哈巴收到來自廣東的明確訊息——廣東人民需要一所科學化的高等學府。再加上哈巴年紀老邁，身體日差，根本再難以北上建校，故此嶺大及其前身，就由 1888 年起一直留在廣東地區；直至 1952 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府併入中山大學，在廣州的嶺大才告完成使命。1891 年，哈巴因健康問題退休回國；¹³ 1894 年 10 月 27 日，哈巴便完成在地使命，魂歸天家。¹⁴

回顧 · 今天

回看哈巴的一生，雖然他並未有機會參與嶺大在中國大部分的發展；且成立格致書院數年後就被迫回美休養，並在 76 歲之時安息主懷。惟如果沒有哈巴及其同伴們的努力、想

12 Crabtree, "Andrew P. Happer", p.28-29.

13 湯開建等，〈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頁 112。

14 Noyes, Henry V. "In Memoriam: REV A P HAPPER."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68-1912)*, 1895.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s://www.proquest.com/historical-newspapers/memoriam/docview/1416434382/se-2>.

像、策劃、籌款、遊說，就沒有今天我們看見的「嶺南」教育品牌，甚麼嶺南中學、小學及幼稚園，統統都不會存在。如此，或者哈巴比我們想像中更值得被念記（in remembrance）和重述。當然，相信哈巴也會同意，重要的不是歌頌其一生的豐功偉績，而是記得其宣教初心——以教育、醫療等不同方法，讓耶穌基督的教導、價值、救贖、憐愛等，進入人羣，改變腐朽的社會。今天，培育領袖、傳揚福音、改變社會的這一棒，已經輾轉傳到新一代；或者多人早已遺忘，但本文回顧重述，提醒我們毋忘初衷，承傳使命，弘基格致。

附註：原文刊於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的 **Patreon** 平台，詳見劉肇恒，〈在歷史中的 LNC 嶺南基督徒——〈宣教士哈巴牧師：被遺忘的創校者〉〉，《Patreon》，2024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patreon.com/posts/zai-li-shi-zhong-114705974>（付費訂閱，瀏覽日期：2025 年 9 月 23 日）。

二、弘基格致，盡瘁嶺南—— 記鍾榮光博士與基督宗教

相對於哈巴牧師，鍾榮光博士（1866-1942）的一生更為深受華人學界及大學官方所重視。除了學長楊華日先生在1967年出版的《鍾榮光先生傳》外，⁰¹ 華文學界也有不少討論鍾氏的文章，例如李蘭芬、張清江、⁰² 朱慶雷、⁰³ 郭海清、⁰⁴ 劉寶真⁰⁵ 等學者的論文，均有着墨討論其教育思想和基督教中國化之關係。不過，本文作為「在歷史中的嶺南基督徒」系列，視角當然會與上述傳記和學術論文不同，並將集中介紹鍾氏作為一個基督徒領袖，是如何在中國、嶺大實踐信仰，宏基格致。事實上，在鍾氏的追思會上，他就被稱為「真誠的宗教家」，意指他自從跟隨基督後，就戒除一切惡習，「守道篤信，數十

01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1967）。

02 李蘭芬、張清江，〈民國廣州基督徒知識分子與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以鍾榮光、張亦鏡為例〉，2017.3《開放時代》（2017年7月25日），頁61-71。

03 朱慶雷，〈鍾榮光任職嶺南大學時期教育思想淺析〉，2009.10《科教文匯》（2009年5月26日），頁61。

04 郭海清、彭建兵，〈論鍾榮光的教育思想〉，2016.3《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1月7日），頁30-34。

05 劉寶真，〈鍾榮光與近代華南農業教育〉，2014.33（3）《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7月21日），頁33-38。

年如一日」，而且志行純潔，愛人真誠，苦心傳道，熱誠服侍，被稱為「造詣」之士。⁰⁶

鍾氏（字：惺可），1866年9月7日出生於清朝廣東省香山縣，跟好友孫中山先生同年。鍾氏17歲中秀才，24歲中副榜，29歲中舉人，其所作的八股文已甚為著名，並開班授徒。後來，鍾氏加入興中會，辦《博文報》等，宣揚改革理想。1899年間，因受在博濟醫院、格致書院等基督徒朋友影響，鍾氏對基督教的興趣日深。在當年3月1日，鍾氏前往香港倫敦傳道會的「道濟會堂」（即今天位處半山區般咸道的「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受洗加入教會，為其受洗的是王煜初牧師；自此，鍾氏改名為「榮光」。⁰⁷ 歸信基督後，因納妾並不是基督教所提倡的，且有違男女平等之道，鍾氏遂在某次崇拜後登台宣佈，釋放侍妾鄧主依。不過，由於當時女性仍在經濟上依賴家中男性，鍾氏在離婚後仍承擔鄧氏一切生活、教育開支，助鄧氏在廣州路德書院習醫，並視鄧氏為「至愛之妹」。⁰⁸ 由是觀之，入教歸主後，鍾氏對家庭觀念的改變是具革命性的。

06 簡又文，〈鍾師榮光〉，《鍾校長榮光博士：百齡誕辰紀念特刊》（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1966），頁11。

07 葉深銘，〈鍾榮光（1866-1942）與港澳基督教會〉，《知史》，2023年12月21日。

08 嶺南學堂，〈記鍾榮光君與鄧主依氏離婚事〉，《嶺南學生界》2.1/2（1905）：50-54；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頁250。

1900 年間，鍾氏正式加入嶺大大家庭，受聘為當時格致書院的漢文總教習。雖然鍾氏在舊有的科舉制度成績優異，惟其對西方教育同抱開放態度，故在教學的同時，亦在嶺大習英文、教學法和科學等科，並在 1905 年成為嶺南中學第二屆畢業生。⁰⁹ 在嶺大期間，原來鍾氏對校內基督教團體的發展影響甚深，一般的歷史整理卻鮮有提及，現記錄如下——1902 年下學期期間，鍾氏認為教育要以立德為本，立德又要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於是在每星期三下午課餘時間，自發開始祈禱讀經的聚會，但初期的參與人數寥寥可數。一直到 1905 年，因與上海青年會全國協會聯絡，就在嶺大成立了學生基督教青年會（YMCA），自發聚會便在此後結束。繼而然之，鍾氏成為首屆嶺大學生基督教青年會會長，余因來為副會長。¹⁰ 由此可見，鍾氏可謂是當時廣州校內最大學生基督徒組織的創會者，對日後青年會在嶺南的基督教事工奠下根基，影響尤深。

1907 年，鍾氏與時任嶺大監督尹士嘉到日本參加「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回程時在天津被捕，被指參與革命；後來幸得營救，最終獲釋。當時鍾氏在獄中被囚 35 日，心知

09 簡又文，〈鍾師榮光〉，《鍾校長榮光博士：百齡誕辰紀念特刊》（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1966），頁 10。

10 黃啟明，〈二十五年前青年會之回顧〉，《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廣州：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1929），頁 41。

不妙，就誠心祈禱，重拾盼望。其後多年，鍾氏漸漸離開前線教學工作，主力遊走世界各方，籌集資金，建設嶺大校園。1920年間，中國的基督教遇上社會上極巨大的反對——非基督教運動爆發。非基督教運動最初源於1922年，上海一羣反對基督教的學生，指基督教實為西方資本主義與殖民的工具，理應阻止。其後，非基督教運動尤為針對西方傳教士來華建立的教會學校，認為應盡快由國人收回辦學權。¹¹以當時嶺大為例，嶺大註冊地方在美國，管理層同樣在美國，成員以美國西人為主，經費來源亦仍以西人為多。故國人對這類傳教學校，甚為敵視，視其為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分子。

在這樣的背景下，嶺大就在1927年間進行重大改組，由設在中國的董事會主理校政，以孫科（孫中山長子）、馬應彪（先施百貨創辦人）、錢樹芬、林護、林逸民、黃啟明等多人為華人董事；在紐約的美國基金會則繼續支持西教職員的薪金。另外，嶺大正式在華註冊，同時取消學生強制參與宗教活動和課程的規定，鼓勵信仰自主。更重要的是，已在嶺大服務多年的鍾氏被推舉為嶺大新任校長，亦成為中國和嶺大歷史上，首位基督教學校的華人校長。¹²

11 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1807至1953年）》（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頁198、208。

12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1967），頁312-316。

至此，或許讀者自然會推斷，在反對基督教的思潮下，嶺大會從此去基督教化，鍾氏亦會在新思潮下，漸漸放下信仰推廣。不過，根據筆者對當時文獻的考證，發現在 1927 年嶺大歸國人自辦後，其宗教活動仍然非常活躍，相信跟鍾氏作為熱心信徒，有莫大關係。

以學校架構來說，雖然宗教活動已非強制參與，惟鍾氏就在「校務會議」之下，設立官方的「私立嶺南大學宗教事業委員會」，¹³以「(1) 聯給 (2) 統一 (3) 輔助 (4) 開辦關於全校之各宗教事業，而謀精神生活之上進為宗旨」。¹⁴在委員會的統籌及推動下，以當時嶺大的學生青年會為例，一年間舉辦了至少 32 項宗教及社會服務活動，當中包括夕陽會、祈禱會、聖誕節及復活節慶祝活動、宗教研究班、詩歌班與音樂會、退修會和晨更運動等多樣宗教活動。¹⁵又，根據 1930 年的《學校概覽》，當時校方開辦的宗教科目仍然存在，例如「宗教導論」、「宗教史」、「宗教心理學」、「宗教與青年問題」、

13 高冠天編，《嶺南大學接回國人自辦之經過及發展之計畫》（廣州：嶺南大學出版委員會，1928），附錄：私立嶺南大學組織系統表。

14 詳見「宗教事業委員會章程」，刊於私立嶺南大學秘書處，《私立嶺南大學校報》第二卷第二十四期（1930），頁 6-7。

15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廣州：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1929），頁 53-55。

「新約文學導論」、「近代基督教思潮」等多個科目，仍然可供學生選修。¹⁶如此看來，以鍾氏為首的華人領導團隊，並未有因為時移勢易，放棄對自己信仰的堅持和宣講。事實上，根據謝扶雅的憶述，鍾氏一直有在嶺大建立神學院的願望，可惜至其離世，願望仍未得到實現。¹⁷

1938年，當了校長十載有多的鍾氏退休，交李應林繼任。其回憶錄亦在此時完成，可惜後因日軍侵華，手稿不幸遺失，至今無人尋獲，令後人無法從第一身視角更深認識鍾氏。¹⁸1941年，香港於聖誕節淪陷，翌年1月7日，鍾氏於香港養和醫院與世長辭，遺體暫存於東華義莊。直到1947年1月7日，遺體送返廣州康樂校園，並安葬於懷士園，與首位華人牧師梁發之墓為鄰。¹⁹

三十年科舉沉迷，自從知罪悔改以來，革過命，無黨勳，作過官，無政績，留過學，無文憑，才力總後人，惟一事工，

16 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南大青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廣州：嶺南大學學生基督徒青年會，1929），頁53-55。

17 謝扶雅，《生之回味》（香港：道聲出版社，1979），頁206。

18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頁341。

19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頁348-349；墓園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遺體去向不明。

盡瘁嶺南至死。

兩半球舟車習慣，但以任務完成為樂，不私財，有日用，不養子，有徒眾，不求名，有記述。靈魂乃真我，幾多磨練，榮歸基督永生。²⁰

以上為鍾氏於晚年的自撰輓聯，可謂完整地總結其一生。鍾氏自 30 多歲加入嶺大，一直在教學和宗教事務上努力，由發起祈禱會到成立青年會，都貢獻甚深。又，在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下，擔起首任華人校長一職，繼續在可行情況下，推動本土化的基督教教育，甚至是神哲學學習的培育。「盡瘁嶺南至死，榮歸基督永生」，說來容易，吸睛響亮，惟要一生身體力行，至死不渝，不是人人可以。願鍾榮光校長的生命，即或已成過去歷史，仍可感動人心，推動你我，宏基格致，盡瘁嶺南。

原文刊於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的 Patreon 平台，詳見劉肇恒，〈在歷史中的 LNC 嶺南基督徒——〈宏基格致，盡瘁嶺南：記鍾榮光博士與基督宗教〉〉，《Patreon》，2024 年 11 月 25 日，<https://www.patreon.com/posts/zai-li-shi-zhong-116610174>（付費訂閱，瀏覽日期：2025 年 9 月 23 日）。

²⁰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鍾校長榮光博士》，頁 5。

三、李應林校長—— 入世、疊莊、流亡的嶺南基督徒

前言

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有一學生宿舍名為「應林堂」，正是紀念李應林博士（1892-1954）在1950年代初，與聖公會何明華會督等共同創立崇基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今天在虎地的嶺南大學（嶺大）校園，MBG07室就在1995年被命名為「李應林演講廳」，同樣是為了紀念這位嶺大前校長；⁰¹在廣州康樂舊校園（今為中山大學校區南校園），以紅灰石磚建成的麻金墨屋二號（McCormick Lodge No.2），則是李氏的故居，遊人可以在康樂校園中自由拍照留念。⁰²從以上建築物的保育和命名，我們可以估計到，李氏在嶺大，甚至是兩個「中大」（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山大學）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將繼續以基督宗教的視角，再寫李應林作為一個信徒，是如何在超過70年前實踐信念。要綜論李氏的信仰實踐，觀其

01 梁勇，〈中國現代教育家李應林與廣州、澳門和香港的關係〉，2023.119《RC文化雜誌》（2023年）：頁78-89。

02 李林悅、王蒙，《紅樓翠影：中山大學康樂校園近代建築賞析》（廣州：中山大學檔案館，2021），頁23。

一生，筆者認為可以從「入世」、「疊莊」和「流亡」三個主題作主線，讓讀者對李應林的一生有更多認識。

「牛林」生平簡述

李氏生於廣東南海，三歲失去父親，家境清貧，兄長在澳門生活；他在少時入讀嶺南學堂，因而接觸基督教，又結識了基督徒學長簡又文。1914年，李氏在嶺南學堂畢業後，就在廣州基督教青年會（YMCA）任幹事，並在1917年，得到資助出國修讀奧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的文學士課程。據稱，李氏勤奮好學，刻苦耐勞，做事認真，故得到花名「牛林」，看來跟「嶺南牛」埋頭苦幹的精神不謀而合。⁰³文學士畢業後，他重返青年會出任幹事，並在非基督教運動下，爭取嶺大歸國人自辦，在基督教的價值下，將辦學權由西教士轉歸華人擁有，後在鍾榮光（1866-1942）身邊擔任嶺大副校長數年（1927-1931），並在鍾校長於1937年退休時，接任為嶺大校長。李氏作為校長，在任期間，領導嶺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多次被迫遷校之下，在香港、坪石、曲江、梅縣堅持繼續上課，風雨不改，並在戰後，順利在廣州康樂復校，更將

03 李應林教育基金會編，《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誕辰100周年紀念》（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李應林教育基金會，1992），14-17。彭淑敏，〈李應林〉，載《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二冊》，李金強編，（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24），頁229-232。

廣州協和神學院遷入康樂校園，正名為「私立嶺南大學協和神學院」。⁰⁴

1950年代初，國家將嶺大併入國立中山大學，在嶺大及其他中國基督教大學都面臨存亡危機之際，李氏果斷接受了聖公會何明華會督（1895-1975）的邀請，成為香港崇基學院的創校及首任院長，在沙田承傳嶺大和另12間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基督教教育精神。⁰⁵是故，今天的崇基學院禮拜堂懸掛了嶺大的校徽，崇基校歌的音調亦與嶺大校歌完全相同，又仿效了廣州協和神學院與嶺大之合作模式，在學院中保留相對獨立的神學院（即今天的崇基學院神學院）。1954年8月22日，即崇基學院成立後不久，李氏就在香港養和醫院因病離世，終年62歲，其追思會由嶺大香港同學會、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崇基學院、香港東方體育會和孟氏助學委員會等多個組織，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舉辦，可見其生前在社會上的貢獻。⁰⁶根據

04 彭淑敏，〈李應林〉，載《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二冊》，李金強編（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合會，2024），頁229-232；黃增章，〈廣州協和神學院概述〉，2003.1《廣東史志》（2003年）：頁46-50。

05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Chung Chi College, CUHK（2024年11月15日），〈崇基歷史與承傳 Chung Chi History and Heritag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YjwI7NrE8>。

06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校長李應林博士誕生100週年〉，1992.120《嶺南通訊》（1992年），頁2-3。

筆者認識的嶺大學長梁勇博士的說法，李氏現安葬於香港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

入世：社會福音，進入世界

要尋找李氏作為基督徒的事蹟或言論，其實不算容易，學者們甚少書寫其信仰實踐也不足為奇。⁰⁷ 以紀念其誕辰 100 周年的紀念特刊為例，絕大部分撰文分享的親朋學長，都甚少提及李氏作為基督徒的言行。⁰⁸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李氏活躍於強調社會福音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以及積極領導當時的青年會，相信他深受其中的神學思潮影響。簡而言之，社會福音以及背後的自由派，認為福音的實踐不應只停留於口傳佈道和關注死後世界，更應該透過社會改革和服務，例如辦學、扶貧、出版、醫療，甚至在地政制的改變，將人引至基督，將國家基督教化。⁰⁹ 社會福音在十九世紀末始得國人重視，亦說明了為何李氏的實踐，並不必然將屬靈詞彙掛在口邊，反而甚

07 黃春艷，〈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應林的生平及思想〉，28.5《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頁39-44。

08 李應林教育基金會編，《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誕辰 100 周年紀念》（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李應林教育基金會，1992）。

09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133-134。

為着重在社會中的關懷。

在如此的信仰背景下，李氏在社會政治的參與甚多。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將德國在華權益交予日本管理，李氏就撰寫《論膠州問題》英文小冊子，反對列強的結論；以及〈國際調查團報告書公佈後的感想〉、〈中日的前途〉、〈中日的調整〉、〈中英聯盟？〉等多篇時事評論，亦是李氏於當時的公開文章，可見他對時事局勢，有着非常熱心的關注。¹⁰ 其後，在擔任青年會副總幹事期間，他就確定青年會會以公平手法處理勞工問題，改善員工工作情況和發展教育服務。¹¹ 1920年代初，非基督教運動爆發，李氏雖為基督徒，但仍然保持謙卑而非敵對的態度，認為如果基督教會有錯，則「早日痛改」，從中檢討；如非基督教運動有錯，則「設法解釋」，並同意基督教會應維護國家主權。¹² 1925年間，國內先後發生「五卅慘案」和有嶺大師生參與抗議時身亡的「沙基慘案」，李氏遂號召人民罷買日貨，支持

10 黃春艷，〈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應林的生平及思想〉，頁 40。

11 彭淑敏，〈李應林〉，載《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二冊》，李金強編（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24），頁 230。

12 李應林，〈反基督教運動與基督徒〉，2.34《盡言周刊》，1925年10月31日：1；黃春艷：〈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應林的生平及思想〉，頁 41-42。

省港大罷工，反對外國列強持續迫害國人。¹³ 以上事蹟，都見李氏的信仰實踐，於社會時事有極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沒有留下太多信仰文字或事蹟，惟其實踐與當時在中外盛行的社會福音，有着明顯的正面關係，是入世而不離地的。

疊莊：承擔責任，身兼多職

筆者憶起在 2011 年入學嶺大時，校內的基督徒早已興起基督徒羣體合一的討論，並製作深藍色的「嶺南基督徒」上衣，在校園中遊走宣傳。同時，有學長亦承擔了「疊莊」的使命，身兼嶺大基督徒團契和嶺大基督徒詩班的職員，為校園合一作出努力。筆者承傳了相同的理念，在 2012 年至 2013 年間，亦同樣參與多個事奉職位，在極繁忙的事奉生活中，渡過那些年的大學生活。以此視角，李氏作為學長，可謂「疊莊」的前人和佼佼者。

根據文獻資料，李氏除了領導當時廣州青年會，亦在嶺大當副校長期間擔任校內宗教事業委員會的要員；同期，更在

13 彭淑敏，〈李應林〉，載《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二冊》，李金強編（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24），230；沙基慘案中，嶺南大學教師區勵周和一年級學生許耀章疑被英方真槍殺害，詳見李瑞明，《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頁 69-70。

校外服務中華基督教教會、平民教育運動、真光中學、廣東基督教教育會、協和神學院、暑期聖經學校等多個組織。¹⁴ 在二戰後，李氏除了是嶺大校長外，亦先後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副署長和署長，並在 1948 年辭任嶺大校長一職，期間出任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會長、青年會全國協會華南區幹事及廣州青年會會長。¹⁵ 嘗試透過這些職位名稱了解，已可想像李氏是能者多勞，也是社會和教會中的「疊莊」前人，一生勞碌為社會、為信念而努力。

流亡：堅守信念，進退有時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華；1938 年 10 月，廣州淪陷，全市停課，由於大部分嶺大學生居於澳門和香港，李氏就跟香港大學（港大）達成協議，11 月起免費容許嶺大學生於下午五時港大學生下課後，自傍晚起使用港大校園，繼續上課。另外，嶺大亦在屯門藍地（即今天妙法寺的位置）建立農學院，

14 黃春艷，〈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應林的生平及思想〉，頁 41；私立嶺南大學秘書處：《私立嶺南大學校報》（1927 年）1927.1，頁 19-21。

15 彭淑敏，〈李應林〉，載《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二冊》，李金強編（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24），頁 231。

使農學系的二、三及四年級學生無需因戰亂休學。¹⁶ 由此可見，雖然嶺大在1967年才在灣仔復校、90年代初才入主屯門，但在二戰期間，嶺大早已在香港建立大學校園，亦早已跟屯門藍地建立了有趣的淵源。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正式向美國宣戰，亦展開了太平洋戰爭。12月8日，日軍進攻英治的香港，嶺大停課，被迫再次遷至國內，尋找新校舍。幾經波折和危險，李氏由火速淪陷了的香港北上，逃往東莞，並在停課多月後，即1942年7月，在財政極為困難下，得到國民政府和美國嶺南基金會的支持，在粵北曲江大村順利第二次復校，命名為「嶺大村」。¹⁷ 在嶺大村的歲月，特別是就當時宗教活動的整理，為較少學者所關注，惟翻查歷史資料，仍可發現當時基督宗教對戰爭中的師生之重要性。

根據當時學長的回憶，嶺大在李氏的領導下，先重建懷士堂作宗教及文娛活動之用。新的懷士堂，跟康樂校園一樣，

16 梁勇，〈抗戰時期嶺南大學在香港（1938-1942）〉，載《鑪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 2015》，蕭國健、游子安編（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16），頁106-114。

17 《抗戰期間的嶺南》，（廣州：嶺南大學，1946），22-28；今天的「嶺大村」已經重建為「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大村）」，供公眾參觀，了解歷史。

是位處校園的中央，莊嚴肅穆，建築佈局及構思則出自設計校徽的學長司徒衛之手，參考了西方特色的禮堂。每天早晨，懷士堂均有早訓，晚上則有晚禱，主日早上十一時更有恆常崇拜，李氏亦是證道講員之一。校內最大的基督教組織青年會，在戰時仍有運作，惟其出版的《南大青年報》，則似乎已經停刊，筆者暫時無法從這份當時出版的宗教刊物中，對嶺大村的宗教實踐和思想有更多的理解。¹⁸不過，無論如何，在二戰時，基督宗教在嶺大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當時一位學生形容這是具「濃厚的基督教氣氛的生活」。¹⁹

今有嶺大基督徒詩班，古有嶺大歌詠團。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戰時羣體，就必須要提到當時的四部合唱音樂組織——歌詠團。多位在曲江大村就讀的學長，都特別提到這支約 30 人的歌詠團及其演出，可見四部合唱在嶺大的地位。根據當時學長的回憶，流亡下的歌詠團由馮顯聰任首位指揮，由試音、選曲、編曲到練習，都由其義務包辦，可惜馮氏 25 歲時因瘧疾和缺乏醫療物資而身故，英年早逝。其後，歌詠團交後來的崇基學院院長容啟東（時任嶺大農學院教授）作指揮，其妻任女

18 「大村歲月」出版組：《大村歲月：抗戰時期嶺南在粵北》（加拿大安大略：「大村歲月」出版組，1998），頁 61、74、85、87。

19 同上，頁 100。

高音獨唱，帶領歌詠團在曲江青年會和湖南空軍基地勞軍音樂會中演出，大獲好評，是當時粵北有名的歌唱團隊。²⁰ 如果以此歷史角度再看今天的嶺大基督徒詩班，或者可為其存在提供更深的意義和價值。二戰尾聲，嶺大學生曾因日軍逼近而內遷梅縣，惟隨着美國兩枚原子彈的投下，日軍投降，嶺大得以重返康樂校園復校。

結語

綜上所論，李氏一方面是社會福音的支持者，透過社會服務和社會改革，以期將福音帶到國家國人，入世而不離地；另外，李氏亦是「疊莊」之人，身兼多職，在嶺大內外，是國家、教會、教育界和青年會等多方面的領袖，切實實踐「為神為國為嶺南」的信念；最後，李氏在世界大戰中，領導嶺大全人由康樂遷到香港，又由香港逃亡到大村和梅縣等地，為的是停課不停學，在混亂時局和資源匱乏中，堅持排除危難，為復校而努力，為學生福祉而奮鬥。最終，嶺大在日軍大舉入侵下，仍能繼續辦學，甚至可以維持校內濃厚的宗教元素，李氏作為校長——學校行政的最高領導，着實功不可沒。李氏已故逾 70 載，惟願其「牛林」嶺南精神，可以像戰

20 同上，頁 30-32、96。

爭下多次遷徙時一樣，由今天的嶺南人和信徒，堅持承傳下去，繼續排除萬難。

原文刊於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的 Patreon 平台，詳見劉肇恒，〈李應林校長：入世、疊莊、流亡的嶺南基督徒〉，《Patreon》，2025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patreon.com/posts/li-ying-lin-xiao-128355602>（付費訂閱，瀏覽日期：2025 年 9 月 23 日）。

四、嶺南教育的「開荒牛」—— 司徒衛校長

前言

談到嶺南大學（嶺大）學長司徒衛（1889-1961），相信不難想到他在校徽設計上的貢獻，以及他在手繪畫作上的成就。不過，雖然他曾任多間嶺南教育機構轄下分校的創校校長，是嶺南教育的「開荒牛」，介紹其一生的著作卻未見於世。事實上，有關司徒衛一生的研究文章亦不算多，這跟其一生對嶺大的貢獻確實不成正比。如果從是次書寫「在歷史中的嶺南基督徒」系列而看，縱然他是基督徒，惟關於他與基督教信仰關係的討論，都非常缺乏，故本文亦只能從史料碎片中尋找他的一生。有關司徒衛的畫作，讀者可以參考近年由嶺大出版的畫冊，從視覺藝術的角度，更了解司徒衛眼中廣州和韶關時期之嶺大。⁰¹ 另外，有關校徽的設計，則可參考歐陽讓學長的自資專書，其中仔細討論了校徽的設計釋義和圖則。⁰² 本文將建基於前人的整理，從司徒衛在嶺大教育精神的貢獻，透過其生平和三個片段，更深地讓當代讀者了解這位開荒者是如何在基督教精神下，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01 司徒衛，《司徒衛的藝術世界：紅灰精神》（香港：嶺南大學，2019）。

02 歐陽讓，《司徒衛：嶺南校徽設計者》（香港：出版者不詳，2015）。

生平簡述

司徒氏生於 1889 年，是廣東開平人，1908 年畢業於廣州嶺南學堂，立志在教育界服侍，主辦嶺南蒙學，為小孩提供義學，1919 年受聘於由英國衛斯理循道會辦的佛山華英中學（即今日位於何文田的華英中學），任該校校長，力行發展，使學校聲譽大增，學生人數上升。⁰³ 事實上，司徒氏年青時受洗於衛斯理循道會，故其晚年的安息禮拜，亦在今天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行。正如人所皆知，司徒氏喜愛繪畫，擅長中國傳統繪畫丹青，也擅於水彩，師承美國華裔水彩畫家曾景文。1922 年，司徒氏在鍾榮光的指令下，來香港跑馬地開辦嶺南分校（小學部），即今天嶺南中學的前身；⁰⁴ 1923 年，司徒氏曾於乘坐廣九鐵路時被匪徒挾持，一度被捉拿 4 個月，最終校方付出 1300 大洋贖金贖回。⁰⁵ 1928 年，司徒氏又被派往上海開設分校，並在 1938 年第二次世界戰期間，遠赴越南西貢開設嶺南的華文學校，服侍當地華人（已於 1975 年越南

03 〈司徒衛先生生平史略〉，《嶺南通訊》第 29 期（1961/11），頁 7；嶺南教育機構，《嶺南教育在港 80 週年 1922-2002》（香港：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特刊編輯委員會，2002），頁 31。

04 〈司徒衛先生生平史略〉，頁 7；〈敬悼：司徒衛校長〉，《嶺南通訊》第 29 期（1961/11），頁 6。

05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頁 60-61。

戰爭後被迫停辦，今為當地的手藝及職業學校)。⁰⁶ 1941年，香港淪陷，本身在香港大學和司徒拔道繼續上課的嶺大師生，也在戰火中被迫離開，幾經艱難波折，司徒氏又跟李應林到嶺大村仙人廟，領導及開展復校大計，以有限的資源，繼續嶺南教育。⁰⁷ 戰後的1950年，司徒氏又成為了澳門嶺南中學校長，六年後再受邀任金銀業貿易場學校校長。1960年，司徒氏因精神體力原因退休，本以為可以享受退休之樂，安享晚年，惟1961年10月突然入院，並因失智症離世。其一生最終如校徽的釋義一樣，終生投入在以基督教為本的作育英才理想之中。⁰⁸ 司徒氏跟李應林一樣，現葬於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⁰⁹

有關司徒氏在教育上的成就和理念，除了上述提到的校

06 〈司徒衛先生生平史略〉，頁7；有關嶺南在越南辦學的舊址和現況，可參看影片：*Amy's Cuisine- 脆味廚房*，〈越南胡志明市-啟智學校-英德學校-啤酒廠-大水鑊醫院 [粵語]〉(2023年)，2025年5月22日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KgtKEKgyw>，時間 8:53-9:34；另外，楊競初學長等曾到當地尋訪越南分校舊址，巧遇舊嶺南的老師，詳見：楊競初，〈奇跡……奇跡……〉，《嶺南通訊》第139期(1997/8)，頁11。

07 〈司徒衛先生生平史略〉，頁7；Wai, Sz-to, *Lingnan is Born Again in Free China* (typescript) (s.l.: s.n, 1943).

08 嶺南教育機構，《嶺南教育在港80週年1922-2002》，頁4；〈司徒衛先生生平史略〉，頁7。

09 〈司徒衛先生生平史略〉，頁6。

長公職，其書寫下來的文章或出版並不算多，要了解他的教學理想，就要從其學生的回憶入手。在是次研究之中，筆者尋得三份與司徒衛教學相關的記載，整理如下。

作育英才，全人發展

首個回憶是來自黃浩川學長。黃氏是香港分校的校友，1924年在港入讀小學一年級，時任分校校長正是司徒氏。他形容自己當時除了喜歡足球外，另一興趣就是每天黃昏跟同學在校園石階聚集，聆聽司徒校長講故事，可見其親民一面。¹⁰事實上，司徒氏喜歡小孩是早有記載的，甚至有廣州官員為要將自己的女兒送到司徒氏當校長的學校，即使學校宿舍滿額，仍每日動用汽船將女兒送來學校。¹¹說回黃氏，他形容司徒氏的課程架構是先進的，即初小就要學習中文、數學、歷史和聖經，並附以音樂、體育和美術，高小就加入英文。黃氏表示，這種課程設計能讓學生在德、智、體、羣、美、靈等方面，多元地成長，讓學生從小得到全人發展，並不只偏重某些主要科目。¹²這理念在1920年代的民國初年，是前衛而超前的，時至今日，此教育方針顯然仍具時代意義。

10 嶺南教育機構，《嶺南教育在港 80 週年 1922-2002》，頁 33。

11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頁 41-42。

12 嶺南教育機構，《嶺南教育在港 80 週年 1922-2002》，頁 33。

諄諄善誘，另類教育

另一則故事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時的嶺大村仙人廟。伍大衛學長憶述自己當時因以大欺小，以木掃把與同班同學打架，而引發了關注，被司徒氏在辦公室內教訓了一頓。不過，除了教訓責罵，司徒氏還着伍學長次日到其住所去，原來是要罰伍學長跟他外出繪畫水彩畫。伍學長是如此形容當日的另類教育：「當然這是個難忘的下午，有教訓，有鼓勵，有傳道，但沒有責罵。現在想起，真後悔那時不懂得向畫家要求贈畫，可是最可貴的不是畫，而是他這種以愛心為本的諄諄善誘，親切的教導，令我感動，更令我一生難忘，也影響了我卅多年來在美加大學的教育與研究工作中的所作所為。」¹³ 另一學長司徒光亦謂：「先生歷來居住學生宿舍，食則同一膳堂，每日早會研經唱詩異口同聲，與學生生活打成一片，日常甚少向學生提及嚴守校規之口頭禪，然而全體員生自然於合理化中生活。」¹⁴ 如此可見，與其用華人傳統的責罰，這種願意花時間跟學生在生活中諄諄善誘的教學方法，亦是司徒氏的獨特之處，看來亦對當時學生的日後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

13 大村歲月出版組，《大村歲月：抗戰時期嶺南在粵北》（安大略：大村歲月出版組，1998），頁135。

14 嶺南教育機構，《嶺南教育在港80週年1922-2002》，頁14。

大村歲月，感動自豪

不過，除了以上兩個小片段，司徒氏其中一個重大貢獻，必須要數到他在二戰時獨力將大村一帶變為嶺大臨時校園，讓李應林的復校計劃得以完成。根據他在 1943 年的英文稿件，當時是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正式攻打香港，司徒氏等人本以為可以躲藏在司徒拔道校舍，惟日軍正集中轟炸該區，司徒拔道校舍被約 300 枚炸彈攻擊。12 月 25 日，香港淪陷，司徒氏初時留港，後來當出境限制放寬後，就返回家鄉開平休養了一個月。司徒氏得知李應林亦順利進入中國佔區，且有計劃在大村復校，就發電報予他：「我在這裏。」¹⁵

司徒衛到達大村（後來稱為嶺南村）後，就開始視察環境，並與當地駐守的士兵和村民建立關係。由於該區的官員是嶺大舊生，該官員 8、9 歲時，司徒氏已經是其老師，故在這樣的關係下，村民都更積極協助嶺大的復校重建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司徒氏到達大村後，曾一度更改嶺大校徽的設計，在白雲山上加上中華民國的國徽，又在荔枝樹加上盛開的花和葉，以表在中華民國的保障下，嶺大可以繼續盛放，繼續發展。¹⁶

15 Wai, Sz-to, *Lingnan is Born Again in Free China* (typescript) (s.l.: s.n, 1943), p.1-2.

16 *Ibid*, p.3-4.

不過，相關的更改並沒有附上圖像，之後嶺大的文件和出版，也未見新設計的正式使用。

首座由司徒氏設計和建成的建築物，是大村的新懷士堂。他想起在美國時見到的禮拜堂設計，就決定將新懷士堂重建為三角形尖頂而且高樓底的禮拜堂，以營造莊嚴吸引、如詩如畫的氛圍。他甚至時而親手參與實際建築的部分，又認為懷士堂可以屹立 50 年。¹⁷



當時的懷士堂，畫作由司徒衛繪製¹⁸

¹⁷ Ibid, p.5.

¹⁸ Wai, Szto (司徒衛), "Swasey Hall and Other Buildings," Lingnan University -Online Exhibitions,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https://ln.omeka.net/items/show/204>.

1942年8月1日，嶺大村的新校舍復課，新建築繼續建成，約300名學生入學，懷士堂的主日崇拜重啟，每週日舉行，嶺大學生青年會的社關事工亦相繼展開。同時，一直友好的廣東協和神學院和東吳大學（即今日位於台北的東吳大學）亦受邀到韶關，合作一同使用校園設施和上課；回望到這繁榮場景，又回憶到當日來到荒蕪簡約的大村時，司徒氏不禁表達內心的一絲感動，在稿件的末端，他如此說：

此刻我正坐在這裏，回想過去幾個月來的辛勤努力、我們的猶豫、我們的恐懼以及所經歷的各種考驗，感到欣慰這一切總算過去了。嶺南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強。她能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能經受任何風雨的考驗。我為嶺南感到驕傲。與一眾同志並肩為嶺南的福祉而努力，使我每天都感到年輕了，也更充滿幹勁。¹⁹

不知道當我們以基督精神服侍嶺南羣體之時，又是否能

19 Wai, Sz-to, *Lingnan is Born Again in Free China* (typescript) (s.l.: s.n, 1943), p.5-8; 原文見 *Ibid*, p.8: As it is I am sitting here recalling the months of hard work, our hesitations, our fears and our trials and am glad that part is over. Lingnan is now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She can fight for her existence and can stand any weather or storm. I am proud of Lingnan. I feel younger every day and more energetic from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all our comrades for the welfare of Lingnan.

同樣經驗到司徒衛學長的那種幹勁、自豪與熱情呢？

結語

作為嶺南教育的「開荒牛」，司徒氏除了在廣州、香港、越南等地建設一個又一個新校園，推動以基督教教義為基礎的華人教育，亦透過生活與另類教學，讓莘莘學子得以全人成長。此外，司徒氏在二戰時在嶺大村的努力建設，亦成為了後人的榜樣，讓我們更明白嶺南牛的幹勁和嶺南校徽的深層意義——以終生事業，實現為神為國為嶺南的理想。

五、在政治角力下的嶺大牧師—— 李聖華校牧

前言

時勢真惡時，牧者同樣難以獨善其身。要在各種政治變遷和角力下，堅持信仰的神聖，實在張力重重，甚至有時為求教會與教友的存亡，須如電影《沉默》中部分的耶穌會會士般，被迫背棄原則，打倒昨日的自己，或者，這全為忍辱負重。本文討論的嶺南大學（嶺大）校牧李聖華牧師（1903-1986），其故事可能就是以上描述的寫照。李氏的一生，比起前文提及的哈巴、鍾榮光和李應林等，更加撲朔迷離，書寫其一生的人，少之又少。李氏最為人熟悉的一面，應要數到其作為一名廣東新詩的詩人。吳美筠就曾分析其詩集《和諧集》，探討此詩集是如何受聖經的意象影響而將基督教元素滲入新詩之內，尤其是《雅歌》。⁰¹ 身為中華基督教會牧師的李氏，亦曾多次在該會的《會訊》中被寫到，讓其一生得以讓後人有更多認識。⁰²

01 吳美筠，〈五四時期粵港新詩與基督教——李聖華之《和諧集》初探〉，《人文中國學報》第19期（2013/10），頁345-384。https://doi.org/10.24112/sinohumanitas.192189。

02 編輯，〈念一代詩牧李聖華牧師〉，《滙聲》第646期（2011/6），頁10-11；梁圖光，〈悼念李聖華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350期（1986/51），頁18-19；李貞明：〈李聖華牧師悼詞〉，《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350期（1986/51），頁11。

不過，筆者留意到上述文獻對李氏在 1964 年於《廣州文史資料》寫下的回憶隻字未提，其中大力批評嶺大是如何透過宗教活動，滲透西方帝國主義，全盤否定嶺大和嶺南中外領袖的貢獻，甚至描繪其按牧不過是被時任協和神學院院長所迫令的。⁰³ 究竟，這位嶺大校牧的一生是怎樣的？他在《廣州文史資料》的自我打倒，又是怎樣的一回事？最後，驅使他留下這樣文字背後原因可能為何？

李聖華牧師生平

李氏兒時生於漁民家庭，生父早逝，生母面對生計困難，加上李氏身體孱弱，家母就決定在廣州梅菴禮拜堂的崇拜中，趁着祈禱時間，棄嬰於禮拜堂內。該堂堂主任李靈軒伉儷就收留撫養李氏，視如己出。教會的愛，令李氏自小立志跟隨基督，加入「白十字架團」，長大後誓要成為教會牧者。⁰⁴ 根據李氏的回憶，李父每天早晨四時為教友代禱，擅於證道，為會眾所愛，惟因不善交際，不為部分長老執事所愛，就被派往其他堂

03 李聖華，〈嶺南大學的宗教活動〉，《廣州文史資料》第 13 輯（1964/3），頁 86-101。

04 李聖華：〈汪彼得牧師和我——我的懺悔，我的醒悟〉，《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月刊》第 329 期（1984/10），頁 6-7；白十字架團成員加入時需要宣誓，終生在宣教、教育、青年會、醫學、文學或慈善工作中服侍上主，詳見：鍾向陽：〈廣州基督教“白十字架團”〉，《嶺南文史·宗教叢談》（1995/2），頁 31。

會。李父晚年階段，因為家境貧窮，離世後竟欠缺治喪費用，要向親友求助，最終更因棺木大小不合，要打斷李父屍體的小腿，才能勉強放於棺材之內。當時，李氏正在與嶺大關係緊密的廣東協和神學院讀神學，無法趕往奔喪，於是立志長大後不當牧職，反要努力賺錢成為富有的長老執事，認為這樣才可保障教會中的牧者，打破教會中不合理之制度。因此，自神學畢業後，李牧師就在協和神學院和教會學校培英中學任教，後來亦加入嶺大、韶關華英中學等校任教，以求得到比牧職更高的收入。⁰⁵

1943年，中華基督教會時任總幹事胡翼雲牧師和副總幹事汪彼得牧師，因為教會的需要，耐心說服李氏按牧，並提出五個重點，釋除了李氏對自己心志和對退休後財政的疑慮，並得到李氏即時表示樂意接受教會的牧師任命，同年順利按立。1946年，李氏跟另一嶺南人李應林一樣，到奧柏林神學院深造神學。⁰⁶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期間，嶺大與協和神學院的代表早在香港商討合作的可能，並在嶺大遷到曲江期間，邀請協和神學院一同遷入曲江，以建立更緊密的連繫。二戰過後，

05 李聖華：〈汪彼得牧師和我——我的懺悔，我的醒悟〉，頁 6-7；吳美筠，〈五四時期粵港新詩與基督教——李聖華之《和諧集》初探〉，頁 348。

06 李聖華：〈汪彼得牧師和我——我的懺悔，我的醒悟〉，頁 7。

兩校繼續簽署正式協議，保持二戰期間的關係。⁰⁷ 1947年，兩校再簽協議，協和神學院附屬成為嶺大其中一個書院，並在1949年12月舉行神學院新校舍的開幕典禮及奉獻崇拜，慶祝新的神學院禮拜堂、圖書館、辦公室和課室的落成。同年8月，已由美國回歸擔任嶺大校牧的李氏，亦有參與其中。⁰⁸ 雖然同期，國民政府已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廣州一帶亦在1949年間歸中共擁有，但嶺大校內的基督教活動持續發展，其中李氏是大學基督教事務委員會的當然秘書，負責推動教內的宗教活動，例如：每日的早晚禱會、多個主日崇拜、團契小組、基督教青年會的社區服務和其他婦女事工等，以事工發展而言，可謂短暫的黃金時期。⁰⁹ 不過，1952年嶺大收歸國有，康樂校園併入中山大學，嶺大在廣州地區消失，西方傳教士和相關宗教組織亦需要撤出中國，嶺大的基督教活動，亦宣告無以為繼。

07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Lingnan University-Affiliation Plans,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File No.538, Record No.2769,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Archives, Hong Kong.

08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of Lingnan University, Bulletin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Dedication Service dated 15th Dec 1949,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File No.538, Record No.2769,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Archives, Hong Kong; Lingnan University, Lingnan News-Vol. XVI No.1 dated March 1950,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G 11), Box 185, Folder 3296,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p.0886.

09 Lingnan University, Lingnan News-Vol. XVI No.1 dated March 1950, p.0886.

在新中國下的李牧師

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有關李氏在新政權下的言行，紀錄變得非常罕有。事實上，李氏在其 1984 年撰寫的文章，也疑刻意避談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個人事蹟。¹⁰〈念一代詩牧李聖華牧師〉一文亦只為該段時期留下「此後事蹟因已另有資料考證，在此並不詳述」寥寥數個字，且未附相關引文，頓令李氏這二十年變得撲朔迷離。¹¹筆者翻查報章，就發現李氏曾在 1951 年被中國政府拘捕，指其是國民黨的特務分子，發表反動言論，報道又引述為其按立的胡翼雲牧師和多名教會領袖，指李氏並不代表中國教會，反之教會界支持抗美援朝，對抗帝國主義。¹²雖然以上報道，未有清楚指明李氏的具體言行，惟筆者合理的估計，是跟他在 1946 年在月刊公開鼓勵基督徒加入國民黨有一定的關係。該文指出，由於國民黨最為符合以下五點：（1）不迷信流血殺人、（2）具明確的政治哲學、（3）推動自由平等博愛、（4）尊重人民生命生活、（5）在過去歷史上證其貢獻，因而認為基督徒應該支持國民黨，以表達

10 李聖華，〈汪彼得牧師和我——我的懺悔，我的醒悟〉，頁 6-7。

11 編輯，〈念一代詩牧李聖華牧師〉，頁 11。

12 〈人民政府接受民意逮捕李聖華，市公安局負責人發表談話，指出李犯是國民黨特務份子，市各基督教團體負責人也發表談話〉，《南方日報》，1951 年 12 月 17 日。

基督徒的政見，改善中國。¹³ 其後，似乎因為文章具一些爭議，李氏再於下一期《盡言》中補充其看法，讓讀者更進一步了解其立場及之後被追究的因由。在〈再談參加國民黨〉中，李氏就指出國民黨的經濟立場是符合基督教教義的；相反，階級鬥爭、無產革命、為達理想而放棄道德等想法，跟基督教的博愛精神有異。¹⁴ 顯然而見，李氏對於共產主義和相關黨派，具有相異的意見，其對國民黨的支持，亦甚為明顯。如此，這能解釋其何以在新政府上台後，於 1951 年被捕，並視為國民黨的特務，危害國家安全。

在如此的政治張力下，李氏看來在廣州留了下來，並隨時局發展，在立場上作了 180 度的轉變。根據 1964 年出版的《廣州文史資料》中〈嶺南大學的宗教活動〉一文，相信已加入中國三自教會的李氏，就批評廣州嶺大透過德、智、體、羣四大方面，宣揚英美帝國主義的價值和生活方式，又指當年按牧，只是因為協和神學院院長，即「美帝分子」龔約翰的情緒威迫，為免被辭去教席，才勉強升任為牧師。他續指，本身是屬基督新教的嶺大，在二戰時與天主教修會合作，是透過普世

13 李聖華，〈基督徒應參加國民黨〉，《盡言》復刊第 3 期（1946），頁 20-21。

14 李聖華，〈再談參加國民黨〉，《盡言》復刊第 4 期（1946），頁 26、29。

合一運動，「對付中國人民的革命高潮」。¹⁵ 政治取態方面，他特別指出其文章〈基督徒應參加國民黨〉，內容方向其實是說明「國民黨已經腐化，基督教青年應為其新血液」，實是批評國民黨的。另外，他亦引用自己的講道文章〈論青年與社會主義〉，指其講章因為反日、英、美的帝國主義，而受到當時編輯的壓力。¹⁶ 然而，翻查原本的文章，該文章反而是批評共產黨製造階級對立，並呼籲青年減少享樂，多些生產，以愛與和平，非暴力地救國家、救社會，似乎未見提到反帝國主義的內容。¹⁷ 回到〈嶺南大學的宗教活動〉一文的最後段落，李氏總結，指其在嶺大的日子，是糊里糊塗地受到帝國主義的利用，透過嶺大校內的宗教活動，阻礙了共產黨爭取青年參與革命的意圖。¹⁸

面對政局的急變，李氏在 1964 年的文章，或讓人感嘆政治力量對人思想立場的影響，亦再次讓信徒反思在社會政治壓力下，可以如何自處成聖。作為牧者，立場如此轉變，究竟是因為為勢所迫，以保教會存亡，還是隨時局發展，有更新的反

15 李聖華，〈嶺南大學的宗教活動〉，頁 86-93。

16 同上，頁 100。

17 李聖華，〈論青年與社會主義〉，《盡言》復刊第 7 期（1946），頁 50-51。

18 李聖華，〈嶺南大學的宗教活動〉，頁 100-101。

省？這就只有李氏才知。無論如何，值得一提的，是〈嶺南大學的宗教活動〉一文中，當批判嶺大師生滲透英美愛情價值時，就突然有一句「其中以李聖華為最甚」，彷彿文章是由第三者所寫。然後，論到嶺大內自設的教會，其中就指：「自筆者擔任校牧以後，員生才有教會的組織，廣州解放前開始醞釀，解放後才組織成功。設有職員，主任牧師李聖華，馬禮全（現在美國）副之。」¹⁹究竟，那位筆者李氏是校牧兼主任牧師，還是所謂「主任牧師李聖華」是另有其人？又還是，文章是由第三者協助撰寫？可惜，李氏已於 1986 年 6 月 11 日在廣州安息主懷，終年 83 歲，看來答案仍是無從稽考。²⁰

結語

總的而言，本文整理了嶺大校牧李聖華牧師的一生，論其如何自小被培養成為廣州時期的嶺大末代校牧，亦透過他在《廣州文史資料》的文字，了解他在新中國下的思想立場轉變。最後，本文亦提出驅使他留下這樣文字的可疑之處，惟最終答案依然是個謎。李氏具爭議的一生，相信能讓我們繼續反思，在社會政治環境急變之下，信徒可以如何在堅守信念和保存有

19 編輯，〈念一代詩牧李聖華牧師〉，頁 11。

20 同上，頁 89、97。

用之軀的張力之間繼續掙扎自處，踐行耶穌基督的教導。李氏曾提醒廣州青年要成為「聖人」，而非「偉人」，即要成為具聖潔品性和高尚德行的人，而非只為有聰明才幹的偉人；他說這是宗教教育應然的目的。²¹但究竟如何做到？看來，嶺大校牧李聖華仍為我們留下了一篇要消化沉思的道。

21 李聖華，〈宗教教育應有之目標〉，《廣州青年》第24卷（1937/3），頁9。

六、本土化神哲學的倡議者—— 嶺大哲學系主任謝扶雅教授

前言

自 1915 年的新文化運動和 1922 年的非基督教運動以來，華人教會就急着開始思考：如何將來自歐美西方的基督宗教，與本土中華文化作調適、對話和融合，以力阻部分國人企圖將基督宗教全面否定的傾向，又讓基督宗教更易為一般華人所接受。以當時嶺南大學（嶺大）為例，嶺大的洋人管理層和本地校友，就順利在 1927 年將辦學權從美國紐約歸廣州國人擁有，誕生首位華人校長鍾榮光博士，與及其領導的華人校董會。謝扶雅教授（1892-1991），是於 1928 年加入嶺大任基督徒哲學系教授，其宗教哲學的主張，亦顯然受上述的本土思潮影響，提出中國本土化的基督教思想，將基督教建立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之上。要研究謝氏的生平，並不特別困難，因謝氏是多產的學者，其宗教哲學思想、對時政的看法和一生的事蹟，早已非常有系統地書寫並出版；⁰¹

01 例如：謝扶雅，《自辦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2）；謝扶雅，《望百年紀要：兩個轉向·一個過渡·三個高潮》（香港：出版社不詳，1988）；謝扶雅，《巨流點滴》（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0）；謝扶雅，《謝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6）；謝扶雅，《生之回味——謝扶雅青年文集》（香港：道聲出版社，1979）。

基本上，讀者只要花時間拜讀其眾多的中文著作，已可以了解一二。因此，本文主要目的，是期望以簡潔的文字，介紹其一生（特別是在嶺大時期）和其宗教思想，讓後人（特別是嶺大基督徒），能更認識這位嶺大神哲學老師，又更了解當時嶺大學生是受怎樣的神學思想所影響。

人生初期：跌跌撞撞

謝扶雅，出身於浙江省，名字取自古語「夫（扶）唯大雅，卓爾不羣」，意即只有真正高雅的人，卓越出眾，與別不同；父親來自傳統大族，是一名秀才補廩，意即一位得官府俸祿的秀才。謝父在家鄉以開館授徒為業，顯然是讀書人的家庭。⁰²可惜，謝父在謝氏兩歲時離世，只餘謝母獨力撫養四名子女；謝氏十歲左右，眼見弟弟病危臥床，母親晝夜祈禱，雖然其禱求對象是觀音菩薩，但謝氏形容這種敬虔的宗教行動，有力地種下了他日後歸信基督教的種子，也認為聖靈已在當時默默工作。⁰³在家族成員的幫助下，謝氏仍得學習的機會，自小熟讀四書五經，參與了當時的科舉考試。可惜，後來科舉制度廢除，就在1906年投靠大舅，學習大清律例，成為一名師爺，總算

02 謝扶雅，《自辮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頁4-5；唐曉峰，《謝扶雅的宗教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頁2。

03 同上，頁2-3。

可以穩定生活。⁰⁴ 1911年，謝氏得到遠房堂兄謝乃績的賞識，有機會遠赴當時正因明治維新而急速發展的日本深造；同年，辛亥革命爆發，謝氏形容是「心靈震顫」的時刻，是生平最難忘的事情。雖然他因家境貧窮，並未實際參與在日本的中國革命活動，但他閱讀了眾多革命書報，早已深受革命思想薰陶，後來更加入中華革命黨。⁰⁵

初遇信仰：在日本與基督教青年會的相遇

1912年，為補習日語，謝氏寄宿在中華基督教學生青年會在日宿舍，終於初次接觸基督宗教，與眾多基督徒青年建立友誼，情同手足，開始參與更多宗教活動。讓謝氏正式成為基督徒的神秘時刻，則是發生在1915年位於東京的聖路加醫院。當時，謝氏視力很差，惟未有機會接受正規驗眼，只能胡亂購買眼鏡，遂令情況更壞；有一次，他配得一副最高度數的眼鏡，期望處理近視問題，惟不幸引發急性視網膜炎，醫生說他以後不能再讀書，很大機會要成為視障人士。不過，令他決意歸主的神聖經驗，是一名醫護在其手臂錯打針藥後跪地求饒，並在那一瞬間，謝氏想起家母在弟弟病危時的佛教誦禱，平日的基督教詩歌亦

04 謝扶雅，《自辮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頁7-12。

05 同上。

在腦中響起，就決定信奉基督，並在聖公會受洗加入教會。⁰⁶

1916年，適逢中華青年會急需文字工作者，謝氏就在丁立美牧師的邀請下，回國受聘成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幹事，一直至1925年。期間，他主理青年會的文字傳教工作，翻譯多本外國基督教著作，主編《同工》雜誌，打理事工報告，並親自撰寫個人著作。他形容，在青年會工作的九年，是其畢生心情最愉快的日子。⁰⁷另外，因青年會對體育運動的重視，自幼體弱多病的謝氏也開始鍛鍊身體，每天堅持運動兩個半小時，大大改善了身體質素。⁰⁸1925年，青年會有一獎學金機會，可以全數資助一名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在時任總幹事的支持下，謝氏就到了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進修神哲學，其中深受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的過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影響，又批判地反思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只取西方科學和民主自由的外在形式，並未有深入了解西方的文化根源，致令無法有效地與中國文化進行調適對話。⁰⁹

06 同上，頁23-25。

07 同上，頁31-32；唐曉峰，《謝扶雅的宗教思想》，頁7。

08 同上，頁38。

09 同上，頁44-47；過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提出萬物並非靜止的實體，而是在不斷變化之中。

初執教鞭：在廣州嶺南大學的日子

1927年，即嶺大歸國人自辦的一年，謝氏收到在華妻子急電，要求他盡快返國，原來只因妻子思鄉心切，想跟謝氏到廣州生活。結果，在未正式完成學位的情況下，謝氏就急急回國，期間撰寫了華人首本宗教哲學專著《宗教哲學》。¹⁰翌年，雖然謝氏未有取得畢業證書，惟嶺大時任副校長李應林，就邀請他加盟教授哲學及神學，一年後升為副教授，再過兩年則成為正教授，同時出任哲學系主任。雖然嶺大哲學系入讀人數凋零，1934年時更因資源問題停辦，但個別畢業生已成為牧師，甚至取得美國博士學位，是以質取勝。¹¹同期，謝氏兼教協和神學院的「國學」一科，亦廣撰倫理學及宗教學專著，更是演講、報章和各類刊物的常客，在廣州的聲名顯然不錯。¹²值得注意的是，謝氏是學術期刊《嶺南學報》的創辦人，期望學報可以「倡導學問，闡揚真理，賞奇析疑」，首篇文章由謝氏親撰，題為〈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比較了西洋哲學家來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中國儒家思想的異同關係，某

10 同上，頁47。

11 謝扶雅，《生之回味——謝扶雅青年文集》，頁204-205。

12 謝扶雅，《自辦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頁48；謝扶雅，《生之回味——謝扶雅青年文集》，頁206。

程度反映了謝氏對中西文化及宗教對話的倡議傾向。¹³

初心不變：離開大學，進入平民

在嶺大執教期間，除了單向教學，謝氏樂與學生為伴，除日間與學生相處，晚上亦邀學生到其校園住所談心，故他常聽到學生們的學業與戀愛秘密，又給予人生的意見，擁有牧者的心腸，亦因為聽完學生的心事才展開備課工作，故時常工作至黎明時分，是有心有力的學者。¹⁴不過，正當學術之路正步步高陞之際，謝氏竟然毅然辭去教席，到河北鄉郊地區從事平民教育工作。根據他的回憶錄，他認為要令中國富國民強，抵抗當時日本的入侵企圖，就必須由鄉村開始進行教育及經濟改革的工作，令基層鄉民自強，為國家貢獻。他認為這樣的行動，是呼應《路加福音》有關傳福音給貧窮人的教導，亦是一種知行合一的君子表現。¹⁵

13 謝扶雅，〈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嶺南學報》第1期第1卷（1929/12），頁1；《嶺南學報》在1952年隨嶺南大學停辦而停刊，2014年終順利復刊，至今仍然由嶺南大學中文系及環球中國文化高等研究院主理，詳見：嶺南大學，〈嶺南學報〉，「主頁」，2025年7月15日取自：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及黃湛，〈《嶺南學報》小史述略：兼論陳寅恪與《嶺南學報》〉，《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2015），頁499-505。取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iss1/24。

14 謝扶雅，《自辯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頁49-50。

15 同上，頁53-56。

來港移美：謝扶雅的最後日子

1939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期間，謝氏再次返回嶺大教學，惟當時日軍侵華，嶺大暫借香港大學校園復課，謝氏就在港短暫任訓導長及中國文學系主任，直至嶺大再次因日軍殺入香港而迫遷。其後，即1949年春，謝氏曾兼教嶺大的「人生哲學」課和嶺大協和神學院的「中國思想史」，直至他因國共內戰而逃到香港。¹⁶到港後，謝氏曾任教由嶺大教授開辦的嶺英書院、承傳十三間中國基督教大學精神的崇基書院和另一基督教學府香港浸會學院。1958年，謝教授移居美國，翻譯多部西方基督宗教的著作，並積極整理一套中國本色化的神哲學思想，試圖融和中西文化。晚年，他退休返回廣州，並在1991年8月18日安息主懷，享年剛好百歲。¹⁷

數典不忘祖：中西互補的基督宗教

謝氏作為嶺大歸國人自辦後的神哲學專任教授，其思想也值得一記，以讓我們能透過他的文字，至少部分地淺嘗1920年代尾至1930年代中，嶺大在傳遞的神哲學思考和特色。不過，要全面地分析謝氏的神哲學思想，則顯然無法在短

16 謝扶雅，《生之回味——謝扶雅耆年文集》，頁205-206。

17 唐曉峰，《謝扶雅的宗教思想》，頁13-15；謝扶雅同時為崇基學校歌的中文作詞者。

短的這個段落處理；讀者如要更進一步了解其思想系統，建議參看他的著作和後來不同學者的相關文獻。¹⁸

雖云如此，謝氏的神哲學思想，仍有數點值得留意。首先，謝氏提出耶穌來到世上，並不是要廢掉猶太人舊約的律法，而是要成全它們，並以此推論耶穌對於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和信念，都不會是廢掉，而是成全，甚至中國典籍能提升為基督教文化。¹⁹他進一步舉例指出，佛教在中世紀由印度傳入中國土地，其之所以能扎根中華，是因為佛教成功進行本色化，產生如天台、華嚴、南北禪宗等本土化派別，讓佛教和平植入民間生活；相反，基督教雖然最早在唐代傳入，惟西方宣教士多未有透徹明白及融和中國文明，遂引發反教思潮，歸信人數有限，難以產生本色化的「中華基督教」信仰。²⁰

第二方面，謝氏強調中國對宗教的理解，不像西方傳統，主要以傳授純粹的客觀知識為目的，反而強調以身作則，雖知

18 謝扶雅，《謝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6）；何慶昌，「1950-1960年代離散中華人基督徒身分的建構——以謝扶雅（1892-1991）為個案研究」（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06）；謝扶雅，《巨流點滴》（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0）。

19 謝扶雅，《謝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論集》，頁66、87。

20 同上，頁140-141。

易行難，但行比知更為重要。他認為，如果本土的信徒都能知行合一，像佛家和尚與儒家老師般，領導信眾篤信力行，必能助基督教在中國蓬勃發展。²¹事實上，這個神學觀解釋了何以謝氏會突然由嶺大正教授一職，毅然下鄉推動平民教育，對抗帝國入侵，甚至在二戰時期，因首任妻子蘇儀貞與日軍過從甚密而決定忍痛離婚。²²

最後，謝氏對於宗教及宗教合一的精神，也具一番看法。他認為，中華的基督教不應走向左右任何一個極端，理應效法孔、孟、荀的傳統，尋求合乎中道，不偏不倚，在處境中尋找適當自然之位置。再推演下去，他認為基督教要抱「大同」的觀念，反思西方的排他傾向，容許「小異」存在，各派並在，且在愛神愛人的大原則下，於宗教制度、禮儀和思想上，容許差異而不必統一。²³

結語

「中西結晶，增益文明」，這是跟嶺大校園同調的崇基學院校歌的其中一句。謝氏作為填詞者，這一句某程度總結了其

21 同上，頁 72-73。

22 謝扶雅，《自辮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頁 64。

23 謝扶雅，《巨流點滴》，頁 251-252。

一生和其神哲學思想。謝氏自幼受四書五經的嚴謹教育，後來留學時值全盤西化的日本，吸收最新的西方思潮，後又因在青年會的投入，有幸到美國名校進修神學，然後回國在嶺大等校分享所學。如此中西多元的教育背景，某程度容許他可以將主要由西方傳入的宗教思想，與本地華人傳統進行整理和對話，誕生出和而不同的本色化神學思維。雖然這位嶺大哲學系主任已經與世長辭卅載有多，惟其將基督教信仰具反省地本色化 / 本土化的主張，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參照，亦已以不同模式，如後殖民批判、處境神學、基督教中國化、漢語神學等，成為神學學界近代具影響力的思潮。回到今日嶺大基督徒，我們又如何建立華人 / 香港文化互通的基督信仰？甚至，我們又如何建立屬於香港嶺南大學的神學思想呢？我們一同思想。

七、南中國男女平等教育的先驅—— 以嶺南女學與廖奉獻學長為例

前言

尤記得筆者在學於屯門嶺南大學（嶺大）時期，女同學間常流傳一個笑言：「嶺大的男生都是中了輻射的！」言下之意，大約是揶揄嶺大男生條件有限，配不上當嶺大女生們的伴侶。能有這樣的笑話，是因為嶺大是男女一起上課的大學，加上修讀文、商科的學生以女生為多，就自然出現了這種女尊男卑的戲言。不過，嶺大以至中國的大學能有女學生，卻非自古以來的必然，嶺大開展女學，讓華人女性能跟男性同享相同的教育權利，原來不過是大約一百年之前的事。研究嶺大女性教育的學者，主要以王棟博士的專著為主，其書的第四章，正是探討嶺南女學的歷史發展，爭議嶺南女學雖然是平等教育的先驅，惟其性別定型仍是傳統的，又同時討論中西兩方是如何合作推動嶺大男女平等的學習。⁰¹ 王棟的著作是唯一討論女學發展的嶺

01 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7), Chapter 4.

大校史著作，彌補了其他校史作品的缺漏，⁰²是重要的參考文獻，惟其目標對象是英文讀者，未有照顧漢語世界的讀者，這或是令嶺大早期繼續推動南中國男女平等教育權的功勞，續被現世遺忘。事實上，王棟以嶺南女學畢業生廖奉獻學長為其中的例子，爭論當時女學的性別定型仍然落後，亦未必全面，因觀乎廖氏之後的人生，都跳出了不少傳統的性別框框。因此，本文將整理嶺南女學初期的發展簡史，然後以嶺大作為主要視角，認識廖氏這位嶺大女畢業生（後來成為嶺大老師），透視嶺大女學長是如何在歷史中，以基督教的精神，推動及實踐男女平等。

嶺南女學初期發展簡史

據王棟的研究，嶺大具收取女生的意圖，可以追溯至創辦人哈巴牧師在創校前十一年，即 1877 年在上海發表的宣教會議文章，其中談到在中國推動向本地女性傳教的重要。⁰³哈巴認為，因着華人的性別界線，只有女性基督徒可以有效向本地

02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 Based Primarily on the Records of the University's American Trustees*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陳國欽、袁徵，《瞬逝的輝煌：嶺南大學六十四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03 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p.108.

女性傳教，又強調女性在福音中有分，更補充指，根據當時中國的發展，已經實際可行地容讓女性傳教士單獨而安全地在中國地土上活動。他進一步指出，專為女性而設的日校、寄宿學校、聖經學校、醫療服務等，均是有效而可能的女性傳教方案。⁰⁴ 如此可見，早在嶺大創校者的藍圖之中，華人女性可以打破千年封建傳統，享有同等受教育權一事，是早有位置。

不過，要順利付諸實行，則要等到哈巴死後，嶺大在澳門暫借校舍時期才初見曙光。根據鍾榮光的回憶和早期文獻，嶺大出現女生，可追溯到 1900 年在澳門時，時任校長尹士嘉（Rev. Oscar F. Wisner, 1858-1947）的妻子 Sophie Grey Preston（或稱為 Mrs. O.F. Wisner）就在其家中收留了數個本地女生，在家中開班授徒。這些女生的求學態度和個人聰明，都讓當時的嶺大老師有意繼續為女生辦學。1903 年 2 月 26 日，首個嶺南女學塾正式在澳門校園附近的民居閣樓中初試啼聲，當時收生只有 11 至 12 人左右，年齡由 9 歲至 30 歲不等，由三名在美國前來的女教師以英文授課，教授簡單的英文、詩歌、聖經、地理和數學等，並在週末假日等，與學生外出遊玩

04 Andrew P. Happer, "Woman's Work for Woma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162-167.

和參與宗教活動。本地華人醫生廖德山（廖奉獻之父）和時任嶺大中文教師鍾榮光，則負責在華人羣體中收生，以確保所得學費能夠承擔海外教師的薪金。⁰⁵

1904年，嶺大遷入廣州康樂校址，因新校址並沒有女生宿舍，臨時女學被迫解散。兩年後，鍾榮光夫婦於家中收留了廖奉獻、廖奉恩（廖奉獻之妹妹）、羅有節、鍾蕙霞（鍾榮光之女），容讓她們繼續在嶺南中學部學習；後來，陳桂嫻、梅閏恩和楊惠基三位女生分別入學，成為了初代嶺南的七名核心人物，亦是廣州最早期的女性準大學生。⁰⁶ 不過，由於當時嶺南並未有容讓女生入讀的大學課程，這羣中國第一批準女大生，不少都到美留學，以完成學位課程。⁰⁷ 1911年，嶺南首個女生宿舍建成，命名為「卡彭特樓」（Carpentier Hall），以紀念卡彭特先生（Horace Carpentier, 1824-1918）將港幣 \$25,000 遺

05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The Beginnings of the Women's Department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New York: 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15), p. foreword and 3-6; 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p. 108.

06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The Beginnings of the Women's Department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p. 12; Henry Grant, "Is It Worth While to Educate Chinese Girls?" in *Ling Naam: The News Bulletin of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New York), vol. 1, no. 1 (August 1924).

07 李林悅、王蒙，《紅樓翠影：中山大學康樂校園近代建築賞析》（廣州：中山大學檔案館，2021），頁 68。

產捐贈嶺南基金會。⁰⁸ 嶺南女生真正能夠進入大學學位課程，則要等到 1914 年校方的籌款計劃和 1916 年的女學部（Women's Department）的正式成立。在 1923 年至 1924 年度，嶺大全校共有 32 名女大學生，是南中國僅有的女大學生，其中五名就在 1924 年成為首批畢業的學位女生。⁰⁹ 1927 年，最早期嶺南女學學生之一、時任女學部主任（Dean of Women）的羅有節，就跟嶺南基金會提議擴建女學部，增設一個 80 至 100 人的新女生宿舍，以及附屬設施如泳池、音樂廳、體育館及家政大樓與設備等，計劃預算港幣 \$600,000；羅有節更建議，基金會成員的妻子、校友、學生領袖和其他有興趣人士，應組成籌備小組，落實安排女學發展的計劃。¹⁰ 1933 年 9 月，新女學宿舍「廣寒宮」建成（現為中山大學研究生宿舍），資金由美國嶺南基金會籌款和鍾榮光在華人婦女間籌得，最終建築費用達 \$180,000。¹¹

08 Charles K. Edmunds,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 Naam Hok Hau: Its Growth and Outlook* (New York: Trustees of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19), p.58

09 Henry Grant, "Is It Worth While to Educate Chinese Girls?" in *Ling Naam: The News Bulletin of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New York), vol. 1, no.1 (August 1924).

10 Letter from Yau Tsit Law dated 25th January 1927, Education for Women, Lingnan University Trustees, Lingnan University Archives, Fong Sum Woo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11 李林悅、王蒙，《紅樓翠影：中山大學康樂校園近代建築賞析》（廣州：中山大學檔案館，2021），頁 70。

時代婦女：廖奉獻學長

除了女學簡史，當中的女學長也是值得認識研究的。其中一個值得留意的嶺南女性領袖，務必數到第一批女學生之一、早期嶺南女學重要推動者的廖奉獻學長（1890-1970）。根據 1935 年的歷史資料，廖氏被視為「時代婦女」，並因而被《世界日報》的記者，一連六期在「時代婦女介紹」欄目中刊登其個人專訪。廖氏是家中長女，父親是廖德山，是孫中山的醫科同學，同是晚清時期的革命黨人，故思想開明。廖氏回憶指，家父為她命名為「奉獻」，正是期望將這個不被社會重視的女兒，奉獻社會，改變中國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她記得，當弟弟出世時，父親力排眾議，竟不為家中首個男嬰辦盛大的滿月酒宴。¹² 正如前述，廖氏在 1906 年因其父親的關係，入讀嶺南的中學，並在畢業後，以半工讀的形式，到美國滬斯特大學，並後來以獎學金轉讀威廉士女子大學（Wellesley College）。廖氏能得到獎學金，原來是因為在嶺南時，在一眾男生之中，仍然考取全級第一，結果女青年會的總幹事就記得這事，並在美國鋪橋搭路，爭取著名的威廉士女子大學發放獎學金，並錄取她為文學院學生，加上鍾榮光任廣東

12 含英，〈廖奉獻女士：她父親是一個「重女輕男」〉，《世界日報》，1935年9月15日；

含英，〈廖奉獻女士：她留學是靠半工讀維持的〉，《世界日報》，1935年9月16日。

省教育司後，終容許女生申請官方的助學金，她就順利留美進修。1915年，她更完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教育碩士學位，師隨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又開始在美遊說支持，爭取更多人支持嶺南大學的女學發展。同時，她被聘任為嶺南女子部主任和嶺南女子中學的校長，是校史上首位女性學部主任。¹³

由美國長老會出版、廖氏親撰的小書，進一步闡述了其對中國女性平權的想法，並很大程度突破了王棟對廖氏在1913年文字上的觀察——女性的首要性別角色仍在家庭之中。這本出版物——出版日期不詳、但按推斷是她完成教育碩士後在美國出版——就清楚指出華人對女性角色的定位已經改變，她們再不只是家中的太太，而是社會中的積極一員。她指出，過去華人女性被教育要安靜留在家中，但現在則被急速地放進錯綜複雜的世界中，因此，她們需要接受與男性同等的教育，在身體上、社交上和知性上，都準備好面對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另外，作為基督教大學的畢業生和教員，廖氏在書中最後部分進一步提出基督教是如何解放女性。她認為，歷史已經證明基督

13 含英，〈廖奉獻女士：回國後才同王先生結婚〉，《世界日報》，1935年9月17日；Henry Grant, "Is It Worth While to Educate Chinese Girls?" in *Ling Naam: The News Bulletin of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New York), vol. 1, no.1 (August 1924).

教能夠最大程度給予女性自主權，使女性成為獨立個體，而非只是別人的妻子、姊妹或母親。所以，她提出要在西方價值的引導和對西方系統的反思下，推動本地女學教育改革，培訓出更多活像基督、受過教育的華人女性領袖。¹⁴

以上所見，廖氏對女性地位的觀點，並不完全如王棟的觀察，似乎隨時日改變，廖氏也調整了其看法——這是值得留意的。事實上，如果繼續觀看廖氏的人生，也不難發現雖然她的確在婚後離開嶺大教席，惟其一生仍然堅持奉獻公共世界。在嶺大教學兩、三年後，廖氏結婚，隨夫到東三省，在家中教養幾名孩子。不過，她憶述父親的教導，指既然自己是被社會教育出來，就應該回饋社會；為此，她走進城中，在照顧家庭的同時，先後擔任女青年會會長與董事、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要職、北平國際婦女會會長和多間學校董事等多個公職，推動平權運動。¹⁵ 由此可見，雖然廖氏婚後仍然留家照顧多名子女，但其對社會改革的心願仍然不變，並繼續貢獻參與公共事務，回應父親對她的期許，在中國婦女教育平權運動上，發揮所

14 Fung Hin Liu, *School Girl and College Woman in China* (New York: Women's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n.d.).

15 含英，〈廖奉獻女士：她來北平原不預備久住〉，《世界日報》，1935年9月18日；含英，〈廖奉獻女士：北平國際婦女會下月將聚會〉，《世界日報》，1935年9月19日；含英，〈廖奉獻女士：暇時她喜歡收拾屋子和花園〉，《世界日報》，1935年9月20日。

長。其在嶺大後的人生，只要王棟翻查廖氏其後的訪問，就應會很大程度反駁了本身的觀點，讓廖氏得到更公允的評價。

結語

本文建基於王棟的重要研究，以漢語整理及補充嶺南女學於晚清民初時期的發展，並以廖氏的個人故事為主線，引用《世界日報》在1935年的「時代婦女介紹」和廖奉獻的文章著作，進一步了解首位女學部主任的女性平權思想和行動，並引證廖奉獻並不必然如王棟所理解般，停留在女性受教育亦只旨在服侍家庭的傳統觀點。簡而言之，廖氏的確在1913年清楚指出女性與家庭的緊密關係，惟只要翻查其他歷史證據，並觀乎其後來的社會參與，則相信會有不同的理解。最後，筆者期望日後有機會發掘更多嶺大女學長的歷史故事，讓仍以男性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校史研究，可以有所突破。同時，筆者也願嶺南女學的故事，可以繼續提醒嶺南學長，思想要不斷革新，奉獻服務社會，成為獨立自主的「時代嶺南人」。

| 跋 |

在此，由衷感謝各位閱讀至此，期盼各位讀者真能有所得着與啟發。

學海果然無涯，在筆者完成碩士畢業論文後，並繼續閱讀有關中國基督教大學的書籍時，就發現應對本書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從普世合一視角看創校初心〉有所補充。這一章，筆者嘗試推論美國長老會差會拒絕獨力開辦格致書院的背後原因，認為是跟開辦大學的龐大經費有密切原因。然而，除此原因之外，早期研究中國基督教大學的美國學者 Jessie Lutz，亦有提及當時在西方基督教圈中的爭議：究竟差傳宣教，應以口傳福音行先，還是應以教育或社會服務等「非直接」的方式推行？根據她的研究，美國長老會當年不願獨力支持哈巴的建校計劃，亦是因為擔心辦學會令直接傳教的使命失焦。⁰¹ 這個至今仍為不少華人教會爭議的議題，原來在嶺南創校歷史和西方傳教士之中，早已經來回激辯，反覆驗證。閱讀歷史，就會發現當下的爭辯，其實早早有前人整理及實驗；或許，這能令當下有關何謂福音的神學討論來得更為簡單和務實。

01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3；值得注意的是，前線的傳教士對辦學和社會服務多抱比較正面的態度，原因是當時中國人對於直接傳教，多抱懷疑態度，要打開當時國人的心，方法上務必有所改變及更多元化。

無論如何，以上補充，可見學術研究的無涯無盡。執筆之時，正值筆者準備博士學位開學之期，相關的研究方向，同樣是以嶺南大學的百年史為例，探問她世俗現代化的過程和因由，探看嶺大與基督宗教的來回疏離、復興與本土化。未來日子，但願相關研究能有更多全新的發現，亦願可以為嶺南大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甚至是中國基督教大學與今日的關係，繪畫一幅更完整的圖像。若有各界同道對以上題目殊感興趣，歡迎與筆者聯絡，好讓研究能精益求精，並以更多不同方式，例如：研討會、講座、課堂、導賞、交流團、展覽、多媒體表達等，以過去惠及當下。

寫於 2025 年夏

是怎樣的「基爾高巒序」：重探廣州嶺南大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
What Kind of Christian College: Reassessing Lingnan University's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ianity in Canton

劉肇恒 著

Lau, Siu Hang

責任編輯：葉綺暉

美術編輯：Dawn Kwok

出版：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屯門青山公路 8 號劉仲謙樓上層 15 室校牧處

電郵：lingnanchristian.alumni@gmail.com

網址：<http://www.lncaa.org/>

出版日期：2026 年 3 月

圖書分類：宗教 / 中國基督教史 / 教育

國際書號：978-988-71972-0-1

開放取用，自由奉獻

嶺南大學作為一間基督教大學，到底會隨着世俗化的浪潮趨向名存實亡，抑或能夠在時代迭替之中透過不同方式不斷重新演繹？還看每位嶺南基督徒如何承傳這個身分意識，並勇於肩負起校園福音使命。

——鄧巨堅牧師 | 嶺南大學校牧處校牧

嶺南大學的百年歷史，實在是寶貴和值得特別關注及鑽研的……作為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個案，嶺南大學是屬於第三類型的基督教大學，即是「由基督教人士創辦而不直屬任何宗派或教會組織的大學」。這是嶺南大學最恰當的定位。

——吳梓明教授 | 香港宏恩基督教學院教授

這本書介紹嶺大人和事，可以讓我們依稀窺見華南基督教史研究中兩個普世合一精神的展現：一是跨宗派 / 差會的合作……二是跨地區、跨國的普世支持網絡。

——黃慧賢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

近年大學管理層均定性嶺大為一所「有基督教傳統的大學」而非「基督教大學」，但只要今日嶺南基督徒肯努力回應神的呼召及按哈巴牧師等先賢的心意，仍可延續嶺大作為一間祝福千萬中國人、屬於基督並榮耀基督的大學！

——黎雲龍教授 |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校監、
嶺南大學基督教事工委員會委員

ISBN 978-988-71972-0-1



9 789887 197201 >

開放取用，自由奉獻